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JOURNAL OF JIANGSU INSTITUTE OF SOCIALISM

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主办



中国社会科学类综合期刊

《中国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收录期刊

《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收录期刊

《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来源期刊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期刊

本刊顾问

薛国安 吴胜兴 常本春 朱毅民

吴建坤 米其智 蒯建华 陈京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瞿超

副主任 魏晓蕾 朱杰 唐旭明 彭慧 陈童

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任世红 陈思 张吉林 张美云

张思东 傅佩丽 张刚强

主编 魏晓蕾

副主编 任世红

目 录

2019年 第5期 总第121期

主 管: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主 办: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
编辑出版:《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编辑部
编辑部主任:王 芳
责任编辑:鲍跃华 王 芳 龚万达 郭晓东
王天海 蒋建忠 徐晓婷 宋 好

本刊特稿

政治家张謇和南通精神 / 罗一民 04

中华文化

我们以什么贡献这个时代——从“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谈起 / 言恭达 16

统战理论与实践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联合课题组 24

新时代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 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31

论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 / 王复兴 35

政党制度

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优化的原则与对策 / 刘亮红 39

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基本内涵 / 肖建平 44

封面设计:姜 嵩

封底篆刻:韩文忠

地 址:南京市苜蓿园大街 51 号

邮 编:210007

网 址:<http://JSYB.chinajournal.ner.cn>

电子邮箱:jssyxb@163.com

电 话:025-84287236

传 真:025-84287236

刊 号:ISSN1672-3163 CN32-1559/C

印 刷:南京艺中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 年 10 月 28 日

定 价:8.00 元

新社会阶层

自由职业人员基本状况及统战工作研究

——基于无锡市的调查分析 / 陈德荣 李天鹏 49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社会化路径探析 / 喻迎春 55

“知沟”理论视角下做好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的思考 / 谭翔文 60

民族与宗教

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 / 蒋连华 66

宗教界人士担任人大代表是否违背政教分离原则 / 沈春阳 官玉涵 70

学习与思考

关于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发展的思考 / 张健红 74

博物馆教育的建构转向与交互性展示研究 / 熊 鹃 77

本刊启事

本刊已加入 CNKI 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知网、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据库、重庆维普、龙源期刊网、台湾华艺等数据库,故凡向本刊投稿者,均视为已同意稿件入编上列数据库上网发行,授权本刊代理其稿件电子版信息有线和无线互联网络传播权,本刊不再寻求作者授权。本刊一次性所发稿费,包括纸质版、光盘版、网络版及其全文数据库著作权使用费及稿酬。

期刊基本参数: CN32 - 1559/ C * 2000 * b * A4 * 80 * zh * p * ¥8.00 * 2500 * 14 * 2019 - 10

政治家张謇和南通精神

罗一民

摘要:清末状元张謇,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遗产。他不仅是优秀的企业家、教育家,本质上更是一名政治家。本文论证了张謇的政治家身份,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张謇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的作用进行了客观评价,肯定了他作为一名政治家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张謇将南通打造为“中国近代第一城”,也培育了近代的南通精神,对南通城市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本文对南通精神的本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并站在历史的高度对南通精神的继承和弘扬进行了探索。

关键词:张謇;政治家;南通精神

中图分类号:D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04-12

清末状元张謇,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物质遗产,包括工厂、学校、养老院、公路、港口,甚至一座城市,后人公认他为著名的企业家、教育家。但笔者认为,一直以来,张謇身上的两个地方往往容易被人忽视:首先,他不仅是企业家、教育家,本质上更是一名政治家;其次张謇不仅留下了物质遗产还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本文围绕这两个方面展开论述,在论证张謇政治家身份的基础上,研究其留下的精神文化遗产及当代价值,并着重探讨张謇培育的南通精神及其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

一、张謇的政治家身份

(一)“状元”身份本身就是政治身份

过去,我们认为状元是文人,是儒生。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始于隋唐的科举考试,主要目的就是

开科取士,为了选拔培养各级官员,也就是培养政治人物。“状元”作为最高级的“士”,实际上是最有发展潜力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到了明清以后,又在进士和状元之外设了翰林院,也是为了进一步培养高层领导干部。考中进士以后,一般的还要让过去的老进士、老翰林进行辅导,然后经过见习、考核合格了再送进翰林。但是,状元却可以直接进翰林,翰林相当于宰相培训班。过去有种说法:“非翰林不得入阁。”我们经常说“状元宰相”,因为大部分的宰相或中央高层都是从状元中产生的。张謇中了状元以后,清廷给了他一个翰林修撰的官衔,简单地说,就是皇帝的宫廷秘书,可以记录宫廷的事情,帮助朝廷起草一些文稿、文告,甚至帮皇帝和太子讲学等等。这虽然没有实权,但是可以借助这个台阶,眼观全局,学习朝廷的政治运作,把握

收稿日期:2019-08-10

作者简介:罗一民,江苏省政协原副主席。

整个政治的全局。同时,他还可以直接参政议政,发表看法。比如,1894年甲午战争那年,当时的政局复杂,所谓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争斗得很厉害。张謇刚考上状元,很快就向朝廷上奏批评李鸿章,认为李鸿章“主和”的主张耽误了国家的战备,影响了和日本人的战争,应该受到弹劾。这篇奏章当时震动朝野。满朝文武那么多有资历、有威望、有实权的官员都没有这个举动,而他刚刚中了状元,当了翰林,就开始崭露头角,拥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政治担当,是非常了不起的。

(二)多年参政经验奠定了张謇的政治家基础和本色

一般的状元都是一直读书,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再到状元,而张謇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张謇22岁考上秀才,不久就开始介入或者说从事政治活动。南通知州(地方官名)孙云锦把他招募为幕僚,也就是高级秘书,为自己写文稿、出谋划策。后来孙云锦到江宁做法审局局长的时候,就把张謇招聘过去。当时的法审局,是准法院机构,虽然没有审判权,但是可以把一些疑难杂症的案子向省府上报。张謇当时被招聘担任幕僚和机要秘书,很多事情要直接向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上报,得到了很多历练。这里要特别提到,张謇到淮安去办理一些疑难案子的时候,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了很多民间疾苦,他发现淮安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南通还要艰苦,非常同情,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萌发了要“救国救民”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

张謇一生跟几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孙云锦。孙云锦用了张謇以后,又让他接触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个重要人物——袁世凯。淮军庆军统领吴长庆和孙云锦是好朋友,吴长庆需要好的助手和幕僚,于是孙云锦就向他推荐了张謇。这时候,袁世凯正好在吴长庆手下做一个中下级的军官。吴长庆和袁世凯的养父是拜把兄弟,有生死之交,两人曾经共同抗击和围剿捻军,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于是,袁世凯在找出路时以侄子的身份投靠了吴长庆,吴长庆把袁世凯当作晚辈提携、关照,希望他茁壮成长。张謇来了以

后,吴长庆让他帮助袁世凯读书,于是袁世凯这时候就把张謇作为老师和长辈。那个时候,张謇觉得吴长庆文武双全,有远大的政治眼光,他一心希望吴长庆能成为像曾国藩那样的人物,成为一名中兴之臣,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他跟着吴长庆这么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政治上也会有发展,不会久居于人下。从张謇写的诗就可看出他希望建功立业的政治抱负:“朝鱼而暮龙,功名蛻侯伯。”吴长庆对张謇非常信任,他当了浙江提督去清廷拜见皇帝时也带着张謇。张謇跟着吴长庆在北京结交了很多高层的政界、军界的人物,开阔了眼界和政治视野。

1882年,张謇30岁的时候,朝鲜发生动乱,中国是它的宗主国,清廷就派吴长庆去平叛,张謇也跟去了。吴长庆在平叛当中几乎全部听取了张謇的计策,张謇在朝鲜平叛当中起了重要作用。张謇名义上是机要秘书,实际上他还直接在处理事务。吴长庆平叛有功,朝廷给予奖励,张謇也得到表扬。张謇跟着吴长庆在朝鲜待了两年之后,对朝鲜的政局非常了解。回来就给清廷写了很多的奏折或者叫提案,建议清朝应该如何对付朝鲜问题,有一篇特别有名——《朝鲜善后六策》,还包括《条陈朝鲜事宜疏》等重要文稿,长篇累牍地写。当年就预判朝鲜将来肯定是中国的祸害,在奏折中建议一旦条件成熟就应该合并朝鲜。并提出如何通过朝鲜来制约日本、俄罗斯等等,显示了他远大的外交军事眼光和才能。最重要的是,又进一步地显示了他政治上的战略眼光,他不是就外交谈外交。他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反应,朝鲜的问题根源在大清,因为国家不安定、不太平、不强大。所以首先要固本,固国家的国本。他在《朝鲜善后六策》中已经提出,要搞各地的经济发展和地方治理等等。

通过和吴长庆在一起的经历,张謇的政治眼光更加开阔,政治才能得到进一步表现,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政治家的眼光和素质。这些都是发生在他中状元之前,前后有十年时间。后来吴长庆死了,张謇在朝野很有名气,大家都知道,他在政治上有情怀、有眼光、有才干。李鸿章、张之洞、张树

声等封疆大吏都很看重他，都希望把他招到自己身边当幕僚。但是张謇不同意，决心回家准备考状元。用他自己的话说：“南不拜张、北不投李”。后来，很多人认为张謇在这个时候，看到朝廷官员不争气，朝廷政治混乱，他灰心了，不想做官，想要回家走文人的道路，读一辈子书。但在我看来，张謇绝不是放弃了政治追求不想当官，不是因为厌倦官场，简单地回家读书，而是为了实现更大的政治抱负。张謇一生从来没有为做官而做官，而是为了做事而做官，为做大事而做大官。我们前面讲过，想当更大的官必须走“状元”这条路。李鸿章和张之洞他们毕竟是地方官员，没办法实现张謇全国性的政治抱负。张謇是从中国传统儒生秉持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一路走过来的，是要救国救民的。他认为，不管在哪里做幕僚都发挥不了这样的作用，只有站在更大更高的政治舞台上，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因此，张謇 40 岁的时候决定回家考科举，在 1894 年 42 岁时中了状元。

(三) 状元张謇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

1. 在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中参政议政

前文提到甲午战争前后，张謇刚中状元就发表政治主张，弹劾李鸿章。张謇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这和当时的宰相、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有关。翁同龢，常熟人，是张謇考状元时的主考官。张謇不仅文章写得好，又有十多年的地方从政经验，包括到朝鲜的经历，翁同龢对他特别器重，几乎是言听计从。甲午战争结束后，张謇的父亲去世了，张謇回乡守丧。守丧期间，他和翁同龢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政治人物密切联系，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坛上发生的事情。与此同时，他还在家乡开办实业。当时的两江总督是张之洞，他看中张謇这个状元，让他回到家乡做两件事，一是招商局的事，搞招商，搞实业，实际上是官差。二是搞海防，在南通海门一带办海防团练。戊戌变法前，帝党一派风生水起时，张謇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后，他积极参与维新变法，但是他感到尽管康有为、梁启超的理念是对的，在步骤和方法上却太过冒进，不大注意“统一战线”和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策略。于是，他尽

己所能劝翁同龢和康有为、梁启超，但作用不明显，光绪帝已经下定决心搞激烈的“休克疗法”式的变法改革。后来，翁同龢和张謇是一样的主张，认为改革要稳妥、重实效，不能简单地冒进，搞极端。但是这个时候，不仅慈禧不喜欢翁同龢，光绪帝也对他不满，认为他太过老成持重、保守僵化。于是，在光绪和慈禧的共同作用下，翁同龢被罢官回到家乡常熟。历史学研究一直认为，翁同龢是被慈禧搞下台的，其实他是在光绪和慈禧的共同作用下下台的。此时，张謇一看，大势已去，于是辞官回到南通。很快，政坛发生巨变，维新党人被彻底镇压，“戊戌六君子”血洒菜市口。从这个过程看，张謇是有政治抱负的，又有非凡的政治智慧。他政治上睿智稳健，既要改革又很务实。在他觉得维新派不听他的劝告，做法过于冒进时，他选择远离祸水。后来有人问他和康有为、梁启超是什么关系，他说：“我和康梁是群非党”。这既说明了他和康有为、梁启超的关系，也反映了他在政治理念和策略上更为务实。

2. 在“东南互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戊戌变法以后，慈禧掌权，光绪被排挤，国家比较混乱。慈禧准备废掉光绪，但是废光绪对传统的中国老百姓和一些封疆大吏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外国列强英、法、美的立场也是不同意。尽管光绪在戊戌变法中有偏激冒进的做法，但是轻易废掉是会国家大乱的。为此，慈禧太后很恼火，又没办法。这时候，正好义和团运动爆发，慈禧太后认为可以利用这股力量，于是怂恿和鼓励义和团运动，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义和团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针对洋人的教堂、传教士、商人，甚至外交官以及中国教徒，到处杀人放火，越闹越大，清廷也借机向各国宣战。义和团运动很复杂，不能简单说它是一场伟大的爱国主义运动。当然，民众带有爱国主义情绪，但更多的是一些盲目排外和民粹主义的情绪，可以说是被慈禧利用了。

在这种情况下，外国列强觉得中国不讲国际法和文明社会准则，于是八国联军开始武装干涉，从天津打到北京。眼看战火就要蔓延到全国，特别

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等中国经济最繁荣发达的东南一带。如果战火继续烧下去,国家就垮了,清廷也就完了。这时候,就形成了“东南互保”的思潮。意思就是说,东南的这些封疆大吏,包括总督和巡抚,和各国列强签订条约,互相承诺和保证,将战火控制在北方,南方不要打,外国人在东南一带的权益,包括企业、领事馆、机构、商人、教堂等等,中方都负责保护好。同时外国人也保证,他们管辖的租界地区,中国老百姓的财产、机构、企业、学校等安全也得到保护。张謇除了积极呼应之外,还在关键时刻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他和两江总督刘坤一关系很好。在“东南互保”的最后关头,刘坤一犹豫了,认为这是一种背叛朝廷的行为。这个时候,张謇出场了。他力劝刘坤一为了东南的大局,为了清廷的大局,为了整个国家的将来,不要犹豫,赶紧下决心同意“东南互保”。最后,刘坤一被说动,到上海与几个国家的领事签订了“东南互保”协议。

笔者认为,“东南互保”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意义很大。这实际上是中国深陷灭顶之灾时,东南各省督抚、洋务派官僚、新式绅商通力合作,智慧、务实地保家卫国之举。而且,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走向。如果没有“东南互保”,在清廷蛮干宣战时,八国联军把战火引到南方,中国很可能就四分五裂沦为殖民地,而通过“东南互保”,中国最繁荣最发达的地方被保下来了,既保住了中国的半壁江山,也保住了大清王朝。“东南互保”对于清王朝来说,某种意义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它一方面成全了清朝,让它苟延残喘下来,另一方面也败了清朝,因为从“东南互保”以后,中央权威急剧下滑,跌到谷底。而各地的地方权重急剧上升。形成了中央轻、地方重的政治格局,形成了市民、绅士、各级知识分子、中间阶层等都能自由发言的局面,也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新政”,以及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等等。因此,笔者认为,“东南互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3.在立宪运动中的政治领袖作用

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的大臣、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上书要求改革,不改革清廷就将灭亡。于

是慈禧太后痛定思痛,还在西安时就发布圣旨宣告改革,实行新政,以此刷新她的政治形象,重塑她的政治基础,重建她的政治权威。所谓的新政,当时朝廷内部有两种意见:一是延续过去洋务运动的路子,以经济发展与经济改革为主,就经济谈经济;二是认为要想国强民富,光搞经济不行,还得搞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立宪,要按照宪法办事。所谓立宪是君主立宪,君虚民实,把君王王权贡起来,世世代代承认他是国家元首的身份,但实际上搞的是民主政治,类似于日本或英国的内阁制。在刚搞新政时,第二种意见不占上风,毕竟传统保守力量强大,加上慈禧太后内心也不支持政治体制改革,因为一旦改革,皇帝就将变成一个虚职,就会触及到她的权力根基。

后来形势发生了改变,特别是到1905年,日本和俄罗斯为争夺中国东北土地发动了日俄战争,俄罗斯这个强大的沙皇大国被弹丸小国日本打败。这个出乎所有人意料的结果,让全体中国人感到震惊也大受启发。朝野普遍认为,日本搞了明治维新,变封建专制为君主立宪,国力和军事也因此变强,而俄罗斯没有改革,还是专制的沙皇体制,因此战败。于是,在全国,特别是知识分子和高级官员中形成一个共识,那就是体制是最重要的,必须加快立宪步伐。国内的立宪派开始占上风。全国8位总督中有5位上书力荐君主立宪。在这种情况下,清廷无奈同意,并于第二年废除了科举制度,还派出五名大臣出国考察国外的立宪体系,回来后开始着手体制改革。1908年,清政府颁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谕》,意即在九年内,要逐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立宪改革,构画出了立宪的时间表和线路图,表达了清政府立志改革的决心。可是就在1908年8月宣布这个改革计划不到三个月,慈禧和光绪就相继去世了。在这件事中,张謇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立宪派的精神领袖是梁启超,但是在立宪运动实际运作中,张謇是当之无愧的政治领袖。

(1)从事立宪考察研究和宣传鼓动。张謇对立宪也不是简单地盲从或顺应潮流,而是有自己的

考察和思考。他除了查阅大量书籍之外,1903年借着到日本参加大阪博览会的机会,去考察了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在日本待了70天,他对日本明治维新后政治、经济、教育、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细致全方位的考察。考察之后,他得出结论,君主立宪确实是好的,所以回国后下决心搞立宪。他首先印了很多宣传材料,包括日本宪法、各国政制等,发给大众和清廷高官。据他日记记载,慈禧太后都看过他的宣传材料并且认可他。1904年,他上奏朝廷,要求仿照日本明治维新变法颁布天下,定国名为大清宪法帝国。在朝廷内部,袁世凯在北方呼吁搞君主立宪,张謇则在南方民间宣传呼吁,影响很大。

(2)成立上海立宪公会和江苏咨议局。这两件事一虚一实,在立宪运动中很重要。立宪公会是全国最大最有影响的立宪宣传组织,张謇作为主导人,担任会长。这也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制度下第一次出现合法的民间社会组织鼓动宣传政治改革。这可以看成是“虚”的。而“实”的是在江苏成立了全国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咨议局。全国20多个省都承认江苏咨议局是头,也就间接承认了作为议长的张謇的领导地位。张謇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一方面呼吁推动立宪,另一方面又做了很多政治改革的示范,证明立宪是好的,这些行为有效推进了立宪运动的全面发展。江苏咨议局某种意义上说,是立宪运动的实验场和推动源。江苏咨议局的原址在湖南路省军区司令部大院里面,是张謇的学生孙支厦模仿日本的帝国大厦所建。后来孙中山宣誓大总统就是在这个咨议局里,而不是总统府,包括孙中山去世后的灵柩也是摆放在那里。

(3)组织国会请愿活动。当时,各地都觉得清政府搞9年立宪太慢,改革和危机在赛跑,如果太慢就会发生危机。于是,大家纷纷想加快立宪,要求早开国会。张謇作为各地咨议局的首领,深受大家的信任,也就当仁不让,召集了各地咨议局的代表开会,给清廷写请愿书。当时长沙的徐特立甚至断指送行,砍下自己的小拇指写血书表决心。由此可见,这个请愿活动很有影响力和群众基础,特别

是在知识分子中。1909年10月组织一次后,1910年又连续组织了两三次。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同意加快立宪的脚步,将时间从1916年提前到1913年。笔者认为,以张謇为领袖的国会请愿运动和整个立宪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过去政治都是官府的事情,而这一次却突破了历史常规,是政治精英群体和人民大众第一次联合掀起的大规模的群众民主运动,动摇了清廷的政治基础和合法性。这是三千年从来没有过的。虽然立宪有未完成的遗憾,但它却间接地促成了辛亥革命的发生,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巨变。可以说,是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联手推翻了两百多年的清王朝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

后来的很多研究者都偏向于研究张謇的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讲他办工厂办学校,而张謇本人在晚年编写自己的年谱中却写道:“一生之忧患、学问、出处,亦常记其大者,而莫大于立宪之成毁。”意思是,我一生中所有的大事都没有立宪这件事的成败大。说明他最看重的还是政治救国,认为自己的主要事业和成败在政治。从立宪运动可以看出张謇不同凡响的政治作为、政治才能和政治贡献。

4.转向共和与促成南北议和

中国近代史到1910年左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张謇从最初的倡导立宪转向了共和,逐步支持革命。张謇通过立宪运动发现,清廷名义上虽然支持立宪,也宣布成立责任内阁,但却是个“皇家内阁”,十几个内阁成员一大半还是满族王家贵族。张謇对清廷感到非常绝望,但他还是不断通过上书或书信等方式向清廷提出忠告,苦苦劝说,希望清王朝顺应时代、顺应民意、顺应大局,搞真正的君主立宪或共和。他希望能起到朝廷和民间的桥梁作用,做政府和人民之间沟通的融合者。同时,他也把希望寄予像袁世凯这样在清廷内有势力又有新政经验的大臣身上,希望能力挽狂澜。

1911年5月11日,辛亥革命发生前几个月,张謇在武汉汉口收了几个官办的纱厂后,坐火车

去北京,想进一步拜见庆亲王和摄政王,当面规劝他们。当他路过河南彰德袁世凯的老家时,他特意下车找袁世凯谈了5个小时(当时袁世凯被罢官后隐居在此)。根据张謇的日记记载,他们二人一边叙旧,一边谈论当前时势。通过这次深谈,张謇惊喜地发现,在他们28年没见面的这些年,袁世凯大有进步,胸襟见识比以前高多了,“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尤其是在谈到治淮问题时,张謇问袁世凯到底有利无利?袁世凯回答:不管有利没利,只要对老百姓有利、对国家有利,就值得一干。张謇听了立刻觉得“心目一开”,就更加认定要和袁世凯在复杂动荡的政局中联手,稳定局面。在转向共和的过程中,张謇做了许多直接影响中国政局的事情,包括和袁世凯见面出主意,去北京见庆亲王和摄政王等等。当他10月份再去武汉参加大维纱厂开工仪式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张謇开始并不支持暴力革命,他认为应该走改良主义的、循序渐进的君主立宪道路。所以10月12日,他回到南京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劝江宁将军铁良“援鄂”,赶快援助湖北,并迅速代铁良奏请“立行立宪”。然后,他又去苏州找巡抚程德全,代起草《奏请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在这过程中,张謇希望通过改革化解危机、平息革命,以立宪挽救清朝。但时间来不及了,形势发展很快,上海、苏州、杭州、南通都相继起义光复。当时通州(南通旧称)一开始是准备与革命军打仗的,后来转向共和支持革命了,民军推翻狼山总兵衙门,由张謇的哥哥张謇出任新成立的军政分府的总司令长,这说明,张謇及其家人是支持共和的。11月16日,清廷就把军事大权交给了袁世凯,让他组织内阁,稳定局面。

这种情况下,张謇的角色也开始发生变化,原来是“通官商之邮”,在官府和商人之间当“邮差”,当沟通的桥梁,现在要“通当南北之邮”,南边是孙中山黄兴的革命党,北边是清廷和袁世凯。张謇在这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实际是一手托三家。他首先劝清廷:革命爆发了,应该赶快顺应大势退位,革命党人和全国老百姓都会保你们世

世代在紫禁城里自享其乐,不会像法国大革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其次劝孙中山黄兴这样的革命党人:你们适可而止吧,虽然辛亥革命一呼百应,全国各地都宣布独立或认同共和,但你们的军事力量远不如清朝的实际掌权者袁世凯。再打下去,就要生灵涂炭,况且你们也不可能获胜,还不如就此收手,让袁世凯出来掌管局面。然后再劝袁世凯:你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清廷卖命,不要真的全部剿灭革命力量,否则你就是千秋罪人。将来我们会说服革命党人把权力移交给你,由你当国家领导人,让你成为像美国的华盛顿那样的一代伟人,开国领袖。他从大局出发,从国家稳定、减少战乱出发,在三方中斡旋协调,这正是张謇非常卓越的政治才能、政治智慧的表现。

辛亥革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研究的话题。有人说这是一场不彻底的、妥协的、甚至是失败的革命。实际上,在张謇等人的努力下,各方势力和利益,通过妥协与和解都得到了关照。清王朝留在了紫禁城,袁世凯当了国家领导人,革命党人革命完成,老百姓免受战乱,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成立了。孙中山说革命大功告成,要继续去建20万公里的铁路。从某种意义上说,革命是成功的。当然,从一开始,这个革命就带有先天不足,它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在妥协中,张謇这样的改良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准备参加临时大总统的选举。第一天就和张謇会面,听取他的意见。张謇希望孙中山能发挥自己革命领袖和临时政府的作用。实际上现在看来,辛亥革命的临时政府从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打算当做过渡,等清廷退位后,再把权力全部移交给袁世凯。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3日,孙中山和张謇商议大政方针,遗憾的是,这次谈话之后,张謇觉得孙中山治国策略有点空,不了解中国国情,有点不着边际,他在日记中写他的谈话是“未之崖畔”(不着边际)。于是张謇更加坚定地认为,应该将政权交给袁世凯,并积极游说各方。

1月10日,他致电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

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意思是第一天清朝退位,第二天就拥护你,东南各方,包括革命人、立宪派、封疆大吏、知识分子都已商量好,所以你赶紧让清廷退位吧。2月12日,袁世凯逼清帝退位,诏书发布。不久,张謇辞去了孙中山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几天后临时政府也解散了。3月份,袁世凯当权,请他当了工商农林总长兼水利局总裁,干了将近两年。过去有种研究认为张謇实际上不赞成革命,意思是临时政府请他当实业总长他不干,袁世凯请他去,一干就是两年。其实,这与是否赞成革命无关,他认为哪边能干实事,他就帮哪边干。他做官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把当官和做事连在一起。张謇在自身完成由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蜕变的同时,也促成了中国从封建政治到民主政治的革命性转型。

5.任工商(农林)总长时政绩独特

(1)重视立法,依法保护实业发展。为什么说独特?一是因为他在任职期间,搞了大量的立法。中国近代许多经济、政治方面的立法,包括早期民国政府百分之七十的立法都是他搞的。立法涉及方方面面,有银行法、权度法、典当法、国币条例、证券交易法、中国实业公司条例等等。他任工商总长后说过一句话:“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说明他看得很清楚,办企业、抓实业要靠政治。当年他到日本考察时,碰到东北一个老实的农民,大字不识,到日本北海道开垦荒地多年,很成功,成为日本的劳动模范,连天皇都嘉奖他。他就想到国内,中国这样的老农民何止千万,却连自己都养不活,这是为什么?张謇觉得这是制度问题,是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问题。所以他认为搞实业一定要有好的政治环境,而好的政治环境在于搞法制。法制使政治的规范性、稳定性、长期性有了保障,国家的经济才会持续发展、长治久安。他有句名言:“法律犹如轨道,产业入轨道则平坦正直,毕生无倾跌之虞”(一辈子都不用担心跌落),“不入轨道,随意奔逸,则倾跌立至”(不在轨道上走,随时都会翻车)。他对经济和政治以及政治与法制的关系看法相当精辟,相当深刻,对我们现在也有启

发。后来张謇回到南通办企业,和这些官员关系都很好,深谙官商关系之道。所以企业搞得很成功。

(2)秉持“开放主义”和“世界眼光”。他说,办县的事情,一定要有省的眼光;办省的事情,一定要有全国的眼光;办国家的事情,一定要有世界的眼光。他思想开放,视野开阔,主张通过合资、借款、代办三种方式引进外资。张謇还有现代的行政和经济管理理念。他搞机构改革,把农林和工商两个大部合并起来,把八个市局改成三个市局,并大量精简人员。然后要求他们不要具体地管项目、办琐事,要宏观指导全国性的经济发展和搞好查勘规划。

(四)“南通模式”是张謇地方政治的结晶

一般认为,张謇离开政治舞台回乡所创造的“南通模式”,是实业模式、教育模式,充其量是城市建设模式,而笔者认为这实际上是综合性的政治模式。南通先有了大生纱厂,因为需要棉花和原料,就办了垦牧公司,后来产品需要运输,就开办了轮船公司、开运河,再后来又办厂造机器设备。各种产业形态都有了,他又为了集聚资金搞了股份制,中国最早的股票就是南通的大生纱厂的股票。除了搞集资,他还成立了淮海实业银行,后来还当了交通银行的总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代经济的模式,也是大家最津津乐道的。后来进一步发展,他不仅搞实业,还建了近四百所学校,从幼儿园、小学到大学,从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张謇自己说,“父教育母实业”。经过实践,他又觉得不能光讲实业和教育,于是又搞慈善、做公益,做了很多利于民生的事。于是,“南通模式”就成了一种地方自治的形态。

所谓的“地方自治”,表面上看是清政府在被逼之下宣布搞新政时的一个举措,要求发动地方上的老百姓、士绅,一起管社会、办事业。张謇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回到南通搞地方自治,但又超越了地方自治。他不仅搞实业、教育、慈善、公益,还搞城市建设和市政管理,为南通留下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美名。更让人称奇的是,他还搞自己的警卫队,花钱改造监狱、驻军营房,建妓女改造所和

戒毒所等。他破天荒地发动民众选举,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省以下的“准议会”——通州议事会,并亲任议长。议事会及随后的地方自治会成立后,创办测绘局、调查户口事务所、法政讲习所、清查公款公产事务所等一系列“准政府”机构,干了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是他的政治行为,“南通模式”也就是地方政治的模式和结晶。

人们都说张謇是企业家,但笔者觉得定位太低,他至少是南通城市的设计者、规划者和建设者。说他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定位,没有从他作为政治治理的主导者的角度去考虑。2003年笔者见到两院院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时,曾向他介绍张謇开辟了中国近代很多第一,包括第一个师范学院、第一个博物院、第一个气象台,他却从建筑学家的角度送给张謇一个“第一”: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建造者。他说:张謇把一个现代化或者近代化的南通建立起来了。多年前,笔者在编写《辞海》大百科全书建设条目时,就写南通的张謇在城市建设上的理念和成果。而这是第一次有人从综合性、整体性的角度看张謇在南通的实践和成果,很有同感。吴良镛在谈话中还说:你看,南通这个一城三镇的布局多好啊!当时与欧美国家相比都不落后。当时一个叫霍华德的英国建筑学家所说的园林城市的概念,就在你们南通提前实现了。笔者后来宣传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但当时大家都不能接受,包括南通人自己都不能接受。但后来经过专家论证,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作为一个中国人,以一个完整的地域对象来整体地设计规划建设城市,南通的张謇是第一。有人说上海更早,甚至包括青岛、宁波、大连等地方,但这些地方只是作为租界局部的几条街道,租给人家几个小区域,由外国人主导设计,不能叫做中国近代第一城。

总之,南通模式是一个综合性的模式,说到底还是政治方面的结晶,是地方政治治理的成果。那么,张謇在南通模式中的政治运作有哪些?笔者概括了“四个充分运用”,一是充分运用地方自治政策。当时的中央政府同意搞地方自治,他充分加以

运用,并且大大加以发挥和扩展,真正做到了“用足、用活”;二是充分运用特殊政治身份,他是状元、是翰林,又是立宪派领袖,还当过中央的工商总长,这些身份让当地的政府大员都能支持他;三是充分运用省级官僚的授权和支持(包括张之洞、刘坤一、程德全等),在这种情况下,张謇可以甩开膀子干他的事业;四是充分运用当地老百姓的拥戴,张謇一辈子为南通人民做好事,并具有先进的思想和理念,深得老百姓的认可,以非官员的身份,做官员的事情,自然也就可以做得通了。

“南通模式”的影响并不只是在南通,实际上,张謇在南通现代化的试验和探索中取得的成就就可以影响全国、示范全国。张謇在南通搞地方治理与全方位的政治活动,实际上是受到一个人的激励,就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也是清廷的顾问和老师。他有一次对张謇说:现在中国又落后又乱,你在地方上应该做四件事情,第一是搞好实业,第二是搞好教育,第三是搞好公共卫生,第四是搞好公益。这四件事情搞好后,中国就可以进入一等强国的行列了。这四件事情中,能干好一两件也行,至少不会沦落到三等国家之外。但如果这几件都干不好,那肯定是最差的国家了。现在不知道你们中国哪个省、哪个县,哪个地方能干成这四件事。张謇听了之后很受刺激,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南通干成这四件事情,而且要示范全国、引导全国。

张謇回南通干事的初衷是,“以成鄙人建设一新世界雏形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而且他还讲到:“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他在南通搞地方自治的思路是,兴办实业一定要有见识,要有见识就要让民众普及教育,要让教育与实业互为基础,互相促进。教育和实业相互作用,获得成效之后,再发展慈善,搞公益事业,进而推广到城镇建设和市政管理,最终是搞政治建设,治州理政。实际上他在南通就是不是州官的“州官”。

张謇是中国现代化成功的开拓者,南通实际上是中国现代化的试验田和示范区。笔者在2006

年召开的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说过：“张謇先生在家乡南通进行了前后长达 30 年，全方位、系统性的早期现代化实验，并相继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使南通从一个封建闭塞的小城一跃成为当时著名的‘模范县’，被外国友人誉为‘中国的乐土’、‘理想的文化城市’，创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的辉煌。”

当时一般人把张謇当作失败的英雄，这出处来自于胡适为张謇儿子张孝若所写张謇传记序言中，胡适说：你的老父亲二三十年做了这么多事情，但还有许多没做成，是一个伟大的失败英雄。张孝若很认同，他们两人共同的依据是，张謇很多志愿没有得到实现和完成，所以是失败的英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都按照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几乎古今中外的历史上就没有成功的英雄了。有哪个英雄人物不留一点遗憾，不留有未尽事业，能把一生想干的事情都干成的呢？在笔者看来，张謇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的开拓者，他在历史给定的条件、时代所给定的环境下，把该做的都做了，他就是成功者。张謇有一句至理名言，他说人和草木是一样的，都会死去的，但人若留下了一些事业，就不会和草木同死，就会永远存下去了。这实际上说的就是人的成功之道。孙中山在 1922 年见到张孝若时也讲：你父亲了不起，他是实干家，做了很多实事。我是空谈、空想，什么事都没干成。当时他拿了自己的一张相片和一本书，亲笔题名让张孝若带回去给张謇，现存在张謇博物馆里。这说明，大家都认可他是个成功的人，不管是实业家，还是政治家。

总而言之，从考状元前后的经历，到历史上大事件中的表现，一直到回家乡地方上搞地方自治，张謇的主要抱负在政治，主要经历在政治，主要作为在政治，主要贡献在政治，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家。他和其他政治家不同的无非两点：第一，他不是直接当官；第二，他同时兼有企业家、教育家的身份。他的儿子张孝若也说过，他的父亲如果早生若干年，在贤明君主的朝廷里，可以做一个治世的能臣。如果迟生若干年，在民主政治确建以后，

可以做一个成功的福国利民的政治家。纵观张謇的一生，他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政治活动。他从 22 岁到 74 岁去世，50 多年的人生基本上都在搞政治。22-42 岁的二十年主要在搞地方政治，42-62 岁的二十年搞全国性政治，62 岁到 74 岁去世的十多年，名义上是在南通搞地方事业，实际上他是着眼全国，背倚东南立足南通，为全国搞一个试点，搞改革开放、现代化的试验区，同时也在搞政治建设。

很多资料显示，即使晚年在南通期间，张謇也并没有关起门来，只搞南通这一亩三分地。1925 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罢工事件，全国人民呼吁支持纱厂工人反对日本人的压迫和剥削，张謇带头认捐；孙中山去世时，他代表地方主持追悼大会；蔡锷去世时，灵柩路过南通，他组织全市人民举行公祭；军阀混战时，他不断为民请命，协调各方，很多全国的政治活动，他也直接参与了。所以，笔者认为张謇秉持了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念。他进则搞全国“大政治”，顾及南通；退则搞地方“小政治”，影响全国。不管怎样，他从未忘记救国救民和强国富民的政治理想，也从未停止过对通过现代政治促进现代经济社会转型的探索和开拓。夏骏（资深编导、制片人）对张謇有很高的评价：“张謇对现代中国立国的贡献，过去都是低估的。在激烈的变革乱局中，他以仁爱之心倡导和平、建设、理性过渡，始终站在民众的立场考虑问题，散发着不朽的光芒。”“张謇是在中国农业文明和传统官场的套路上转圈的人，可他又成为现代化的开路先锋，是一个奇迹。”潘岳同志曾撰文《谁是张謇》引发大家的思考：张謇到底是谁？他是什么身份？有哪些历史贡献？文中举例说他是实业家、教育家，但政治色彩更浓。他认为我们对张謇的研究还远远不到位、不全面，值得深入研究。这说明大家都在慢慢认同张謇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贡献，以及政治家的地位。

二、张謇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

张謇给南通留下了许多工厂、学校、市政建设，那么给南通精神、南通的文化遗产留下了什

么?城市精神就像人的灵魂,像我们说的核心价值一样,能代表整体状态。一个城市发展得好与不好,要看这个城市的精神气质、精神动力。张謇在打造“中国近代第一城”的时候,也打造了近代的南通精神。南通近代的城市精神是张謇一手孕育出的,对南通城市的突破性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张謇对近代南通精神的孕育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自身行为的示范引领

1.志存高远,脚踏实地

像张謇这样主导性的人物,他在方方面面的一言一行都起到表率作用。他志存高远,脚踏实地,给人一种新的精神和思想理念。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人很多,但同时脚踏实地做出成效的人不多;肯干务实的人也很多,但同时拥有崇高的境界与远大志向的人不多。既有远大抱负又能求真务实脚踏实地做事,这在张謇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这种精神不仅在创办工厂、创办学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也是这样。他有崇高的现代民主政治理念和远大的政治变革志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态度及其在南北议和中的表现,都体现了他不冲动冒进、稳健务实、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他对李鸿章、袁世凯态度的转变也是一个例子。一开始张謇觉得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中的立场不对,立即上书弹劾,后来看到李鸿章掌握大权,主政比较务实时又拥护他,乃至在庚子动乱时,他主张以李鸿章为首领,率各地总督捍卫朝廷。对袁世凯也一样,最初张謇觉得袁世凯品行不好时与之分裂,后来看到袁世凯的能力与格局提高,又主动握手言和,都说明了他是个务实的人。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大局出发。他儿子张孝若也说:他抱定主义,立定脚跟,要创造一个新局面和新事业。孙中山也评论他是干实事的人。笔者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实践、有成就的人。

2.开拓创新,与时俱进

张謇作为新旧时代转换中的士大夫,眼光超前,思想解放,紧跟历史潮流,站在时代前沿,在各方面奋力开拓,不断创新,创造了不朽的历史功

绩。胡适说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笔者认为,不仅仅是实业和教育,包括整个现代化的政治和经济,他都在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特别是在与时俱进方面,非常难能可贵。办工厂,一开始起点就很高,搞现代公司治理,搞股份制等等。他在政治上的不断地转变和跟进,往往被后人议论为“多变”,实际上笔者认为这个正反映了他了不起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因为时代在变,形势在变,他也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思想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而且,他的变不是往坏处变,不是往后退变,而是往好处变、往前进变。不管他怎么变,始终是围绕着“强国富民”的政治抱负在变,根子上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以,我说他的变是与时俱进的,不管是维新变法、君主立宪还是共和。就像张孝若说的,“他总是握紧了两个拳头,抱定了一个主意,认准了一个方向,直视往前走,总想打通了这条路,去造一个新世界。”

3.开放包容,兼收并蓄

他秉持“开放主义”,对国外开放,对南通之外的地方也开放;对资金、科技、企业管理等生产要素开放;对外来的文化艺术、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文化元素也开放,全面兼收并蓄;对人才也持开放的态度。在当时中国极度混乱、落后、贫穷的局面下,历史上的许多中外名人都来过南通,王国维、梁启超、竺可桢、丁文江、陶行知、梅兰芳都到南通和他见过面,探讨过问题。有来自日本、荷兰、英国的七十多名专家在他的公司工作。江泽民同志的祖父江石溪和张謇也曾有一定的关系。江石溪是江都人,原先与张謇素不相识。张謇办了工厂后,要搞运输业,办轮船公司,从南通开到扬州,扬州人就不服气,抵制他,不让他到扬州地盘。特别是有两部分人抵制得很厉害。一部分是码头上的混混、帮派团伙,还有一部分是当地的盐商大户。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让张謇在当地找个有名望的人、社会上都认可的人去协调,后来就有人推荐了江石溪。江石溪是中医,平时还讲学,很有声望。在江石溪的帮助下,当地的盐商大户、小混混都不再惹事生非,张謇的轮船公司顺利通航了。后来,两

人在交往中相互仰慕,变得很要好,张謇就让江石溪到自己公司,做轮船公司的总经理助理。江石溪很有现代科技的眼光,当时运河里水草很多,他设计的除草机将草除掉后,船就能通畅航行,江泽民 2008 年到南通时还问能不能找到这个除草机的图纸档案。这个故事说明张謇心胸很开阔,能识别和使用各方面人才,这和他的开放主义和世界眼光是分不开的。

(二)地方治理的教化

近代南通精神是怎么形成的?南通人的思想观念是怎么大幅提升的?我觉得和地方治理和地方政治建设有很大关系。一方面现代化市政建设和管理,必然会促成现代化的观念形成。为什么落后国家、落后地区形成不了现代观念呢?因为没有现代的物质载体。但是张謇在南通搞了一批现代化的载体,奠定了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现代化的设施和功能在启迪民智的同时,必然催生民众现代意识的形成。张謇办了许多学校和公共设施,教化功能更为直接和明显。他一方面给予民众以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一方面又培养具有新时代素养的新人。南通走出了一大批科学家和方方面面杰出的人才,追根溯源都和当时的基础和源头分不开。在这种情况下,南通必然在全国率先除旧布新,移风易俗,领风气之先,形成新的城市精神。所以,蔡元培写的对联说道:“为地方兴教养诸业,继起有人,岂惟孝子慈孙,尤属望南通后进。”

(三)时代精神的倡导

他一方面在示范和教化,一方面又在大声疾呼倡导时代精神。概括地说,张謇主要倡导以下三种精神:一是除旧布新,变革图强。在新旧时代转换的时候,旧势力错综复杂,张謇能带头转型,精神难能可贵。他儿子张孝若说:“父亲的思想事业很有创立的精神,看事常看早 10 年,做事必须进一步,思想要有时代性,实业要应着世界潮流,没有顽固的成见”。二是文明和谐,尊法守信。张謇对股东、对职工都很好,他让股东得到利益、职工得到好处。他对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弱势群体、扶贫对象更好。他号召要以法为本,忠实不欺。他认为,

大家都要自觉守法,这是社会的根本和灵魂。他的哥哥张謇在做警察局长的时候规定,晚间车辆、轿子行走时一定要点灯。有一次,张謇手下抬轿子时没点灯,被巡逻发现要罚款,张謇不但认罚还给这个巡警奖励,这说明他带头守法的意识非常强。三是艰苦自立,奋发进取。他在各种经济和政治活动当中都强调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艰苦奋斗,与时俱进,各尽所能,奋发图强,不断进取。中国近代著名建筑设计师孙支厦还未成名时,曾经在张謇邀请日本人为其学校设计平面图的时候担任翻译,中途这个日本设计师抑郁症发作自杀了。结果,设计到一半的图纸没办法接着搞下去,孙支厦就接手做了下去,而且做得很好。张謇发现他这个人才很是珍惜,送他到大学深造,毕业后留在公司重用。孙支厦在张謇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时代精神感召下,设计了很多著名建筑,被后世公认为中国近代最领先最先进的建筑设计师。

那么,南通精神到底是什么?笔者认为近代南通精神是一种变革的精神、创新的精神、创业的精神、开明的精神、包容的精神、开放的精神。张謇不仅是南通实业之父、教育之父、城市之父,也是南通精神之父,是他一手孕育了近代南通精神。笔者在 2006 年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讲过:“我们要更深刻地理解和继承张謇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精髓,更深刻地感悟和弘扬张謇先生身上所体现出的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泽被乡里的爱民情怀和脚踏实地务实风范。”

三、南通精神在当代的弘扬

既然张謇孕育了了不起的南通精神,那么南通精神在当代又是如何继承和弘扬的呢?南通人一直很珍惜张謇孕育的南通精神。在本世纪初,笔者主政南通时经过调研思考,决定要打好张謇这张文化牌。2003 年时,我们利用吴良镛评价南通是“中国近代第一城”的契机,对张謇的成就和精神文化遗产进行了宣传和推广。2005 年,我们又抓住省委宣传部统一布置各地级市都要搞城市精神建设大讨论的机会,将之作为弘扬南通精神的良好

契机。我们从年初发动和组织南通精神大讨论,呼吁全民讨论、召开讲座、座谈、发表文章,甚至用手机收集上万条信息,持续了近一年时间。在此基础上,选取了几千条城市精神的概括,然后继续推敲、提炼。

对南通精神的概括和提炼遵循了三个原则。第一,传承历史。要看看南通历史上到底有什么,不能凭空想象。看看远古历史,即南通的海洋文化与移民性格;看看近代历史,张謇精神文化的传承。南通很早就被评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很多人不理解,觉得南通除了张謇没别的。笔者觉得,恰恰就是因为近代出了个张謇,评选出的200多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是因为远古时期的历史,唯独南通一个城市是因为近代历史,这也是特别之处。第二,观照现实。在近代南通精神的基础上,南通人在当代也进行了创造性的实践,形成了优秀的品格、精神和作风。同时也要关照到南通自身存在的不足,由于南通三面环水、交通不便等方面的限制及其本身的文化特点,南通人有时闭塞、胆小、格局不高,加之移民很多,互相戒备,容易产生“内耗”等问题。第三,引领未来。定了城市精神以后,不仅是现在管用,将来也要管用。要引领未来,推动未来,符合未来城市发展的需要,发挥城市精神的坐标、导向作用,发挥对城市未来发展的精神动力及支撑作用。通过对这种城市精神的弘扬,提升城市品位,塑造一个凝心聚力、政通人和的和谐南通。

在这三个原则的遵循下,南通精神最后被确定为八个字:“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确定了这八个字以后,一切工作的开展都以之为旗帜、为引导。我们以城市精神来衡量做事的成败,做到了就给予表扬和鼓励,没做到的继续鞭策和努力。事实证明,精神的、文化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做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通过对南通精神的弘扬和倡导,南通人在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当时概括了南通在五个方面的变化:城市面貌、经济面貌、社会面貌、生活面貌、精神面貌。其中,笔

者最看重、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精神面貌的变化。南通人现在更加包容了,更加开放了,心胸和视野也更加开阔了,对外来的生产要素,包括企业、资金、技术、人才,更愿意接纳了;对外来的文化元素,包括思想观念、生活方式更加接受了,南通人更敢想敢干了,敢干别人没干过的事,敢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人际关系也更为融洽。这些都在改变人的精神面貌的同时,给城市的各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特别是“敢为人先”的光大弘扬,更是引领南通人创造了许多争先创优的当代奇迹,圆了精彩纷呈的“南通梦”。

今后南通城市有形的东西还会不断变化,但“南通精神”这个看上去无形的东西,却会永放光芒。这里,摘录一段笔者在第四届张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大力弘扬包容会通、敢为人先的新时期南通精神,奋力推进跨越发展、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开创出速度效益双双领先、外资民资比翼跃升、江海开发联动突破、城乡县域整体跨越、三个文明协调推进、农民市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既快又好发展局面,成为长三角发展最快、活力最足、潜力最大的城市之一。”直到今天,我仍觉得南通在各方面还是走在前面。前不久,江苏省委娄勤俭书记到南通视察时提出了“三个先锋”的定位:“争当全省解放思想跨越赶超的先锋,争当全省高质量发展的先锋,争当新时代全省干事创业的先锋”。这“三个先锋”的定位,也是继续弘扬南通精神的要求。

笔者在总结南通精神时,一直想到文化名人余秋雨十年前在南通讲的一些话。他说张謇了不起,他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范本,用实际行动向全世界发了一个“南通宣言”。他没写在纸上,但是他用南通的成就向全世界宣告我们中国人行,中国人能搞现代化。他认为南通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黄金期,“南通天时地利人和集于一身,百脉俱开,路路皆通”。

责任编辑:宋好

我们以什么贡献这个时代

——从“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谈起

言恭达

摘要:本文从剖析“当前书法创作学术批评展”的艺术作品入手,综合梳理当代书法创作的基本态势与特质、存在的“通病”与纠正的良方,并对当今书法生态、时代创作审美之路以及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全方面的阐述,从艺术哲学思辨中明确书法创作的发展方向,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批评;哲思;活化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5-00016-08

一、“学术批评展”之议——创意与得失

纵观百位优秀中青年书家的作品,首先感到欣慰。从这些作品中观众能感受到传统书法进入当代的活力,很多作品不仅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也给我们带来心灵的震荡。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程,当代中国书法也练就了一批精英人才。他们是自信的、成熟的,也是砥砺奋进的。在中国书法史上,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这一代中青年,几经磨炼,已是当今书坛的主力。他们艺术创作精力充沛,审美思维活跃,融合取向丰裕,传统笔墨扎实,形式创造新颖……广阔的视野与多维的视角证实了他们在今天喧嚣繁杂的书坛热潮中是走向理想天地的探索者与实践者。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由于这代中青年书家的艺术实践,让今天的中国书坛更加

丰富并充满活力。

(一)参展作品的特点

从今天的展览,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书坛艺术创作的一个缩影,呈现出四个特点。

1.传统回归的呼唤。无论是帖学还是碑学或碑帖相融,中国书坛在近四十年来已逐步走向稳定与健康。多元取法,多彩统一,不管是二王书风还是明清书风、简牍书风等等都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尤其可贵的是,回归传统不是复制传统。本次展览中不少作品已在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个性化艺术语言符号的强烈风貌,彰显了与时俱进的艺术探索理念。这种正大气象,正是当今生活美学中的主旋律。

2.形式创变的合度。毋庸讳言,展厅时代需要书家作品展示形式的多样化与丰富性。书家书写

收稿日期:2019-08-30

作者简介:言恭达,清华大学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

形式、用材色彩等随着社会的开放、审美理念的多元,书艺挥洒的空间艺术增添了平面构成的时尚色彩,这是今天大众审美需求的必然。曾几何时,由于社会快餐文化与时尚追逐的多层效应,新鲜刺激、五彩斑斓的“超现实”“古遗存”充塞了各类全国书展,似乎已成了展厅传导空间中视觉效应调节的既定习俗。然而,本次展览作品形式已逐步走向单纯与自然,回归到汉字艺术自然书写的本真。

3.写意诗性的强化。书艺情性的舒展、尚趣的寻求、个性化的创作集中体现了当下书坛审美情愫的主流风格。同时,以书体传承中的互补、借鉴、融通,逐步形成各类具备强烈个性意识的写意风格。楷书融入人意、篆隶草化互借、草书(大草)结体通势大开大合、行草书体互通递变、行书取法向度拓展等等,这些有效的探索、理念的转换与意趣的生发已成为今天中青年书法创作的显著特色。

4.人文内质的提升。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不少作者已远远超越了单一的书法技法训练,而进入了中华传统诗文的深入研习中。展览呈现的作者自作诗以及对古代书论的深入研究等现象,预示着书家修养的全面性。

(二)参展作品呈现的问题

当然,作为一个学术批评展,我们也必须正视展览作品中所呈现出的各种问题。其实,这也正是当前中国书坛艺术创作中的“通病”。

1.轻视笔法。历代书论对用笔用墨均有严密高标的要求。作为书法艺术内形式的笔法,更是重中之重。此展有少数作品重形式,轻内涵,重趣味,轻线质。笔法粗率随意,笔阵混杂。反映在篆隶结字失调,通借不当。按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所示:逆入、涩行、紧收是行笔之要。书写篆隶,往往忽视“涩”字,顺笔拖刷,更谈不上裹锋使转、逆势涩进了。大草在于使转合度、虚实相宜。不能用笔使转因随性开合,致使空间夸张中线质浮薄而飘忽,虚实失当。将大小草笔法混同,提按技法在非自觉状态下失之迷途。欧阳询《用笔论》“夫用笔之体会,须钩粘才把,缓继徐收,梯不虚发,斫必有由。徘徊

俯仰,容与风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发笔处,便要提得起笔,不使其自偃……不可信笔,则一转一束处,皆有主宰。转、束二字,书家妙诀也。今人只是笔作主,未尝运笔。”刘熙载《艺概·书概》“书家于提按两字,有相合而无相离。故用笔重处正须飞提,用笔轻处正须实按,始能免堕、飘二病。”我们可以看到展览中,有的草书作品猛一看满纸云烟、意态烂漫,细琢磨笔法混杂,甚至连笔都未提起,顺势平拖挥洒。行书笔法中的“绞转”,笔尖与笔锋使用不同,以写小字的笔法放大写大字,以写小字的线质替代大字的线性,此现象在一些作品中较突出。书法艺术需要形式与气势,但它们均建立在线性内质的基础上。

2.用墨单一。古云,“书法唯风韵难及”,其关键在于笔墨的丰富性、多变性。当下书法,用墨失察者居多,尤以篆隶创作,普遍用墨太实,甚至通篇不见墨法变化。“黑处见力量,白处欠工夫”这是黄宾虹先生在林散之32岁第一次见面时的批评语。用墨之法,浓、淡、润、渴、白,其要领是“带燥方润,将浓遂枯”(孙过庭《书谱》),以燥中见润,浓中显劲,于笔法中力现墨彩与墨调,增强书法的艺术表现力。浓欲其活,淡欲其华,润可取妍,渴能取险,白知守黑。当下书坛好多书家的理念还未从清代碑学的藩篱中冲破出来,承继清代“乌、方、光”的用墨习惯,不善于也不敢用渴墨。“燥锋、即渴笔。书家双管有枯笔二字,判然不同。渴则不润,枯则死矣。”(梁同书《频罗庵论书》)渴墨之法,妙在用水。“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渴笔用墨较少,涩笔逆行,苍健雄劲,写出点画中落出的道道白丝。而在渴墨的应用中,常常离不开涩笔。涩笔,衄错艰涩,行中有留。蔡邕《九势》中说,“涩势,在于紧駃战行之法。”古人有“如撑上水船,用尽力气,仍在原处”。林散之先生在《谈艺》中说得好:“怀素能于无墨求笔,在枯笔中写出润来,筋骨血肉就在其中了。”“碑要看空白处”“乱中求干净,黑白要分明”。他还说:“临《书谱》要化刚为柔,最难是要写出虫蛀纹来,笔画象虫蛀过一样。”苍中藏秀,乃是真苍。我们今天的时代,既不是在清代,也不是在唐

代。我以为今天是个写意的时代、造虚的时代。庄子的“虚”“静”“明”，老子的“致虚极，守静笃”在今天同样要求我们认识到，好作品必须重虚处，而不是在实处。

3. 气格下降。古人常以“书画，当观韵”，“书家贵在得笔意”告诫后人。“气韵生动”是谢赫“六法”之首。北宋郭若虚评论“六法精论，万古不易”。气与韵始终是中国书法艺术的哲学思辨，是书法创作本体的主旋律。当下问题是将气韵与形式对立，注重点画技巧，忽视气息流韵。或形式夸张过度，或太过于追求笔墨的浅薄趣味而将艺术境界降格。本次展览中有个别作品重张扬，失纯净，一味追求个性风格而忽视了作品的艺术品格。以致书格熟俗，气象平弱。赵宦光在《寒山帚谈》中评论道“文章以体制为格，音响为调；文字以体法为格，锋势为调。格不古则时俗，调不韵则犷野。”这正证明了凡文学艺术均以气格为最重要。“古质今文也，世贱质而贵文。文则易俗，合于情深。质者如经，文者如纬。若锤、张为枝干，二王为华叶，美则美矣……”（张怀瓘《六体书论》）笔墨技巧根植于主观情思。笔墨本是写人的胸襟，笔墨虽出于手，实根于心。古人评论“……鄙吝满怀，安得超逸之致，矜情未释，何来冲穆之神？”故“心醇”才能“笔和”，“识到”才能“笔辣”。

4. 创变浮浅。“通变”是中国书法发展的基本规律。今天书法的生存意义已从实用价值转为艺术功能。书法原有的“日常书写”已变成“艺术欣赏”。因此，今天的书法应立足于艺文性，不仅仅是线性图式，更是人文精神的诉求。我们提倡“自然书写性”是指按照艺术规律与学理、审美要素与法则，会通并畅达地表现高度的艺术性。以林老为例，他的草书“以二王为衣钵，怀素为宗，王觉斯为友，祝希哲、董香光为宾”，到晚年创作进入化境，欣赏他九十岁时的草书作品，我理解为：化长为短，化熟为生，化圆为方，化连为断，化繁为简，化实为虚的“六化”。由此可见，书法的时代创变是极不容易的，它不是单一的形式变化，更是内质的转换，气格的升扬。此展览中有个别作品片面炫技，学古浮

面，取法浅薄，“创新”只是表面的视觉效果。从书法到布白，只求个性风格的凸现，现代意识的张扬，形制夸张而忽视内质，或在某一古代书家风格的基础上将小字笔法放大为大字范式，致使线条僵直无起伏起讫，用墨凝重无虚实照应，作品风韵不足，缺乏生气与活力。我以为，一个时代的艺术创变必须将传统的特点、时代的特质和个性的特色有机融合，以中国传统哲学思辨合理地求证书法艺术向内、重和、尚简、贵神的审美特征。

因此，当下书法艺术创作必须处理好三重关系，即传统的坚守与现代性的提升，功力的强化与诗性的舒展，形式的多变与内质的注重。“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的社会审美将在新时期的生活美学中被强化。这就是“格调情怀的第一性，技法乃第二性”的文化精神性将进一步注重。

二、当今书法生态之辨——共赢与失落

1980 年至今，中国书法经历了从传统书斋艺术转向大众展示空间的探索发展期，从艺术视觉形式追求到经典技法现代转型的稳定深化期，从艺术创作思想追寻到形式与内容融合的文化思考期。这一历程证实了书法艺术与其它民族艺术一样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书法艺术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生态的演变和人们精神诉求的变化而不断嬗变与完善。

近 40 年的“书法热”，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群众书法运动，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所承载的大众心理与审美追寻，表达了当代书法主流文化必然推进的“路线图”。这为中国当代文化描绘了极其灿烂的一页！然而，毋庸讳言，在经济高速发展，人们生活形态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转型期，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提前或同期去架构时代的文化理想，以致社会价值判断与行为导向异化为“时间就是金钱”的唯一标准，而文化价值与文化创造的终极指向降落在价格指数。

应该看到，近 40 年的当代“书法热”，无疑带来群众文化的繁荣，民族生活方式的传承，同时也带来价值观念的多元，休闲情趣的寻求以及“民粹文化”的膨胀……表现在某些书法民族文化立场

的转移,传统艺术价值体系的颠覆和审美评判标准的缺失。

然而多年来,当代书坛也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艺术时尚鼓噪、创作精神平庸、经典书道异化、核心价值偷换,等等。在当下社会多元格局却又如此同质化的功利主义消费市场的弥漫中,哲学的贫困、文化的缺失、思想的苍白,传统命脉似连又断的危险时刻在逼近我们,例如体现在艺术创作中的形式至上、“丑书”现象、时俗扩张、批评失语种种现象,值得广大书家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书法既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从承继到出新的艺术历史转型期,又面临一个在市场经济蓬勃发育下社会文化生态危机与人文精神失落的世俗泛化期。各种艺术思潮的碰撞、流派的纷争,让各路书家精神抖擞地跨进了艺术创变的角力场,探究并辨析着一波又一波书风演变与发展的轨迹,喧嚣的书坛丰富且杂陈,生动又粗鄙。东方与西方,保守与革新,各种观念相互交汇、冲撞,在社会经济转型的名利场中,浮躁与浅薄,热烈与急迫往往又让人在多元文化理念的交织中感到迷惘与无奈。人们不禁在一次次地拷问,我们是否失去了关于传统的自省与敬畏,也失去了关于时代的担当与展望?

诚然,从历史学的观点来看,近40年的“书法热”,为当代社会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戏剧性变化与耐人寻味的文化思考,这正是当今书坛“自然生长期”中与社会发展共赢的喜悦和失落的焦虑。

“失落的焦虑”是无法回避的。2009年9月30日,中国书法中国篆刻申遗成功,全民书法热再度兴起。“全民书法”推动了传统书法艺术的学习、交流、普及与传播与繁荣,也为书法作为中华民族千年来生活方式的传承赢得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然而,我们不能不从“全民书法”展览、传播甚至交易的众多作品中认真反思这一“社会化”的内质与走向。一是艺术本体泛化。表现为蔑视经典,舍本逐末,俗化承传,粗制冒仿,背离艺术创作规律,缺乏大国工匠精神。书法展示只求在喧嚣闹市中张扬表象繁荣的景观,制作化工艺性取代了传

统自然书写的纯粹性。二是创作心态泛化。人们不再沉静与恬淡,却习惯于在“书法表演”的展示热浪中争相表现自己,拍卖“成果”,包装打扮,张扬个性,传统意义上高雅虚静的审美已被社会化所出局。三是文化价值泛化。艺术是凭高度说话的,我们需要宽度,但更需要厚度与高度。虚火的全民书法“繁荣”只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教训,历史不允许在社会艺术的泛化中将书法与非书法混淆模糊。

当我们回首前几年“社会化”态势蔓延并急剧争奇斗艳时可以看到,传统书法艺术的可读、可亲、可贵、可赏已逐步走向表演艺术的可俗、可媚、可怪、可恶的行为过程,书法已从民族文化的修身性逐步走向社会娱乐化的两难境地。因此,坚守中国书法的审美底线,坚守民族文化的敬畏与虔诚,坚守新时代文化人的风骨与操守,这就需要我们仰望历史经典,维护书法艺术的高贵与尊严。寻找传统、时代、个性相融合的合理支点,纯洁与提升全民书法的“社会性”与审美高度,弘扬中国书法艺术美用相兼、知行合一的人文品格。

今天,当我们理性地辨析当代书法的社会生态时,首先需要将书法作为一种民族艺术回归到社会价值系统的认定上来。对书法艺术语言的理解与阐述要有门槛,非书法语言不能包容。没有传统,就像民族失去了道统,民族性与纯粹性消失了;没有自律,书法语言就没有了自身的规则,书法艺术必然会出现人为的扭曲。因此,书法语言与创作者的关系是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只有坚守底线,我们才能赢得时代社会文化普及的高度。

三、时代创作审美之路——包容与选择

新时期我们提倡多元包容。多元不仅仅是不同观点的自由表达,它还意味着异见者之间的共识,包括对社会核心价值和博弈规则的一致认同。如果没有价值和规则的认同,多元将导致艺坛的混乱与解体。

泛审美化的出现扩展了审美形态。传统古典美学范畴的优美、崇高与和谐被西方吹来的“当代

艺术”所打破。它消解了中华民族传统审美的标准,颠覆了传统审美的文化立场。以复制、技术、装饰、工艺制作的作品,借大众传媒充塞着当下的文化空间与艺术市场,支撑着日益世俗化的大众美学。

当代艺术观念的转变也直接影响着传统书法艺术的纯粹性与精神性。从“静观”变异为“喧嚣”、从“审美”异化为“审丑”、从高雅趋向粗鄙、从清逸转为俗流……这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子,引发了书坛自由主义的生长。

后现代主义作为非理性主义思维逼迫艺术向着“取消主体无审美”等疏离文化价值的方向延伸,消解了艺术创作原有的审美性与崇高性,混淆了东西方文化内质的差异,模糊了大众对艺术审美的评判标准。为了显示形,故意无视质,消退质,以立新奇,以超乎常规的“立论”和超越传统的行为吸引大众眼球,以成“景观”。无论是绘画还是书法,以怪诞、无序为卖点,以审丑为诉求,以消解主流价值为圭臬,这不能不引起书画界高度的警惕与反思。

诚然,我们要对“丑书”有一个明确清晰的鉴定。我们所指的“丑书”是脱离了书法艺术创作的本体规律与汉字的结构规范,无视笔法等书艺的基本法则,任笔为体、聚墨成形、粗鄙恶俗、狂怪“出新”的不良现象。这里所指的“丑书”应和艺术本体中的“造险”“犯险”区别开来。大凡艺术创作必须由平正务追险绝,然后复归平正。刘熙载《艺概·书概》中指出:“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而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又指出:“俗书非务为妍美,则故托丑怪。”应该说,艺术中工求不工的高境界,其形式构成与内质标准上有一定的规律,其视觉空间是具有一定“度”的。“不工”并非是“丑陋”,却是“造险”。

不容置疑,在当下多元散乱的社会文化思潮的交织中所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是必然的,毋需费解或惊诧,更不必籍以大众传媒炒作甚至无限放大成为“轰动事件”。我们需要以包容的心态允

许一部分(甚至仅几位)书家个体特立独行式的“实验艺术”,书坛需要理解与对话。这些(为数不多的几位)书家他们已具备了较为深厚的传统笔墨功夫与艺术创作经验,他们独辟蹊径,寻求新的理念与探索“心路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让历史来检验。

显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文化转型中,中华民族文化自身身份如何保持与重塑,这需要在包容基础上的选择。艺术批评的当下性已沉积为三大焦虑,即观念焦虑、身份焦虑与现实焦虑。如何让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彰显鲜明的批评性?如何让理论更直接有效地指导当代艺术创作实践?如何强化文艺“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将市场经济下文艺娱乐化、精英文化边缘化的现状得以匡正?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课题。

改革开放 40 年后的今天,进一步认识现代化的文化内涵,认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情结和当今中国文化发展的价值取向,值得当下书法界深入思考。五千年的中华文化告诉我们,文化的“核心价值”正是中华文明没有断裂,得以延续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而这个核心价值在不断变化、丰富与发展,并形成各个时期的时代文化核心价值。改革开放 40 年,其核心是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价值,即高扬现代人文精神,这就要求书法界坚持全球化视野与本土化实践。当代书法创作审美评判体系的建立,也是诞生时代经典作品的审美基础。面对消费文化的挑战,我们要努力提升人们的审美情趣,促使社会审美向高雅转化。我们要有意识地引领一种审美价值评判尺度,召唤文艺责任回归,引领国民精神的提升。

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是在文化反省、文化创造与文化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主体审美意识与心态。文化自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强文化审美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我们赞成这样的文化自觉: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它绝不因循守旧、抱残守缺,而是与时俱进、主动搏击、选优汰劣,倡导全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的文化艺术有着共生的平

等机遇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气度。这个时代的书法艺术工作者尤其需要思想的滋润与审美的转化。时代需要书法艺术家不急功近利,而是耐得寂寞地思考当代文化与社会审美的深层课题,思考时代人文精神的落地生根。其要义首先是书法艺术当代审美定位与导向中的人文理性。书法艺术作为审美文化的重要职责并不在满足人们宣泄感官的消遣娱乐功能,而是要上升到自由的人生境界,净化人的灵魂,培养日常良好的素质。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位艺术工作者要认真反思对社会、对主流文化的责任担当。这就是重建具有民族风骨与时代风范的艺术评判和价值体系,创作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精神的艺术作品。这是我们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境地下时代艺术创作审美之路的战略抉择,这也是当代书法艺术的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书法文化语境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呢?就是引导社会确立一种主导价值。必须十分清晰地看到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转型,对传统技法与经典的深化理解,对艺术形式构成的新的拓展。这就是善于将传统的特点、时代的特质与个性的特色有机融合的创变,也就是毛泽东倡导的“推陈出新”。

面对受众庞大的互联网传媒“新时代”,面对着覆盖社会的以休闲与调侃为基本模式的市民消费文化商业圈,现实让我们清醒,艺术最根本的意义在于非功利的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当今我们追求经典的首要前提是不妥协于市场的消费文化,不屈服于由金钱来显身的不平等价值体系。

无可非议,书法展览是今天书法艺术走向社会融入大众的最主要载体与基本形式。展览机制的完善与创新已成为书法事业发展的关键。这次学术批评展已证实了它的有效性与创意性。我们的任务一方面要引领当下书法艺术的创作导向,促进书法创作的精品化,以期留下时代的传世作品,另一方面则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能享受到精品文化的熏陶与教育。因此,中国书协对全国展及全国性重点展示活动的设立、布局以及专题特色

的把握须按中央新时代新文化要求,做到科学规划、创意设计,突出重点、分类指导,整体推进、智慧运作,强化学术批评、凸现人文理念。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正是考验组织者推出什么样的创意品牌与学术成果,培养与历练什么样的人才队伍与团体精神的关键时期。

四、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之需——哲思与活化

汉字书法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高度物化,在最简约的层面上浓缩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当代书法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书法文化的本体规律和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之上,而引领当代书法审美方向从根本上需要哲学的思考。

作为民族精神特有的文化记忆——书法,我们今天坚守什么、创造什么,这是书法艺术工作者首要回答的问题。回归不是复制,传统的美好不能一成不变地替代今天时代的脉动,不能进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艺术家终将成为时代的弃儿。我们说,科学、艺术、哲学中哲学是“第三种智慧”,当下书坛的“对症治疗”,需要“哲学经方”,需要中国传统哲学走向当代哲学的时代思考,催生出“智慧方案”。此“慧”是定理,是重塑东方美的“第三种智慧”,它预示着当代书法美学精神的战略定位。

中国书法的基本精神如《礼记》中所说的“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鉴此,“道中庸”“致中和”“极高明”成为中国书法写意精神的核心理念。老子的“道法自然”、庄子的“唯道集虚”、老子的“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已成为千年以来中国艺术的“大本大宗”,此一“大本大宗”正是今天书法美学境界追求的指南。

作为当代书法艺术的审美自觉,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坐标系——其纵轴是从传统和出新的结合中看待未来中国书法的趋势,这是一个时间轴;其横轴是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找到书法艺术的审美定位,确定其存在的时代意义,这是一个空间轴。这是对书法艺术功能的文化反思,是对艺术发

展规律、特点的准确把握和必然选择。由此可见,当代书法事业的发展将取决于书法创作审美科学评价体系的构建。这里的“科学”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而是哲学意义上的“合时合宜”,即“中庸”理念,这一艺术标准与评价体系的构建必须扎根于中华美学精神的沃土上。

中华美学精神扎根于民族哲学的人生情韵和民族文化的诗性传统,确立了以人文关怀为内核,以大美情怀为视野,以美境高趣为旨归的中华美学体系,聚焦为真善美诗性交融的美学精神。当下是一个需要哲学、需要思想,也一定能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文艺界长期以来存在二元对立的单向思维。过去曾将文艺从属于政治,以政治思维取代审美思维,现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文艺从属于经济,以利润思维取代审美思维。这种美学的单向思维病态,还表现在对中西文化关系的处理上容易走向片面与极端。如习近平指出的,有些人“以洋为尊”“唯洋是从”“以洋为美”,热衷于“去中国化”“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同样,守住历史遗产,不敢放眼去吸收世界文明中的优秀成份也是没有出息的。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哲学大命题,它是当代中国艺术发展方向的根本所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张世英教授提出了“美指向高远”“美感的神圣性”等原创性时代美学理论主张,这对匡正市场经济大潮中文艺创作的媚俗化功利化起到了引领作用。张先生从传统哲学走向当代的中西文化比对研究中提出的“民胞物与”“万物一体”到“万有相通”,体现了文化立命到生命智慧的创造过程,会通中西,关注现实,唯变所适。体现了美学的任务是培养独立人格和超越精神,是“境界”之学。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从当代哲学意义层面上必须把握三点。一是“天人合一”而非“主客两分”,这是中国哲学基本精神所在。二是以“万有相通”的时代思维看待中西艺术审美,明确艺术想象和情感体验在审美活动中的意义。“哲学的最高任务不是认识相同性,而是把握相通性。”审美不能比

附于科学,异化为技术。必须将中西文化内质异同,通道器,通情理,才能致力于时代文化创造。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当代美学更需重视艺术审美实践,要有一种形而上的哲学本体意识的关注。三是深化对中国古代“隐秀说”(意象说)和意在言外的审美传统的领悟,追求诗意,高扬人文精神境界。美除了讲究感性形象和形式之外,还须具备更深层次的内蕴,这内蕴的根本在于显示人生最高意义的价值,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说“澄明之境”的“神圣性”。所以,“美的神圣性”,就是高远境界之美,是心灵美的支撑,而非单纯的事物之美,娱人耳目之美。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在艺术实践中的导向意义有三。一是主张形神兼备,不唯形式至上。中华美学精神的基石是美与真善的贯通,其核心是蕴真涵善的美情观,其理想是超逸高远的美境观,倡导内容与形式兼备,以境界情趣为要的美感向度,强调作品的情感、思想、风骨与襟怀。二是重视情理交融,崇尚蕴藉隽永。真情流露和个性凸显为艺术之真美,中华艺术的写意精神,甚至境往往不在写实,而是虚实相兼,境界高远。三是标举生生之美,弘扬诗性品格。中华美学精神承中国哲学之源,以生生为美,将天地万物都视为有生命的存在,崇尚艺术的生命情韵和诗性超越。由此可见,中华美学思想、理论和精神具有鲜明的民族思维和民族学理标识。中华美学精神重在写意。美在意象,孕育出包括情、趣、境、气、韵、味、品等一系列具有民族学理特质的美学元素。

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说“未经思考的人生毫无意义”,同样,未经真正时代思考与实践检验的所谓“形式创新”“艺术体验”必定是苍白的。因为“人类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思想的力量来自于她是人信仰的细胞。在当下书法艺术发展的生长环境中,我们千万不能忽视“精神迷惘”而致使“本真扭曲”的现象。我们今天承继中华美学精神,在于延续书艺本体的文化命脉,而不是装饰表层的社会生活。饶宗颐先生的“万古不磨意,中流自在心”正是道明了随境而化,中得心源的哲理。当

代书法的创化精神,不但要在传统经典中“偷得梨花三分白”,更重要的是“借来梅花一缕魂”。中国当代书法美学精神,一是蕴含在中华传统哲学中的写意精神,二是表现为一个运动着的通变过程。它的时代性,既不能仅仅局限于古典美学,更不能从西方的现代美学概念生发。它不是单一的追求技巧与形式美的递变,更多的是从审美理想、道德高度与文化价值层面去提升。其精神内核就是崇尚真善美的高度融合,就是美学高度的“人民性”问题。它应该具有民族的历史感,富于民族灵性、民族气质和民族语言特色,是中华民族审美集体意识的精髓与灵魂。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的美学精神在于“融古为我”,其艺术经典性必然是时代的文化创造。

结 语

思考之一:在经济与社会转型的今天,“全民书法”社会审美的泛化,呼唤中国书坛时代审美理想的同期建构。我们如何在自己的文化生命与审美

追寻中实行“自我救赎”?思考之二:将艺术还原于文化。当代书法需要时代审美评判体系建设的构建,需要一种基于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思考之三:当代书法在全球化语境下如何做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活化?这就需要中国书法文化立场的坚守,需要当代书法文化社会身份的重塑。

环顾书坛,我们更需要坚守、开拓、营造属于本土、属于时代的纯净的家园。“大庖无定味,总章无定曲”,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人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河流。尽管艺术风格、流派各有不同,但当代中国书法本体精神始终只有一个。今天,我们不能因为怀疑,因为匆忙,因为物态或名份的竞争而忘记当初起步从事书法事业的初衷。望着先师前辈们消逝的背影,我们从心底发出这样的呼唤——我们以什么贡献这个时代?

责任编辑:宋好

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研究

中共江苏省委统战部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
联合课题组

摘要:进入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利益诉求、政治诉求、意识形态诉求更加复杂多样。根据党外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和成长规律,找准新时代统战工作的发力点,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团结、教育、引导、服务工作,聚天下英才而用之。

关键词: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群体构成;个性特征;统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24-07

为了提升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江苏省委统战部牵头组织实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研究”,采取座谈交流、问卷调查、个别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合计发放问卷 1200 份,共选取 10 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士进行深入访谈,力求在比较中概括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问卷调查抽样根据江苏各地经济发展程度、人才吸纳能力差异,按党外知识分子职业类别,分地区进行。有效回收问卷 920 份(有效回收率 76%),其中 12 个地级市合计回收问卷 472 份,高校系统回收问卷 448 份;供职于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约占比 60.6%,体制外占比约 39.4%(见表 1)。(本文以下图、表均基于此次问卷调查统计)

表 1:党外知识分子职业分布情况

职业分布	样本数	百分比(%)
高等院校	490	53.4
国有企业	29	3.2
科研院所	37	4.0
中介组织	18	2.0
民营企业	65	7.1
外资企业	4	0.4
自由职业	31	3.4
其他	243	26.5
合计	917	100.0

一、党外知识分子的群体构成及特点

(一)知识青年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专业结构日益细化

收稿日期:2019-09-10

从本次抽样调研的情况看,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党外知识分子占到总人数的94.5%,其中有超过60%的党外知识分子具有研究生学历。其中45岁以下的青年群体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占比更是高达64.1%,高出45岁以上群体7.6个百分点,年轻群体在学历层次上更具有优势(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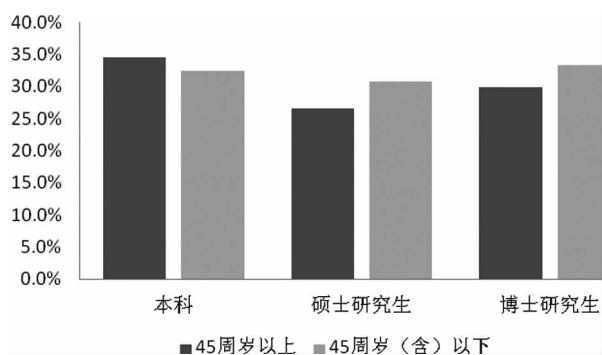


图1: 党外知识分子不同群体受教育程度的分布百分比

从职称级别来看,在40-49岁群体中拥有高级职称的人数占到总人数的61.3%,远高于39岁及以下的21.1%和50岁及以上的17.6%(见图2)。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具有高级专业职称,成为各行各业中的业务骨干。这一成绩得益于江苏近几年不断完善的人才引进政策,大量拥有海外留学经历或是国内精英教育的党外知识分子选择了留在江苏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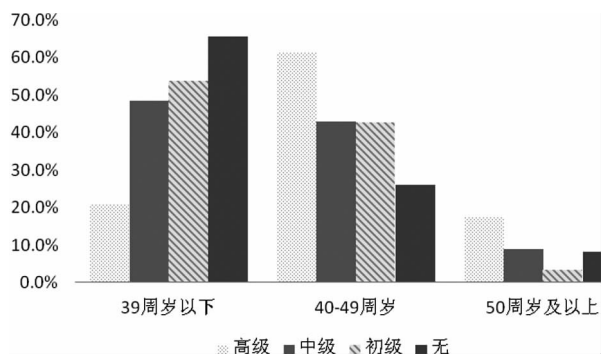


图2: 不同群体专业技术职称的分布百分比

(二) 社会流动愈加频繁,群体分布结构逐渐优化

抽样调研发现,有一半以上的党外知识分子更换过工作,甚至有超过12%的人更换过三次及

以上的工作。40-49周岁的群体是不断跳槽的主力军(见表2)。总体来看,江苏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流动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表2: 不同年龄段更换工作的频率(人)

	更换工作的频率				合计
	没有更换过	1次	2次	3次及以上	
29岁及以下	6	5	2	1	14
年 30-39周岁	156	92	47	35	330
龄 40-49周岁	170	123	70	58	421
段 50岁及以上	45	30	17	16	108
合计	377	250	136	110	873

一是向苏南经济发达地区流动。苏锡常等创新能力较强的城市人才吸纳能力较强。但随着创新创业的热潮逐步在苏中、苏北兴起,一些党外知识分子也愿意到经济社会发展后发地区寻找新的机遇。

二是在不同所有制单位之间相互流动。随着所有制结构调整,城乡二元结构改变,许多原先属于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开始迎合市场发展,不断调整自身定位,流向经济收入更高、发展潜力更大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

三是向新媒体、新能源、新技术行业流动。随着江苏在人工智能、网络金融、信息科技等新兴产业发展方面不断实施政策优惠和倾斜,这些新行业吸引大量的人才包括党外知识分子。

四是留学人员归国的热情持续高涨。据此次调研人数统计,有近35%的党外知识分子具有海外学习生活的经历,40-49周岁群体中,留学归国人员的比例最高,占到该群体总人数的42.8%。

(三) 圈层区隔愈加明显,多重身份相互叠加

一是圈层区隔越来越明显。有的学者认为,随着单位制的减弱,越来越多的党外知识分子在市场体制下已经趋向于个体化状态存在,组织性在逐渐减弱。但实际上调研发现,与这种组织性降低相伴的是一种“自组织性”的兴起,党外知识分子由于不同的专业、行业、兴趣等自发形成了大量“小圈子”。小群体内部的联系相对紧密,具有相同话语和一定的交往密度,而不同的圈层之间可能

连话也说不上。同时,由于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人际交往的时空界限被打破,这种圈层区隔与互联网形成了叠加效应,加大了统战工作的实际难度。这种由“自组织性”带来的圈层区隔在没有参加任何党派的知识分子以及新的社会阶层中的知识分子群体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二是多重身份相互叠加。来源的多样性导致党外知识分子可能具有多重统战对象身份,这种不同身份的相互叠加,增加了统战工作在实际群体调研分析中的难度,也模糊了党外知识分子本身对自己的认识判断。例如,在调研中,有 2.5% 的调研对象既是民主党派成员又具有宗教信仰,3.8% 的调研对象既是留学归国人员又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甚至有 2.7% 的调研对象具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留学归国人员、民主党派成员三重身份。调查发现,一些有影响力的党外知识分子同时成为几个界别的代表人士,疲于参加相关部门举办的各类活动,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们的反感情绪,也造成统战工作的资源浪费。

二、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

(一)独立性、批判性增加

在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的引导下,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的工作生活更加独立自主,他们更关注个人的学习和成长。他们强调自我意识,强调自我实现,常常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标注自身的特殊性和小众化,危机感、紧迫感和竞争意识都有所增强。另外,与个体性觉醒相辅相成,党外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意识也在不断增强,他们对党的执政成效和各类公共事务表现出公共关怀,他们敢于直面党执政过程中政策的不足,乐于在评论中获得自豪感和自主性。

(二)对社会自由度的认知不尽相同

不同类型的党外知识分子所认可的社会自由程度并不相同(见图 3)。课题组通过因子分析,用“没有选举,就没有真正的民主”“任何时候政府都必须保障每个公民的言论自由”“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应该越少越好”三个指标来综合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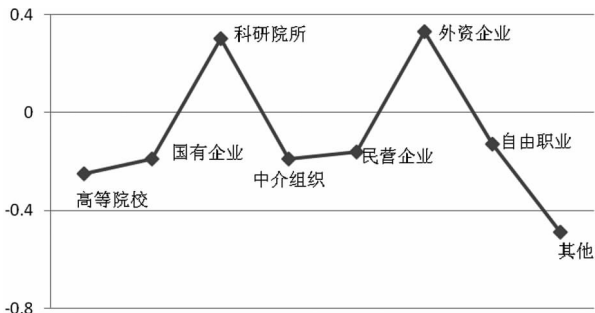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职业群体对“自由”的强调程度

结果显示,不同职业的党外知识分子,其对“自由”的认知程度差异明显,其中最高的是外资企业的党外知识分子(0.33),最低的是包括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新媒体人员等在内的其他党外知识分子(-0.49)。供职于科研院所和外资企业的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组织化程度最弱,更加自由散漫。这主要因为科研院所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方式更加松散,更强调个体的创造性和网状的相互合作,上下层级的科层制有所减弱,党的组织化程度和统战工作的深入度都要弱于高等院校和国有企业。而中介组织、民营企业、社会组织中的党外知识分子对社会自由度的强调相对较低,一部分是由于有些组织本身的组织化程度较高(如中介组织),而另一部分是因为这些组织(企业)尚在发展成长期,对党和政府的依赖程度更强。

(三)行为功利化与社会责任感并存

党外知识分子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在新时代会表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在党外知识分子身上依然有所体现,他们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蜕变为公共知识分子,针砭时弊,为国家和民众的利益而奔走。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理性人”思维和对“自我”的强调促使他们的日常行为逐渐功利化,在不同群体、不同场合表现出多面性。他们更强调自身利益的获得,在日常工作、社会交往中计算效益回报。这种矛盾性促使一些党外知识分子成为“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常常在言语上参与公共事务评论,但实际行动力却略显不足。在调研中,有超过 95% 的党外知识分子认为“在追求自身幸

福的同时,也有责任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换言之,他们将公共利益和自身利益放在几乎平等的位置。而在另一项测量指标中,只有57.8%的党外知识分子认同“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相冲突时,个人利益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

同时,收入在20-30万元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社会责任担当这一指标上水平最低,仅有41.5%(见图4)。他们处在自我发展的中间阶段,期待更好的向上流动,不希望舍弃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本,但对国家的利益也相当看重,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在他们的内心焦灼。这部分群体的思想更为摇摆,极易受到不同价值观念的冲击,向完全功利化倾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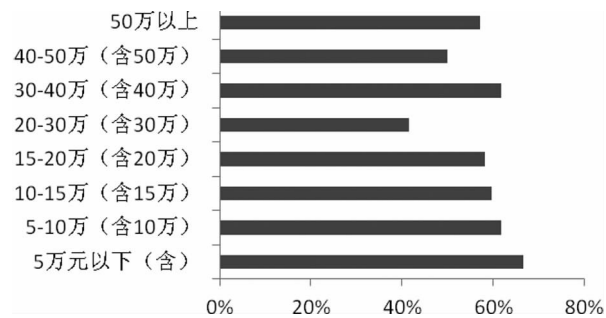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收入群体中社会责任担当的差异^④

三、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认同与参与状况

(一)对社会地位发展期望高,诉求表达渠道相对不足

调研发现,江苏党外知识分子经济社会地位判断的实际值明显低于期望值,其中总体判断的差距在2.3。分解来看,以权力地位的差距最大,差值在2.49(见图5),说明党外知识分子认为自身在整个社会的动员能力被严重低估。

随着受教育程度增加,权力获得感的心理落差愈加明显,拥有博士学位的达到2.54,远高于大专学历的2.04。通过跨时段比较,课题组发现,近三年来,青年党外知识分子的阶层地位判断,无论是实际值还是期望值都有所上升,说明随着党和国家对创新创业人才的支持以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有效落实,党外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青年党外知识分子权力获得感的心理落差

在逐渐增大,自我矮化透露出的不满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由此产生的失落感可能导致其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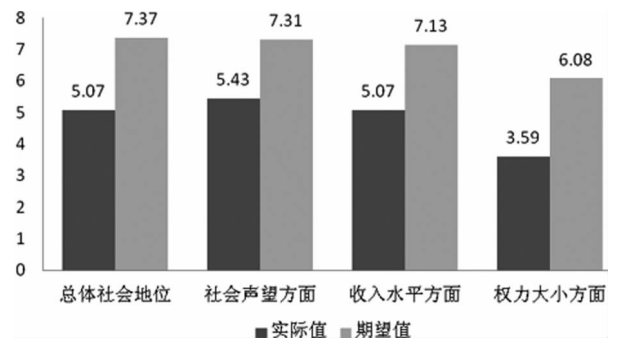


图5: 党外知识分子的阶层地位自我判断的实际值与期望值比较

诉求表达渠道受限是造成这种自我矮化、获得感降低的重要因素。从调研情况来看,党外知识分子诉求的有效表达渠道不多。在遇到不公平待遇时,有33.5%的党外知识分子表示会“认了算了”,通过法律渠道、媒体渠道寻求解决的不足20%。在表达建议的渠道方面,包括“通过微博、微信平台反映”在内的非正式渠道的使用率都不足20%。

(二)政治参与程度不够深入,政治效能感较低

从政治参与的深入程度来看,调研中,有82.8%的党外知识分子表示比较关心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但当更进一步询问党外知识分子“是否经常和别人谈论国内问题”的时候,经常讨论的比例仅有30.3%,而不讨论的群体却占到了16.7%,半数以上的党外知识分子都仅仅停留在偶尔谈论的层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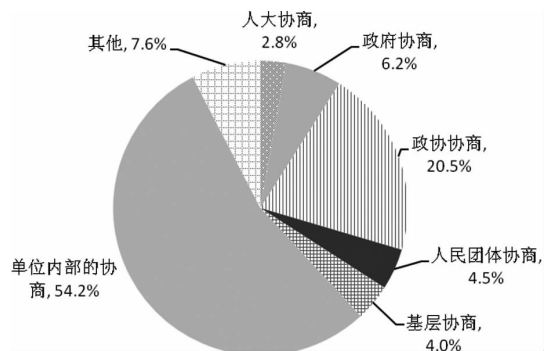


图6: 党外知识分子协商参与的状况

从党外知识分子协商参与状况来看,单位内部协商参与率为 54.2%,政协协商参与率为 20.5%,其他层级的协商参与率均不足 10%(见图 6)。党外知识分子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参与度都很低,离充分发挥他们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引导示范作用差距较大。

除此之外,影响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另一个因素是政治效能感不高。政治效能感是“个体政治行为对政治过程可以产生或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感知”。在调研中,有 31.7%的党外知识分子认为舆论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不大。而在参与投票活动的行为动机分析中,有 37%的党外知识分子是被动参与,受到组织要求或是利益驱使。只有一半左右的党外知识分子将其看作是行使自己民主权利的积极行为。

(三)政治信任度高,但对执政绩效评价不高

政治信任感被认为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积极健康发展的重要软变量。对党和政府信任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民主协商合作的实际效果。同其他群体一样,党外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总体表现出较强的政治信任度,由此带来对国家发展前景的信心,在调研中,党外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制度自信、道路自信,对我国发展前景的评分达到 1.19(值域[-2,2])。他们认为党委和政府是中国未来改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一比例高达 61.2%),政治、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依然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推动。同时,这种高度的信任感也反映在党外知识分子对统战工作的认可度上,在调研中,有 70.1%的党外知识分子认为本单位的统战工作开展得很好,能够主动在他们的工作生活中提供帮助和引导。有 89%的党外知识分子了解党的统战政策,有 91.5%的党外知识分子表示曾经接触过统战工作人员。党外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娘家人”表现出一定的信任感和亲近感。

但是这种较高的信任感,并不影响党外知识分子对党和政府工作,尤其是统战工作提出批判性评价。在课题组有关党的执政成效的调研中,党外知识分子对国家在医疗服务、教育公平、环境治

理、公共安全、惩治腐败、财富分配、抑制房价、创业环境这八个方面的评价表现出明显的批判性,“1-5”的打分评价中,平均分都介于“3-4”分之间(见表 3)。

且这种信任感会随着政府层级的下降而有所降低,呈现出明显的“央强地弱”特征(见图 7)。

表 3:不同群体对党执政绩效的评价

	有无留学经历		有无加入民主党派		是否 45 周岁及以下	
	有	无	有	无	是	否
医疗服务	3.48	3.62	3.53	3.81	3.66	3.53
教育公平	3.20	3.35	3.27	3.51	3.38	3.30
环境治理	3.00	3.19	3.19	3.18	3.21	3.12
公共安全	3.92	4.02	4.07	3.93	4.07	3.92
惩治腐败	3.82	3.96	3.97	3.95	3.97	3.94
财富分配	2.95	3.06	2.96	3.26	3.12	2.92
抑制房价	2.34	2.42	2.36	2.54	2.46	2.28
创业环境	3.30	3.43	3.36	3.43	3.47	3.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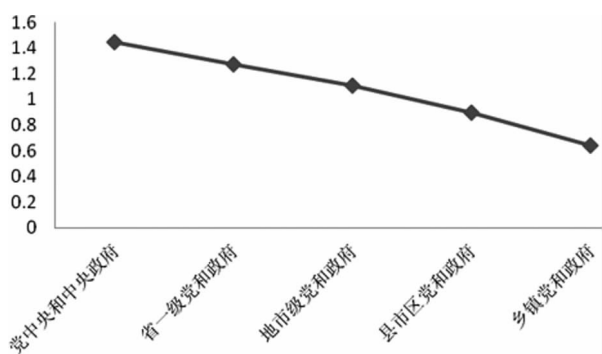


图 7: 党外知识分子对不同层级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感趋势

四、聚才而用,做好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工作

(一)健全完善工作体制机制

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强,涉及对象规模庞大、结构复杂多变、分布广泛,任务多、责任重,是系统性工程,是全党的工作,“必须全党重视,大家共同来做”。

加强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格局建设。要明确党委在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的主体责任,依托社会化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全面构建推进工作。针对体制内的党外知识分子大多集中在高校、科研院

所、国有企业,要加强统战部、教育工委、国资委等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推广高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的协作片会机制,促进工作力量的优化整合,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协同发展的工作新模式;要充分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席会议制度的指导协调作用,坚持“会议共同召开、文件共同研究、项目共同制定、活动共同组织、人才共同培养”,形成各相关部门、单位密切协作的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格局;要统筹做好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统战部门不仅要牵头加强与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科技等有关部门的协作,还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的优势,发挥欧美同学会、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新的社会阶层联谊组织、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侨联、台联等统战工作载体作用,共同推进归国留学人员统战工作。

(二)注重教育培训工作,增进政治共识

要以思想政治引领为龙头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教育培训工作,把政治共识教育与党外知识分子的发展需求有机结合起来,把政治引领嵌入到日常教育培训之中。

要健全教育培训体系。按照广覆盖、宽领域、多层次的要求,建立科学化、常态化、规范化的党外知识分子教育培训体系。围绕提升“五种能力”特别是参政议政能力加强培训。

要创新教育培训形式。广泛开展研讨式、体验式、访谈式以及“身边人讲身边事”等主动参与式教育培训,加强教学互动;结合他们的多样化职业和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开设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并推广慕课教学;要引导党外知识分子通过开展实地调研、参观访问、社会服务以及学术交流等形式,在实际行动中深入社会肌理、增强参与意识,将被动的学习感悟转化为主动的情感体验,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内化为共同的价值追求和精神动力。

(三)加强代表人士队伍建设,发挥引领作用

注重优秀人才的物色选拔。对党外知识分子群体的物色选拔要向党外知识分子集中的城市和

重要领域聚焦,向中高级人才和领军人物等重点人群聚焦,向有品行、有能力的青年人才聚焦,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地广泛物色发现其中的精英人士和骨干分子。建立科学实用的综合评价体系,为选人用人提供客观依据。

注重代表人士培养的规划。加强统战大数据平台建设,积极充实代表人物库,落实长效科学化管理;要把考察代表人士的一贯表现与关键时候的表现结合起来,注重看他们能不能在统战工作需要的时候能站出来,发挥正面引领和带头示范作用。

注重代表人士的适度安排。要避免在党外干部安排上“水平低、不能安排;没位子、不好安排”的误区,不仅要“请君上车”,还要“请君入座”,积极为党外代表人士在安排使用、参政议政等方面创造条件。要统筹做好政治安排、实职安排、群团组织、社会组织安排,扩大组织吸纳,为党外知识分子有序政治参与提供更多渠道。

注重代表人士的作用发挥。要发挥他们的专业、智力优势,结合不同群体特点和专长,引导他们在决策咨询、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调研、建言献策,在推动改革发展方面发挥好生力军作用,积极贡献智慧与力量;要引导他们树立良好形象,提升社会影响力,积极宣传党的理论方针政策,真正辐射带动身边的党外人士,促进大家凝聚思想共识、共促改革发展。

(四)做好“组织起来”的工作,畅通参政渠道

要把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情况和政治认同度作为统战工作关注的焦点,加强“组织起来”,搭建制度化参与渠道,推动其有序、有效政治参与。

加强党外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联谊性组织建设。建好知联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促进规范化、常态化、特色化发展,锻造骨干队伍、强化工作阵地、明确制度保障、丰富活动内容、创新工作品牌,通过提升开展活动的吸引力和内聚力,增强和保持对党外知识分子的黏度。

依托社会组织开展工作。一是发挥行业性、专

业性社会组织作用。调研显示,与行政化的官方组织相比,党外知识分子更愿意加入各类行业性、专业性社会组织。积极推进政社分开,鼓励行业协会、学术团体等专业组织社会化、规范化运行,发挥他们政治色彩轻、专业色彩浓的工作优势,力求在专业上、技术上同党外知识分子说上话。二是通过对现有社会组织的再组织,重点打造一批具有统战功能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发挥其在同类型社会组织间的传递、联络和组织功能,实现“抓住一个、带动一批”的工作联动机制,使其成为统战工作的旗帜性组织,从“统战对象”转变为“统战力量”。三是根据党外知识分子的个性特征、兴趣爱好、重点诉求等探索建立新兴社会组织,例如针对民营企业管理技术人员技术提升和业务交流的组织,立足社会公益、公共服务的志愿组织,在这些专业化组织中将统战工作主动嫁接、粘连上去,最大限度地体制外的党外知识分子由“社会人”转化成“组织人”。

加强对党外知识分子自组织的引导。将其纳入统战工作视野,加强联系沟通,建立自组织及成员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引导他们发挥在参与社会建设、公益事业方面的作用。

(五)创新方式方法,提升统战效能

党外知识分子“主要在党外、体制外,流动性很大,思想比较活跃,做他们的工作,一般化的方式不太管用”。要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思路,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改进工作方法,提升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本领。

坚持网络化方法,构建“指尖上的统战”。要探索创新体现统战特色的新媒体宣传模式。加强网络宣传引导,坚持走网络群众路线,了解新一代党外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愿,积极采纳建议、回应关切、解疑释惑;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等形式,提高议政实效”的要求,为党外

知识分子网络参政议政、反映诉求提供直接、便捷和反馈及时的渠道,促进党外知识分子利用网络信息平台优势扩大参与面、提升参与效能。

要坚持社会化方式,壮大统战力量。社会化方式是与党外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统战范式,也是解决当前统战工作面临统战资源有限性与统战需求无限性之间矛盾的有效选择。其一,扩大统战工作的开放度。推动统战工作由政治领域向社会多领域延伸,从政治层面向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层面扩散。其二,坚持统战主体的多元性。改变“统战工作就是统战部门的工作”旧思维,坚持“依靠统战部门的专门力量与依托各方面力量并重”,把所有具有统战功能、承担统战任务的团体和组织,甚至个人都凝聚、发展成为新的统战力量。如南京市鼓楼区由统战部牵头,经济综合体党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关工委以及新联会等各类群团组织共同组成“红创会”,通过资源共享、共建、共享,使统战工作覆盖面呈现“滚雪球”效应。其三,推动统战职能转型。把统战部门的一般社会职能从部门职能中剥离出来,授权、委托或下放给社会组织或个人,由其承担社会性事务组织、管理、服务职能,实现统战工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如常州市坚持社会化、项目化思路,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将统战工作嵌入到社会组织孵化基地,打造社会组织孵化与统战平台孵化“双孵化”模式,探索出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统战工作的新路径。

善于联谊交友,增进情感认同。积极通过交往交流交心,把他们从“工作对象”变为“工作力量”。要针对党外知识分子的独特个性,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积极建立与他们的联系渠道,创造对话机会,多倾听、多采纳、多包涵、多宽容,通过耐心沟通消除认识上的差异。

责任编辑:郭晓东

新时代关于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探索与实践

中共镇江市委统战部课题组

摘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这一思想的提出既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又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存在着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部分政策措施不完善、政企交流渠道不畅通、违规企业追责力度不够、政策宣传教育不深入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政企多方面同步发力,强化制度建设,加强教育引导,畅通交流渠道,落实惠企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多维度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两个健康”,让“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真正为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亲清政商关系;问题分析;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31-04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形成清明、清廉、清正、清朗的政治生态和透明、法治、公正、高效的商业生态,对党和国家的经济社会良性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出的时代背景

2016年3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界别委员联组会上对新时代政商关系提出了“亲”“清”二字的概况和总结,这一提法标志着习近平关于新型政商关系思想的形成和成熟。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不是一时的看法,而

是基于当前我国基本国情长期实践探索和深思熟虑后的深层认识,有着明显的时代背景。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型政商关系提出的重要前提。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对党员领导干部的要求越来越高,处理政商关系的积弊也渐渐凸显,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针对为官不易、为官思富的党员干部,时任宁德地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指出,“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要发财,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二是针对部分党员联系交往分寸把握不准的,习近平曾指出,“同企业家打交道一定要掌握分寸,公私分明,君子之交淡如水”^[1];“‘官’‘商’交往要有道,既要相敬如宾,又不能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2]三是针对中央“八项规定”后部分党员

干部总与企业家打交道的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求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打交道要守住底线、把好分寸,并不意味着领导干部可以对民营企业家不理不睬,要坦荡真诚同民营企业家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9]

厘清官商边界是新型政商关系提出的内在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政府在行使职能时出现的越位、错位、缺位等问题所导致的行政权力边界不清、行政权力错配、行政权力约束较弱等问题也制约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10]

激发民企活力是新型政商关系提出的现实需要。“近来,一些民营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不少困难和问题,有的民营企业家形容为遇到了‘三座大山’:市场的冰山、融资的高山、转型的火山。”^[11]这在客观上恶化了民营经济发展的环境,尤其是近年来日益加剧的中美贸易战,也降低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企业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不断做大做强,促进联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12]

二、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现实意义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为新时代民营经济发展举旗定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一方面有利于推动非公经济和非公经济人士健康成长,为企业家畅通了沟通交流的渠道,尤其是让那些敢于说真话的企业家建诤言、献良策,这对于塑造企业家精神,激发企业家活力,发挥企业家才能,推动民营企业提档升级、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另一方面,有利于消除企业家的后顾之忧,也为企业家处理政商关系

提供了新的思路。自 2018 年底的全国家营经济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释放的大力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信号,更加坚定了民营经济发展的信心,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对抗中美贸易战等国际挑战增添了强劲动力和活力。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为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澄清了困扰党员干部和民营企业家的一些模糊认识,明晰了政企交往的界限,一方面,让党员领导干部知道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对党员领导干部既有权力上的约束又给予一定政策上的自由,增加了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压力和敢想敢干的动力。另一方面,对于部分非公经济人士来说,由于非公经济人士构成复杂且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部分人员对党和国家的政策理解存在滞后性和主观认知倾向,担心因政策变化而对自己带来损失,因而不愿意扩大生产规模、不愿意参与跨地区竞争,不愿意冒风险。而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提出,尤其是一系列减税降费、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营造公平竞争环境、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等政策的提出,为民营经济发展吃了一颗“定心丸”。

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维护为新时代党的事业发展凝聚人心。一方面,亲清新型政商关系中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增强文化自信。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义利观和传统政商关系以及时代特征的结合点,赋予政商关系以新时代内涵,有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社会氛围,激发了政商关系的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服务平台的搭建、沟通渠道的畅通,有利于非公人士发表意见、表达诉求。兼顾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正确把握、处理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统筹各方面利益关系。

三、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问题分析

市场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一是政府过多干预社会经济。由于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党委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控制,尤其是部分基层政府干预微观经济的程度还

比较高,使市场还未能真正地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阻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二是权力寻租现象等依然存在。政府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优势地位,给“权力寻租”“权力贴现”等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一方面,在“机会主义”的影响下,一些不法经营者会存在侥幸心理,从而引发了众多的行贿动机;另一方面,公权力产生的利益,会诱使个别领导干部和行政部门不断扩大干预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

权力制衡机制有待完善。一是容易形成公权垄断,导致权力的扩张和控制,行政审批繁杂、政府官员办事效率低下等情况仍时有发生。二是政府官员清而不亲,随着反腐工作日益推进,部分政府行政人员为确保清廉形象,采取“一刀切”政策,与企业保持距离,不利于新型政商关系的发展。三是政府官员容易发展裙带关系,部分政府行政人员亲属从事商业活动,并利用官员手中权力承接项目等现象仍然存在。四是“政商旋转门”现象仍然偶有发生,部分党员干部利用职务和人脉、影响力,游走于政商之间,帮助企业非法获取资源,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便利。

部分政策措施还需细化。由于各地产业结构不同、民营比重不一样,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企业对政商关系需求不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大部分地区执行“规定动作”多,配套举措少。特别是一些基层干部反映文件中部分条款在具体操作中还不够明确,容易造成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偏向“清”,文件的导向性、规范性作用没有得到充分显现。

政企交流渠道仍需强化。一是沟通制度不完善,我国目前存在人大、政协、工商联等正式的政商交往平台,但是通过调查显示,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队伍中能够当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仍是少数,还有不少企业家无法通过这种正式的交往平台实现和政府的正常沟通对话,实现合作发展的需求。二是已有沟通渠道不畅通,例如,人大代表反映了企业的问题,但是有关部门并不重视,或者有关部门相互推诿,这些原因都会导致政商之间沟通渠道失灵。三是民间商会组织发展不充分,凝

聚力不强,尤其在表达企业集体诉求上的作用有限,难以发挥集体行动的功能。

违规企业追责力度不够。目前对行贿受贿行为的关注点大多集中在受贿官员的身上,而对于涉事企业的问责也多局限于行政处罚,目前针对部分违规企业追究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的追责还存在一定空白,造成了当前部分企业违规成本低廉的局面,容易造成“破窗效应”。同时,有地区还反映个别企业负责人缺乏诚信,存在“恶意信访”行为,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干部服务企业的意愿和热情,不利于良性政商关系的形成和互动。

政策宣传教育还不到位。从客观上讲,亲清政商关系的构建已经越来越得到地方党委政府的重视,尤其是在全国民营企业座谈会召开以后,各级党委政府对企业发展、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视程度空前提升,能够做到及时传达文件精神,认真部署相关工作。但部分地区传达相关文件精神的方式还仅停留在召开座谈会等形式传达的层面,在较长时间内文件在面上的知晓率还不够高,有待完善和加强。

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对策建议

坚持法制建设,构建完善有束的制度机制。一是夯实法制基础,做好法律法规的制度建设,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提供法律保障和依据,把政商之间的互动放在法制的环境下进行;要将公权力紧紧锁在法律的框架内,厘清权责清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处力度,提高企业违法成本。二是加大督查力度,针对土地资源开发、公共工程项目等重点领域,以及行政审批、财政资金管理、市场监督管理等权钱交易风险较高的环节,加强预防和预警,清理中介公司,综合运用多种监督形式,加大政商关系“不清”“不亲”监督检查;建立健全领导干部插手具体工程项目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将政商关系监察纳入纪检、监察范围,定期开展第三方评估,加大负面典型的惩处力度。三是加强制度保障,即充分运用领导干部鼓励激励、容错纠错、能上能下“三项机制”,落实服务企业成效专项考核工作。

加强教育引导,建立亲清有序的政商关系。一是加强公职人员教育,一方面,要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纳入公职人员教育培训体系,加强廉政教育;另一方面,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亲”“清”观念。二是加强对企业家的引导,充分利用会议、调研、座谈会等各种时机,加强与企业家的交流,帮助企业知晓理解相关政策,在感情认知里见“亲”。三是加强典型宣传教育,要更加注重正面激励,树立和宣传一批爱国敬业、守法经营、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先进典型。

畅通沟通机制,实现平等有度的政商交往。一是搭建交流互动平台,积极搭建党政领导干部与非公有制企业的制度化沟通平台,消除政商交往的隔阂和顾虑,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建立反馈追踪机制,完善企业申诉、投诉及建议反馈等机制,及时了解项目的进度和存在的问题,对企业所反映问题的解决效果进行追踪问责,促进企业问题能够及时解决。三是推动政企互联互通,通过互联网搭建现代化政务信息沟通云平台,加快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和公共数据共享,避免各部门各自为政、自成体系、数据壁垒等问题,最大程度地利企惠民,让企业和群众少跑腿、好办事。四是坚持遵守“臂距原则”,一方面要引导民营企业家积极投入当地经济建设,专注自身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与政府官员保持一定距离,在工作往来中见“清”。

落实帮扶措施,提供务实有效的惠企服务。一是加强走访调研,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各相关部门要定期调研走访部分企业,通过工会、非公企业党支部了解企业愿望诉求。二是加强联系指导,实行党政领导挂钩规模以上企业制度,指导企业学习各级惠企政策,根据实际制定相关政策措施,适时引入第三方评估,并开展相关惠企帮扶活动。三是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对每年各级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重大惠企政策,可由各级人大在年中、年底组织两次或多次督查,并将政策的落实情况、落实效果在次年的人大会上以书面形式向全体人大代

表进行通报。四是继续加大促进非公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经济代表人士队伍建设的工作力度,尤其要关注年轻一代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对思想政治素质高、行业代表性强的代表人物,按照“凡进必评”的标准做适当政治安排。

创新工作载体,营造健康有力的营商环境。一是进一步注重协同推进。要继续发挥好党委政府、群团组织等各方的作用,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发挥好党委的总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组织部门负责牵头抓总、协调推进,发改、经信、科技、商务等经济综合部门要根据职能,积极主动作为,统战部、工商联既要创新联系服务企业的新举措,又要注重对民营企业家的思想引导,群团组织也要发挥自身优势,沉到党群综合体中,依托这一载体发挥好作用。二是进一步打造特色品牌。要结合地方实际,打造出一批服务企业的特色品牌。针对好的企业总结归纳其清廉为企的治理模式,固化和推广治企成效。三是进一步创新工作模式。积极探索推行“名单+清单”的工作模式,重点抓好税源经济企业、重大项目,提供精准服务;要紧贴不同企业的发展需求,从涉企服务项目中有针对性地派出“服务企业项目清单”,提供定制化服务。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之江新语[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38.
- [2] 习近平:官商交往要相敬如宾不要勾肩搭背[EB/OL](2013-03-09).<http://js.people.com.cn/html/2013/03/09/212564.html>.
- [3] 习近平: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8-11-01).<https://www.chinanews.com/gn/2018/11-01/8665993.shtml>.
- [4] 习近平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演讲 [EQ/QL].(2014-11-09).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1/20/c_129370803.htm.
- [5] 杨卫敏.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探析——学习习近平有关新型政商关系的重要论述[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3).

责任编辑:王芳

论加强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

王复兴

摘要:伴随着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的颁布,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对繁荣和发展统一战线理论,落实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工作方针、政策,都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因此,应认真把握相关问题,科学设置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通过打造人才培养基地、构建学术交流平台、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编写学科精品教材等措施,推动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发展。

关键词:新时代;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35-04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处于全新历史方位,进一步加强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对繁荣和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型政党制度等,以及落实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工作方针、政策,都有着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自2015年教育部支持设立统一战线学学科并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山东大学联合共建学科和合作培养研究生以来,已陆续招收110余名统一战线学研究生(含硕士、博士)。可以说,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从服务党治国理政、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从构建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角度来看,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距离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当前,伴随着新时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完善和《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的

颁布,需要进一步在完善学科设置、加大理论研究、提供必要保障等方面继续努力,不断拓宽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发展路径。

一、科学设置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

依照学科建设规律,一门学科必须要科学设定学科位级和发展方向,明确研究对象和范畴,采用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范式等。^[1]就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情况看,初始涉及统一战线方面的研究主要分散在党史党建、科学社会主义、民族学、宗教学等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1979年3月,李维汉在统战系统干部大会上重申了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关于“统一战线是一门科学”的命题。1985年2月,中央统战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统一战线理论工作会议,习仲勋同志在会上明确提出“统一战线理论是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命题。此后,中央统战部组织编写了《中国统一战线全书》《当代中国的统

收稿日期:2019-07-18

作者简介:王复兴,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

一战线》等理论成果,一些领导同志和专家学者也陆续发表了一批相关理论文章。直至2009年,在中央统战部的指导和教育部的支持下,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发起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攻坚战,与山东大学协商合作共建,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设立统一战线学二级学科,培养统一战线学研究生。^[2]统一战线学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填补了我国高等教育相关领域的空白,是深化理论研究、培养人才和推动统战工作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程,也为推动统一战线理论的科学化和学科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目前,统一战线学学科作为政治学下的二级学科,已经初步实现了学科化。但从研究主题、内容、领域等方面看,二者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异。主要如下:一是统一战线学研究主题有自身的特殊性,比如新型政党制度,就是特殊的政治学问题,即统一战线学问题;二是统一战线学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比如多党合作、参政议政、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等;三是统一战线学的研究领域部分属于且不局限于政治学领域,还触及到广阔的其他社会领域,比如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等。因此,作为学科的统一战线学,自身具有明显的独特性,特别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上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很有必要进一步理顺学科理论体系。

从长远规划的角度,随着学术界对统一战线学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意义、价值的认可和肯定,可在时机成熟时,推动按照关联学科归类,划归作为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下明确、独立的二级学科,纳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and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如此一来,一是有利于实现统一战线学在学科归属、学科目录编制、专业人才培养方面的进一步科学化,最终把统一战线学建设成为一门学理明晰、逻辑严谨的独立学科。二是有利于体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运用,通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科的研究方法来正确认识和揭示统一战线学的内在科学原理及

其运行规律,促进统一战线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服务。三是有助于完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分类体系,促进相关研究领域细分,动员和吸引更多广泛的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学科建设,形成良性互动机制,推动统一战线事业的科学发展和统一战线学研究的科学体系不断完善,形成规范的一战线学学术话语体系。

二、准确把握与学科建设相关的问题

(一)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的问题

统一战线学相关理论政策形成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革命实践中,这也造就了它与许多学科不同之处,即具有很强的政治性。1945年5月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由此形成共识,此后经过长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了关于统一战线的科学知识体系。由于这一特点,以及统一战线研究工作始终以服务党的政治意图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践中往往更多从政策实践的角度理解统一战线,这种认识的局限性,导致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越渐偏离学科属性,进而湮没了学理性。如果仅仅从战略和策略的角度来理解统一战线,单纯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战略和策略”^[3],就矮化和窄化了统一战线。因为一旦无产阶级改变战略和策略,或某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就可以抛弃统一战线,这样的统一战线只具有工具意义,不具有价值意义。^[4]因而,统一战线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是一门“学问”,是对统一战线根本规律的哲学追问;其次是关于统战理论的“学术”,是对统一战线原则规律范畴等的规范研究;再次是一门“科学”,即按自然科学的检验和解释方法对统一战线的形式、组织、功能等进行预测、归纳和认证的实证研究。^[5]归根到底,必须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正确把握和处理二者关系,坚持政治性为灵魂,同时强化统一战线学学科的学理性,用属于统一战线学自身的学术语言做到“用学术讲政治”,通过开展学理性探索强化统一战线学的学科性功能,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上获得实质性突破。

(二) 学科体系和课程设置的问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领域的固化,统一战线学学科的特色学科和重点学科的分支学科尚需要进一步丰富和细化。^[7]但客观来说,统一战线学学科“知识的系统化使命和制度化使命”进程中尚存在一些问题。当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和山东大学联合培养“统一战线学”研究生教育,课程设置主要包括“专业外语”“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等公共课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统一战线学原理”“统一战线经典著作导读”等专业课,以及“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思想史”“统一战线中的宗教问题”“港澳台及海外统战”等专业模块。无论是专业领域还是逻辑结构,都基本符合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但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推进和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大统战工作格局的建构,统一战线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工作也需进一步创新发展。从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特征看,统一战线若干分支学科或专业方向,如统一战线学原理、统一战线思想史,共同构成了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这种构成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保持了在学科整体性下的相对独立性,分支学科或专业方向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因此,从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新发展需要的角度看,在培养方案上特别是应做好课程设置的同步实时更新,确保统一战线学研究生教育的培养质量,并以此助推学科建设发展。一是增设“侨务基本理论”等作为专业课,实现课程设置在统一战线各领域范围上的全覆盖;二是优化前沿讲座内容,确保涵盖“人民政协理论”“非公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无党派人士和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统一战线中新的社会阶层问题”等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各个方面;三是将“统一战线中的民族问题”“统一战线中的宗教问题”“港澳台及海外统战”“侨务基本理论”等课程设置为选修课,赋予研究生更多自由选择的权利。四是丰富教学形式。如增设座谈交流课程,引导研究生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期间用好校内资源,择机参与校内进修班、

培训班的交流讨论,促进理论联系实际,更好把握统一战线学科科研工作。

三、积极为学科建设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一) 打造人才培养基地

学科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系统性工程,涉及方方面面工作,关键一环就是学科人才的培养。2018年12月,中共中央印发《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第三十三条明确指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可以依法申请取得相关学科的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纳入国家学位管理体系”。历经5年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实践探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统一战线科研人才培养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在学科建设方面也肩负着责无旁贷的统领、整合和示范责任。因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应当把握好贯彻落实《条例》契机,精准发力,积极争取,向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依法申请取得统一战线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从而有效发挥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作用,充分运用在培养模式、学科方向、课程设置、师资储备等方面的资源优势,推进并带动全国社会主义学院系统共同搞好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不断拓展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阵地,切实把中共中央对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的新精神新要求落实到位。

(二)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要政治素质过硬。作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和教学的教师,一方面必须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具备以学术讲政治的本领,另一方面要能够“认真梳理和总结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经验,在理论研究的学理品质、创新精神上下功夫,在理论研究者的实践情怀、厚重学养和精神魅力上下功夫”^[8]。二是要业务水平精湛。作为统一战线科研工作的领航员,必须有扎实的统一战线理论专业基础和较宽的相关学科知识面,以及开阔的视野、精深的学术造诣和严谨的学风。三是要结构科学合理。按照学术团队建设需要,不但要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更要培养中青年学术骨干,形成有影响、有梯次的学科团队,整体提升学术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四是要注

重开放包容。一方面,聘请如中央统战部各厅室局领导同志等担任校外导师,并邀请他们开设统一战线各领域业务工作和方针政策内容讲座,促进学生学用结合,提高学科建设为统战工作服务的实效性;另一方面,采取强化集体备课、召开专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推动教师分享心得、交流经验,达到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目的。

(三)编写学科精品教材

相对于统一战线学研究生教育的发展状况,学科教材编写已略呈滞后状态。1997年,中央统战部组织编写全国统一战线干部培训系列教材,这套教材从统一战线工作实践出发,已经初步形成比较系统完整的统一战线理论体系。其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等十八所社院协作编写了“统一战线系列丛书”,系统概括了党和国家重要文件精神中关于统一战线理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又先后有《中国统一战线教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等优秀教材陆续出版,为统一战线人才培养包括统一战线理论专业研究生教育提供基本参考。但对于研究生教育来说,必须统筹考虑学历教育与职业发展的衔接,亟需编制一套更适用于研究生教育的精品教材。教材应具备以下特点:一是体现时代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历史的时序在变,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也在与时俱进,统一战线也面临许多新的重大变化,这些都必须体现到学科教材中去。二是体现继承性。作为参考教材,应当做好对既有学术研究成果的继承发扬,一以贯之地体现理论研究的继承性和稳定性。三是体现创新性。创新性是理论研究发展的生命力,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新时代统一战线学面临的新任务新情况新问题涵盖进来,结合实际作出丰富发展。

(四)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一是依托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及其下设的 11 个研究基地,鼓励引导研究生参与并推动形

成以各类研讨会和课题为纽带的参与机制,促进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二是加强学术研究中心建设,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现有的“中国政党制度研究中心”“参政党建设理论研究中心”“港澳台海外统战理论政策研究中心”之外,筹备建立以统一战线学基本原理研究为主、覆盖统一战线其他领域工作的“统一战线理论政策研究中心”,与原有的三个中心形成理论研究工作合力,增进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广度深度。三是办好统一战线学专业刊物。目前,统一战线领域刊物已经具备数量优势,全国省级、副省级城市社院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学报,但未有学报纳入 CSSCI 来源期刊。一方面说明统一战线类刊物在得到学术界高度认可方面尚有差距,同时也反映出,只有办刊工作与学科建设产生良性互动,以学科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刊物提供更多更好的理论研究成果,推动统一战线学刊物的特色化和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从而为广大统一战线理论工作者和学术人才的培养提供更广阔的载体和平台。

参考文献:

- [1] 李永忠,董瑛.对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5).
- [2] 孙信.论新时代统一战线专业人才培养[EB/OL].<http://www.zysy.org.cn/a1/a-XE2N9ZCDDCECF030BB93C7C>,2019-02-19.
- [3] 全国统一战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编.中国统一战线简明教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0:3.
- [4] 陈明明,肖存良主编.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前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1.
- [5] 张有明,张凤玲.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创新[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8).
- [6] 张有明,张凤玲.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现状、问题和对策创新[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6(8).
- [7] 周述杰.关于统一战线学学科建设的几个问题[J].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1).

责任编辑:蒋建忠

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优化的原则与对策

刘亮红

摘要: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效能优化,要坚持方向性原则,以导向为先;坚持同步性原则,以共识为核;坚持求实性原则,以管用为要。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效能优化路径是:细化“序列化”目标要求与评价要素,提升思想政治建设针对性;创建“一体化”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完善协调机制和督导机制;创新“系统化”工作方案与实施方略,强化问题导向和实践取向;强化“渐进式”自身建设与自我教育,推动个体自觉与目标融合。

关键词: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优化

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39-05

目前,效能不高已经制约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进而影响到参政党作用发挥。根据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目标制定相关的法则或标准,探索优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优化的对策是更好发挥参政党作用的重要方式。

一、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优化原则

(一)方向性原则:导向为先

作为参政党建设的核心和灵魂,抓好思想政治建设是提高民主党派自身素质的中心环节,是民主党派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根本保证。优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效能,最重要的是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因为方向就是旗帜,方向就是引领。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坚持方向性原则首要的即是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是我国政党制度中关于中共与民主党派关系中的一项带有根本性的原则。它指明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中共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通过提出路线、方针政策,并在共同贯彻执行中实现的。作为我国基本政治制度的多党合作,是一种党派间的联合活动,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来把握政治方向,协调各党派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是执政党,其他民主党派是参政党,这样的政治责任必然地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会有我国多党合作的格局。民主党派确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是他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自觉自愿的选择。各民主党派在自己的章程

收稿日期:2019-07-05

作者简介:刘亮红(1977-),女,湖南桃江人,湖南工程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系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2018年度重点招标课题“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研究”成果。

和决议中都明确规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民盟前领导人史良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经验，这就是我们的结论。”^[1]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相关的即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三个坚持”不仅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也是民主党派之所以能够在与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合作中始终保持进步性，做到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根本原因所在。当前坚持共产党领导就是真心实意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自觉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权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既是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又是民主党派能够经受住新时期各种严峻考验的需要，同时也是提高民主党派成员素质的需要，更是优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的首要要求。

（二）同步性原则：共识为核

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联系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其所联系代表群众的纽带，是党实现其领导作用的重要条件和有力工具，这个鲜明的政治性决定了思想政治建设必须把握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原则^[2]，并在实践活动中始终保持与中共中央的高度一致，以加强、扩大与中国共产党及全民族的共识为核心。共识是一个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的人所寻求的共同认识、价值、理想，是在多样性的基础上达成一致的意見、协调的行动。^[3]共识是聚集力量的基础，更是集中力量成就事业的前提。不同阶层、政党与不同利益诉求的人共识重叠度越高，社会就越稳定，不同阶层、政党与利益诉求的人之间的合作就越顺畅，效能也会越高。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各民主党派，正是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合作、风雨跟随的历程中，在大是大非的根本性、关键性政治问题面前，始终保持与中国共产

党的高度共识，才能保持其进步性，发挥好参政党效能的。因此，政治共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一个重要的思想基础，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制度化保障。优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就要继续保持、发扬好民主党的这种优良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要求各民主党派不断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水平，为推进新时代多党合作事业发展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支撑。

（三）求实性原则：管用为要

管用是对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建设最终目标的集中体现与关键所在，也是思想政治建设的基本要求。思想政治建设要坚持求实性原则就是要在思想政治建设实践活动中贯彻效能评价标准，它是衡量和测定思想政治建设成效的标杆。效能标准主要包括效果标准和效率标准两个方面。效果标准是指被评价者完成思想政治建设效果的标准，我们评价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效果如何，必然要对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实践活动的成绩与效果进行评价，主要考察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价值导向与道德规范的认同接受度与实践实现程度、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过程中各种资源的配置、利用与优化程度；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实践活动方式方法的合理利用与过程优化程度、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客体对思想政治建设实践活动的共识达成、目标实现程度情况，等等。效率标准是指被评价者在产出与投入比率方面的标准，是考察思想政治建设主体投入与思想政治建设产出情况的考察，设定取得的成果与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等的比例。简单地说，坚持思想政治建设的求实性原则就是既要思想政治建设效果好，又要产出比例大。因此，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就在紧扣这两个标准来进行，既提高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占主导地位的执政党的思想观念、价值导向、参

政党的道德规范的接受度、认可度和实现度,又要实现思想政治建设方式方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多些扎实管用的内容,少些花拳绣腿的形式。

二、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优化路径

(一)细化“序列化”目标要求与评价要素,提升思想政治建设针对性

民主党派工作是一个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多领域的系统工程,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更是一个连续的、递进的、一贯的整体过程,非一朝一夕之功可以立就,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因此,要将思想政治建设看作一个长远而连贯的过程,细化思想政治建设目标要求与评价要素,切实提升思想政治建设的针对性。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要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的终极要求与民主党派思想政治的评价要素保持高度一致,就要从细化这些目标要求与评价要素开始,构建序列化管理模式,一步一个脚印地将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落到实处。效能是指向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如何获取量化数据以及如何确定效能的参照系^[4],因此,可以从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能力增长与价值提升两个维度去序列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目标与评价要素,并以量化估分的形式去综合考评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在思想政治建设前后在个人能力与价值上的效果。

目标要求	评价要素	主要指标
基本素质	个人素质	受教育程度 人大、政协任职情况 社会职务担任情况 职称/职务 党派界别匹配情况 其他社会荣誉
	业务素质	综合工作能力 专业贡献/专业成果 特殊贡献 专业水平 论文、专著或专利
	政治素质	政治方向、政治理论知识、政治立场、政治敏锐性、政治观点、政治思路、政治共识、政治宗旨、政治目标、政治纪律
个人能力	能力体现	政治把握能力 参政议政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 合作共事能力 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
履职情况	参政履职	参政议政情况、民主监督情况、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情况、其他党派活动情况(含出席党派活动情况、参加相关学习情况等)

根据上表中所列目标要求与评价要素,并结合主要指标,分别在思想政治建设之前、之中和之后分别进行量化考评,全面、全程地将思想政治建设效能体现到民主党派素质提升、能力增长和履职尽责中。要将序列化的目标要求与评价要素实现整体把握。一是要由牵头负责协商联络的工作部门构建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的考评小组,这个可由统战部负责,统战部是专门负责协调和监督统一战线工作的职能部门,在更好掌握民主党派整体情况方面已经建立完善的机制与工作渠道;二是要引入专业的评价机构细化主要指标及其绩效内容,并根据民主党派的主要政治职责结合定性定量指标、分别赋予不同指标合适的分值与权重,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效能考评,强化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对效能考评标准的认可度,实现思想政治建设对履职尽责的激励与引导作用;三是要定期反馈考评结果,建立考评结果的运用、改进机制,确保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输入——过程——产出”和“背景——输入——过程——产出”的动态增值建设模式能起到对党派成员、党派工作与党派建设的积极作用。

(二)创建“一体化”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完善协调机制和督导机制

从组织学视角看,思想政治建设效能是民主党派促进其组织自身发展、实现组织目标的程度。对于民主党派组织来说,顺应新的政治环境并获取资源、组织内部优化、党派成员及利益相关者满意度等维度都是思想政治建设效能评价的指标。由于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是一个多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如何协调各个主体之间的关系创建分段连贯的“一体化”思想政治建设组织构建与运行机制,是提高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效能的有效途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不是党派工作加思想政治活动的简单相加,更不是党内政治资源和党外政治优势的堆砌组合。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在政治资源与政治优势上具有整合性,可以通过调整完善、优化组合、统一调配等方式最大限度

地发挥政治制度框架范围内一切可用的政治资源的作用。而要将政治制度框架范围内的各种资源整合成一个系统,必然要形成一体化的组织管理架构,实现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的一体化与整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完善协调机制和督导机制。由于民主党派是不同的党派的总称,不同党派又有各自的传统与所联系群众,因此,除了由党委统战部组织的思想政治活动外,同级民主党派之间较少联合进行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实践活动,更多的是同一党派内垂直组织相关活动,民主党派这种各自为阵、重垂直领导与管理、少横向交往与交流的工作态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体化运行。因此,一方面,有必要打破各党派各自为营的工作态势,实现思想政治建设的整体化、一盘棋管理,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和党组都有专门的机关党委负责党员及其所在单位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但在民主党派这样专门的部门却是缺失的,因此,可以建议在统战部成立专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处,整体规划、引导民主党派的思想建设活动,并组建一支人员稳定、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实现专职领导、专人负责,并在各党派指定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思想政治建设的上传下达与组织联络工作;另一方面,要实现思想政治建设的常态化,必须建立起各项规章制度,建立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章程,明确其活动目的、活动意义、主要内容与基本形式等,并明确考核标准与考核责任单位,着重发挥思想政治建设对党派工作的推动、引领作用。此外,还要发挥统一战线联系广泛与统战部牵头协调工作的优势,构建由党委政府相关部门专业人士与热心于党派事业的社会人才成立的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督导工作小组,定期督导,定时反馈,加强指导,强化效果。

(三)创新“系统化”工作方案与实施方略,强化问题导向和实践取向

系统化是进行全方位、全过程管理的核心要义。目前,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既缺乏与之配套的工作机制,更没有配套的工作方案与实施方略,

使很多工作浮于表面,流于形式,随意性、被动性、突击性较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问题导向与实践取向均无法有效体现,也与思想政治建设在民主党派自身建设中的地位极不相称。要彻底改观这一局面,就必须创新“系统化”工作方案与实施方略,从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问题入手,紧紧抓住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实践取向——有力推动党派工作与参政党作用发挥这个关键,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建设工作。目前,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党派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严肃性、系统性、全面性缺乏,造成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缺乏内在动力;相关制度不完善,缺乏配套工作机制,加上党派组织松散,容易被单位思想政治建设工作挤压和消解替代;形式陈旧、手段传统、渠道单一,导致思想政治建设效果弱化、反响不佳,从而影响成员参与的积极性,等等。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思想政治建设与工作实践及成员思想状况脱钩,针对性不强、“两张皮”现象的存在也让思想政治建设的效能大打折扣。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实践取向的强化都有赖于系统化工作方案与实施方略的出台,从制度上将这些问题解决最关键的是建立与党委统战部、民主党派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齐抓共管的机制,实现“系统化”管理。实践证明,民主党派成员的思想政治建设不能单靠民主党派自身来完成。因为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更多的是结合工作和改革的实践做好日常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不仅靠思想疏导,也要靠政策导向和纪律约束;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不仅要做好事后的补救工作,更应从研究、分析思想问题产生的根源入手,做好源头预防工作。要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坚持走民主党派组织与民主党派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齐抓共管的路子,逐步建立健全以成员所在单位为主、民主党派为辅的思想政治工作新模式。统战部与党派成员所在中共党组织要在自己的思想政治建设中合理安排、科学植入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内容,并会同党派机关制定科学、合理的工作方案与实施细则,通过头脑风暴、集体协商等方式,

对照问题与负面清单,结合责任主体逐一提出相关解决办法,最后综合汇总后列出系统化的工作方案,确保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的效能。

(四)强化“渐进式”自身建设与自我教育,推动个体自觉与目标融合

思想政治建设从本质上说是思想意识领域的实践活动,通过影响个人的意志认识来达到推动客观世界改造的目的。因此,更大程度上的思想政治建设效能是个人内在需求与自身意向的综合反映。而且作为思想意识领域的实践活动,思想政治建设最大的动因还是主体内在的需求,因而,民主党派思想政治建设根本效果的保证除了外在的制度规范、纪律约束与灌输强化外,更要依靠思想政治建设主体——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自我建设与自我要求。这就要求我们的思想政治建设通过情感的力量、信仰的力量、榜样的力量来激发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对自身建设与自我教育的内在需求,而这也是许多优秀党外代表人士能够脱颖而出的内在动力所在,他们正是在不断的自我学习与自我建设中实现个体自觉与社会责任、党派事业的目标整合的。在这方面,我们要注重发挥信仰的力量、榜样的力量与情感的力量。一是要引导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高瞻远瞩、胸怀天下,不畏浮云遮望眼,善于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步大势中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光明前景,将个人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紧密整合;二是善于汲取榜样的力量,每个民主党派都有自己光辉的历史、可歌可泣的创举与卓越的领袖,党派组织要利用好自己的传统资源,发挥好党派历史与党派领袖的天然资源优势,将这些资源变成思想政治活动最鲜活的人党第一课

的教材,丰富载体、创新形式,通过润物无声的形式渗透到党派成员的脑子里、心坎上,激发他们的党派自豪感与现实责任感;三是党委统战部及民主党派成员所在单位中共党组织要善于创新统一战线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主动关心,赢得民主党派成员与无党派人士的认同与好感,将组织的力量化作脉脉的温情,将耐心引导与热心服务、主动关怀结合起来,从理解、关心、爱护出发,达到团结人、凝聚人、激励人、培养人、成就人的目的。通过三种力量的作用,实现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实现由“他律”向“自律”、“被建设者”到“建设者”的转化,才能更好地将个体的“内驱力”引向对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党派事业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责任中,自觉自发地将个人需求与政治发展目标高度整合,共振发力,实现思想政治功能,并将思想政治建设的成效转化为个人尽职尽责的能力和水平。

参考文献:

- [1] 贾平安. 统战学辞典 [A].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 [2] 张耀灿, 陈万柏.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156.
- [3]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 共识教育 能力培养 行动学习——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培训理念的内涵解读及实践探索[J]. 陕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0(4).
- [4] Cameron K S. Effectiveness as Paradox: Consensus and Conflict in Conceptions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J]. Management Science, 1986, 32(5): 539--553.

责任编辑:王天海

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基本内涵

肖建平

摘要: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在发展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点,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则随着党际关系模式的不断深化而呈现出连续性和创新性的特点。民主党派履行民主监督职能,是中国政党政治和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主题。本文试图从监督形态与内容、性质与价值、特点与优势等方面,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基本内涵进行解读,以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关键词: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基本内涵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63(2019)05-00044-05

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进一步表述了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即“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实行互相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更需要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监督”,并提出了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的10种主要形式。^[1]2016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强调统一战线在促进科学民主决策中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各级党组织应当支持民主党派履行监督职能,重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完善知情、沟通、反馈、落实等机制”^[2]的明确要求。这两部党内法规从不同方面强调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的实现形

式。推动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工作,切实推动统战工作实践创新,服务党和政府工作大局,是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准确理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涵,正确认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价值,对于新时代做好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形态

根据监督主体和监督内容的不同,可以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分为四种形态,即政治性监督与事务性监督、常规监督与专项监督、单一监督与协同监督、组织监督与个体监督。

(一)政治性监督与事务性监督

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是中国政党政治的运

收稿日期:2019-05-07

作者简介:肖建平,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处教师,主要从事统一战线理论和协商民主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课题“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研究”(编号:18VVSJ025)阶段性成果。

行方式,其基本属性是政治监督。这一政治监督行为,依据其具体监督内容的不同,分别表现为政治性监督和事务性监督。政治性监督更强调监督政治事项,体现的是政治主体间的政治关系;事务性监督侧重强调社会公共事务,体现政治的社会属性,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在政治协商中提出意见和建议、在党委主要负责人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对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党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等等,这些监督属于典型的政治性监督。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政协召开的各种会议、组织的视察调研中,提出意见建议等,这些监督更多地表现为事务性监督。这两种监督形态并不是对立的,而是政治监督的两种具体呈现形式,共存于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现实实践之中,因不同的监督内容而侧重点有所不同。

(二)常规监督与专项监督

对“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开展监督,这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基本内容,属于常规监督。新时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形态更为丰富多样。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监督形式,即“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专项监督”。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要完善民主监督,加大对重大改革举措、重要政策贯彻执行情况和‘十三五’时期重要约束性指标等的监督,促进相关工作。”^[9]同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开展精准扶贫专项监督,这是在实践中发展而来的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一种新形态。专项监督与常规监督相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丰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的新内涵。

(三)单一监督与协同监督

依据参与监督的党派数量的多少,可以分为单一监督与协同监督,即一个民主党派开展的民主监督属于单一监督,两个及其以上民主党派共同参与的民主监督则属于协同监督。在现实政治

生活中,民主监督通常以单一党派为主体,这是由各党派的特色所决定的。但是,在监督实践中,特别是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由于某些问题牵涉到多方主体,在这种情况下,多个民主党派协同合作,发挥各自特色和优势,开展民主监督,有利于广纳良言、集思广益。对于协同监督,尚无相关文件加以规范,为此,是否认可或实施协同监督,需要政策予以明确。

(四)组织监督与个体监督

从监督主体及其组织方式来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既可以是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的个体,也可以是民主党的组织。从政策与实践层面来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既体现为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的民主监督,即以民主党派组织名义开展的民主监督;也体现为作为成员个体直接施行的民主监督,即党派成员在规定的程序范围内提出的意见、批评、建议。《条例》明确提出“担任司法机关和政府部门的特约人员参加相关监督检查工作”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一项重要形式。特约人员即是个体监督的一种实施方式。通常来说,组织监督与个体监督交互进行,并不能截然区别开来。以民主党派成员个体直接参与的监督形式,也应该获得党派授权,体现党派意志,突出其党派成员身份,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

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从政策层面上确立民主党派存在价值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认识,在监督内容上不断从原则性规范转向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笔者将从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政治文件的表述中,梳理、比较、观察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内容的发展变化及演变过程。

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是:在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扬民主,广开言路,鼓励和支持民主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且勇于坚持正确的意见。”该文件

将监督内容概括为“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应该说,这是一个总体性规定,至于民主监督内容包括哪些具体范围,则没有作出具体规定,客观上导致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实践中因其模糊性而造成操作性不强的现象。

2005年,《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进一步规范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内容,即“国家宪法和法律法规的实施情况;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党委依法执政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相较之前的文件,这一表述更加明晰化、具体化。为确保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落实到位,该文件还明确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6种形式、4种渠道以及相应的保障措施,这一系列举措确保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具体内容落实到监督实践中。应该说,这是关于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工作政策发展的一个标志性文件。

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明确了民主监督的10种形式,这不仅是对监督形式的简单罗列,更是监督职能的拓展和监督内容的规范和细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监督内容所体现的监督思路的变化,如第一条“在政治协商中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表述,是协商治理下民主监督的具体体现;二是监督内容的细化,如第二条“在党委主要负责人召开的专门会议上对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提出意见和建议”和第三条“对党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的表述中所包含的监督内容,与2005年“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的表述相比,监督内容进一步细化、进一步规范,更具有可操作性;三是监督内容的拓展,如第六条“受党委委托就有关重大问题专项监督”,第九条“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所包含的监督内容,这在之前是没有相应规定的,明显反映了监督范围的扩展和监督内容的充实。与此同时,政党协商内容的拓展,客观上也需要监督内容的拓展,这是一个同步协调推

进的过程。

从以上三个文件可以看出,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内容,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的变化而变化,是一个基于自身职能与时代主题协调适应、同步发展的过程,从原则性规范走向制度性规范,监督机制和监督内容不断健全和拓展,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政治实践中的可操作性、针对性越来越强。

三、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性质与价值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性质与价值功能体现在这一政治行为所依赖的制度及其制度所体现的政治理念中,可从多维视角进行观察。

(一)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性质

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之一。对于民主党派自身来说,民主监督是参政议政的延伸。实践中,有些地方模糊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的界限,混淆了二者的差别。参政议政不仅指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国家政权,同时也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侧重于决策之前。民主监督则是对党和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执行情况的监督,侧重于执行之中和执行效果。二者在其内涵上有不同的指向,共同构成民主党派的基本职能。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我国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我国逐步形成了由执政党监督、人大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对于监督制约权力行使、实现党的执政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民主党派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监督,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监督体系的重要一环。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属于异体监督的范畴,具有独特地位,有助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形成监督合力。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民主党派不仅仅是政治参与,也可通过提出意见和建议、开展批评等多种方式,对党和政府的工作进行监督。作为多党合作制度的具体运行方式,民主党派通过说实情、建净言的方

式开展民主监督,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改进政府工作,实现重大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升决策质量。可见,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题中应有之义和重要实现方式。

(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价值功能

一是政治参与。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和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有利于调动民主党派所联系社会群体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广开言路、广集民智、广求良策,推动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推动人民当家作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

二是社会整合。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在于其适应性和整合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通过社会整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我国的新型政党制度,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前提,执政党和参政党广泛合作,形成强大的社会整合力。通过制度设计,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集中各种意见、建议,推动党和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有效避免了西方政党制度囿于党派利益、阶级利益、区域和集团利益决策施政导致恶性竞争、社会撕裂的弊端,有助于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达成政治共识,促进政治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心聚力,共同奋斗。

三是约束权力。规制权力运行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追求,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民主党派在参政议政中,通过政党制度平台,发挥程序性制约功能,有利于党和政府决策的程序化、规范化;在对党和政府的政策评价中,通过表达意见、发现问题,发挥回应性制约功能,约束权力行使,规范权力运行。同时,民主党派开展民主监督,有利于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民主意识,发扬民主作风,自觉接受监督,奉公守法,抵制各种消极腐败现象,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四、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特点与优势

(一)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特点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政治监督而非一般性社会监督。在我国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中,民主党派所开展的民主监督属于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层面的高层监督、政治监督,而非一般性的社会事务监督。尽管在地方实践中,民主党派也对经济社会事务或专项问题开展监督,但是,其主要方面仍是政治监督层面。同时,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效力主要来源于其政治影响力,非其他监督主体所能比拟的。可以说,政治监督是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根本属性,与一般性的社会监督处于不同的层级。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外部监督而非内部监督。中国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民主党派对中国共产党的监督有别于党内监督,它是一种外部监督、异体监督,与执政党的内部监督有着显著差异。同时,民主党派联系广泛,地位超脱,既有助于达成监督效果,又有利于避免外部监督造成的一些弊端。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协商式监督而非对抗性监督。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这决定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目的是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改进政府工作。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广泛参加人大、政协、政府,寓监督于协商和工作开展之中,是柔性监督、协商式监督、合作性监督。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不是唱“对台戏”,不是搞政治竞争,而是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民主党派“对执政党的各种政策主张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最终是为了支持和帮助执政党执好政、用好权力”^[4]。所以说,民主党派民主监督不是权力监督,更不是对抗性监督。

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是双向监督而非单向监督。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方针规定执政党和参政党开展互相监督。为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中国共产党更应自觉接受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听取民主党派的意见、批评和建议,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同时,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治协商、政党协商等形式,将重大决策部署向民主党派通报,指导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共

同致力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因而,与其他形式的单方面监督相比,民主监督是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双向监督。

(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优势

民主监督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因其特点而具有鲜明的政治优势。

监督目标的一致性。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开展互相监督,基于其执政党与参政党的新型政党关系,则其监督目标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责任,而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有利于将各方面的社情民意反馈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中去,推动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国家经济社会事务健康发展。

监督意志的代表性。民主党派联系并代表一部分社会群体,这一社会基础决定了民主党派具有现代政党的一般功能,即在于表达这一部分社会群体的声音和诉求。民主党派能够有效畅通和拓宽社会表达渠道,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反映各方面的社情民意,体现了监督意志的代表性。

监督运行的全面性。从监督内容来看,涉及到对党委领导班子及其成员、党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有关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执行和落实情况、受委托的重大问题等等,体现了民主党派民主监督的广泛性。从监督形式上来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了民主监督的 10 种主要形式,监督形式更加丰富多样。从监督方式来看,可以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等

多种方式,凸显了监督方式的灵活性。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在制度和政策的规范下,在实践运行中充分体现了全面性,从而确保民主党派民主监督有序开展、富有实效。

监督效果的权威性。从监督主体的特性来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具有专业优势。民主党派历来具有智力密集、人才荟萃、联系广泛的优势,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也具有独到的视野。因而,其民主监督具有很强的包容性、针对性和专业性,能够有效减少监督中的“冷点”“空白点”和“盲点”。从监督的开展形式来看,民主党派民主监督具有非常强的组织化特点,作为一种组织化监督行为,具有正式性、规范性,其监督的权威性有组织保障。从监督意见的反馈来看,基于民主监督的政治属性,在民主监督的意见运用上,党和政府的回应有着制度性规范,从而为其监督的落实提供了有效保障。因此,民主党派民主监督虽不具备权力监督的刚性,但具有政治影响层面的权威性。

参考文献:

- [1]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6-8.
- [2]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EB/OL].(2016-11-02).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02/c_1119838242.htm.
- [3]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EB/OL].(2016-1-31).<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131/c64094-28098555.html>.
- [4] 李金河.论民主党派的民主监督[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7(02).

责任编辑:王天海

自由职业人员基本状况及统战工作研究

——基于无锡市的调查分析

陈德荣 李天鹏

摘要:自由职业人员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重要群体之一。无锡市委统战部立足于本地实际情况,通过重点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对自由职业人员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基本上对本地自由职业人员的人员构成、数量规模、群体特征、发展需求等基本状况形成“全景式”认识,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做好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自由职业人员;群体特征;统战工作路径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672-3163(2019)05-00049-06

一、自由职业人员的总体情况

作为百年工商城的无锡,自由职业人员的典型性强,在锡绣、紫砂、泥人、竹刻、二胡、剪纸、书画、影视、网络作家等行业中,集聚了一大批代表人士。为了能够全面掌握该群体的基本状况,增强统战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无锡市委统战部专门对本市近300名自由职业人员进行调查研究。从职业分布看,无锡市自由职业人员目前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群体。

一是文化产业、自由文艺创作人员。在参加问卷的自由职业人员中,自由文艺、文化创作人员68人,占24%,主要包括从事书法、绘画、摄影、摄像、音乐等方面的创作人员,以及影视导演、制片人、歌手、独立演员等自由演艺人员。客观上,他们不

隶属于政府文化艺术机构,以出售自己的作品获得报酬,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

二是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等自由写作人员。在参加问卷的自由职业人员中,自由撰稿人、网络作家19人,占7%,他们以文化市场、网络为媒介,把撰写、发表文章作为职业追求和经济来源。这一群体在整个自由职业中占比虽不大,但却有着较强的影响力和较为广阔的发展前景,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加上QQ、微信、微博等广泛运用,网络文学近年来异军突起,网络作家也迅速成为一种充满时代感的新职业。与飞速增长的经济总量一样,无锡也是网络文学快速发展的沃土,先后涌现了王辉(无罪)、刘菊华(红小妖)、吴颖达(傲无常)、陆彦超(缘分0)、张敏(刘小备)、王晓(大雪

收稿日期:2019-08-02

作者简介:陈德荣,中共无锡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李天鹏,无锡市委统战部知工处、新阶层处处长。

崩)等十多名网络作家领军人物。

三是知识型市场从业人员。在参加问卷的自由职业人员中,知识型市场自由职业人员 55 人,占 20%,主要包括媒体与营销策划师、企业培训师、市场调研咨询师等自由策划咨询人员,以及自由经纪人、设计师、翻译等自由职业者,是伴随市场经济发展成长起来的“自由白领”。因职业要求,这一群体距离市场最近,“嗅觉”最敏锐,通常具有较强的市场综合分析及观察预测能力,是无锡经济社会发展的风向标。随着政府工作导向的变化,东风吹来满眼春,也催生了诸如企业培训、媒体与营销策划、自由经纪人等一大批新的业态与从业者,似雨后春笋成长在无锡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在构筑自己美丽梦想的同时,也如同一只只“隐形”的大手,在助推无锡这一改革开放的巨轮劈波斩浪,驶向更深、更广的天地。

四是技能型市场服务人员。在参加问卷的自由职业人员中,技能型市场服务从业者有 47 人,占 17%,主要包括从事个体工程机械技术人员、电器及电子信息产品维修等技能型人员。这一群体的从业人员,大多拥有高超的技术和手艺,也见证和伴随了无锡近年来的转型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无锡因“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这一得天独厚的历史条件,很快成为电子信息产品生产与销售的重要集散地,“530”人才计划、“太湖人才计划”的实施,集成电路产业园、国家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等重大项目的落成,吸引了众多电子高技能人才来锡创业。

五是手工制作相关的从业人员。在参加问卷的人员中,从事手工艺品制作的 88 人,占 32%,主要包括从事惠山泥人、锡绣、留青竹刻、剪纸、二胡、茶道,以及紫砂、陶艺制作、阳山水蜜桃等农产品包装、销售的人员。近几年,在手工艺从业者中,宜兴市的紫砂制作可谓风生水起,云集了一大批从事紫砂设计制作、推广营销、宣传包装、创意休闲等自由职业人员。资料显示,仅丁蜀镇直接或间接从事紫砂产业的就有 10 万余人,当地有紫砂企业 400 多家、紫砂家庭作坊 12000 多家、紫砂专业

合作社 67 个,相关的文化创意企业 30 多家,各类工作室 1000 多家。宜兴紫砂产业方兴未艾,异彩纷呈,从业人员队伍仍在不断扩大。

二、自由职业人员的群体特征

与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相比较,自由职业人员以下几个方面特点较为突出。

(一)“有职业,无单位。”自由职业人员远离组织,远离机制,本身不与用人单位建立正式的劳动关系,同时又区别于个体、私营企业主,仅仅凭借自身技能获取劳动报酬和立身之本,获得生存发展的空间,其最大特点就是只有“职业”属性,没有“单位”属性。统计显示,45 岁以下中青年目前是无锡市自由职业人员的主体。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市场化越充分,经济交流越活跃,社会分工越精细,自由职业人员也会越来越多,职业的流动性、变动性也会越来越大。在受访对象中,3 年内更换过 1 次工作的有 69 人,占 25%,更换过 2 次工作的有 94 人,占 34%,3 次以上的有 61 人,占 22%。这种来去自由、高度分散的不确定性,使统战工作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从业人员人头难找,充满变数,有时即便找到了人也很难开展工作,很难将其聚在一起,统在一处。

(二)“有技术,无职称。”自由职业人员多数有一技之长,是受群众认可的“小能人”,他们靠专业技能“混饭吃”,常常能在社会中不断发现新的商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同时也笃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希望运用知识、技能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而现实生活中,受体制、机制运行等方面的影响,自由职业人员步履艰辛,有时“仅有技术是不够的”,在职称评定、资格认定、荣誉表彰等方面,往往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障碍与壁垒。惠山泥人称得上无锡标志性文化产品,据市文管部门介绍,现有 2 名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 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7 名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当前从事泥人制作的自由职业人员不下 300 人。不管是生产加工销往民间的传统泥人粗活,还是“手捏戏文”类的细活,功力再深,活再好,没有国家统一认定颁发的职称,产品价值就要大打折扣。从事紫砂制作的自由

职业人员,境遇与泥人从业者类似。其他诸如书画、音乐、动漫等行业的从业者,有职称的“大师”更少。对多数人来讲,职称始终是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如同天上的明月,“看得见,摸不着。”

(三)“有收入,无保障。”自由职业人员在个人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普遍呈金字塔形分布,处在“塔尖”的少数“大师”、“大咖”名气大、影响大,经济收入也高,占尽了春光。而越往下,从业人员越多,名气、影响力越小,个人收入也越少。调查数据显示,无锡自由职业人员中,仅有10%以上人员年收入达到30万元,有近一半自由职业人员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另有15%的人年收入在5万元以下,多数人认为自己并非所谓的“成功人士”,缺乏足够的阶层自信。在“经济地位、社会地位、政治地位”1-10级的阶梯问卷中,与周围其他社会成员比,80%以上自由职业人员自我评定在5-8级,很希望政府能够不断完善行业准入、市场监管、版权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促进个体职业的繁荣发展。除此之外,让自由职业人员担忧的,还有个人在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的保障。统计显示,40%以上的受访对象养老、医疗保险没能按规定、按标准完全交纳。因职业、身份所限,自由从业者与现行保障制度很难一一对接起来,享受不到相关政策待遇,很多时候成为保障措施难以覆盖、难以受益的“局外人”。

(四)“有小众,无大众。”尊崇个性自由、有着较高的自主性,这是自由职业人员较为明显的群体属性。他们崇尚“我的青春我做主”,凡事喜欢不受约束,自己说了算。而从整个社会角度来看,该群体仍处在“边缘化”位置,社会关注度不高。自由职业人员常常在自己的相对独立的空间生活、工作,单枪匹马,独闯天下,加之隔行如隔山,各自所从事的职业千差万别,平时互相交集少,之间几乎没有往来,缺少交际方面的纽带,相互感受不到群体的力量和群体的存在。而客观上,自由职业人员文化素养相对比较高,除自己的劳动付出需要得到社会认可,对精神归属也十分看重,对群体认同的内在需求又十分迫切。

(五)“有梦想,少信仰。”自由职业人员视野开阔,思维灵活,有梦想,有活力,有热情,有专长,对未来充满憧憬。而受个人职业、生存现状等因素影响,多数自由职业人员把精力用在追求职业上的完善与专业上的优秀,孜孜以求,乐此不疲。而在理想信念方面,反差较明显,多数自由职业人员在政治方面个人诉求有限,关注度、参与度普遍不高。从问卷调查来看,在日常生活中“最关注的重大问题”结果排序依次为:生活环境、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创业环境、经济发展、法治建设、政治建设,“政治建设”排在最后一位。在“如果你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党派,最愿意加入哪个组织”一项,有46人选了“中国共产党”,仅占16%;而在“对他人信仰宗教”一项,236人表示“理解”,占86%,显示了理想信念方面的困乏与缺失。多位受访的自由职业人员表示,自己会认真遵守国家的法令、法规,但并不想过多地参与政治,只想多挣些钱,“真金白银”拿在手上才踏实。对于统战工作,自由职业人员知道较少,了解也不多。

三、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路径探索

自由职业人员习惯于独立自主,工作、生活方式享有较大的自由空间。在这一群体中开展统战工作,需要用细功夫、慢功夫,和风细雨,润物于无声,注重唱好“六步曲”。

(一)加强联系,把自由职业人员团结起来

开展统战工作首先要找到人,把工作对象及时联系起来,手上有人,心中才会有底。为此,市委统战部开展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工作,赴与自由职业人员联系紧密的市文联、文广新局、文旅集团等单位了解相关情况,到自由职业人员相对集中的宜兴市丁蜀镇、梁溪区惠山古镇、新吴区梅村街道,召开紫砂、惠山泥人、二胡、锡绣等从业人员参加的座谈会,登门拜访部分自由职业代表人士,与他们面对面交朋友,认真了解他们的生存现状,听他们讲自己的创业故事、成长故事,听取其所思、所想及真实需求。在此基础上,市委统战部建起了自由职业代表人物的数据库,创建了微信群,注重加强线上线下的联系、联络。

为形成工作合力,2018年9月,在市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支持下,筹备建立了与组织、宣传、公安、民政、文联等18个市级机关部门、群团组织组成的统战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制订了《联席会议工作规则》、《成员单位工作职责》和《办公室工作细则》。定期召开专题会议,分析自由职业人员的思想形势,研究制定工作措施。工作中,市委统战部还注重发挥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知联会等统战组织的作用,加强同自由职业人员的联系。同年10月,民进梁溪区基层委员会成立了网络文学作家支部,力求培养网络作家中的代表人士和领军人才,发挥网络文学作家会员的作用,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多出文学精品,弘扬正能量。2019年6月,民进网络作家支部又与市文联联合开展无锡网络文学“金手指”奖评选活动,积极推进文化惠民,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展。

(二)搞好培训,把自由职业人员组织起来

组织学习培训目前是团结自由职业人员最管用、最直接,也是最富成效的工作手段。2018年无锡市委统战部启动了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十百千”专项培训工程,用3年时间市本级重点培养10名新阶层人士中的骨干人物,培训100名新阶层代表人士,各县(区)累计培训1000名新的社会阶层后备骨干人士。“十百千”培训工程涵盖了自由职业中的代表人士,为搞好思想引领打下了扎实基础。

在培训内容上,做到“四个突出”。一是突出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自由职业人员深刻领会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二是突出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特别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决策部署,学习统一战线理论政策、基本知识、优良传统等,着力提升理论素养,补足短板;三是突出省、市委全会精神 and 重大决策部署,了解各领域重要方针政策、重大决策部署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拓宽视野,提高认识;四是突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知识,了解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和

历史文化,提升文化素养,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在培训方式方法上,做到“三开”。一是开展市情考察。充分发挥无锡统战资源丰富的优势,组织自由职业人员赴荣毅仁、钱伟长、周培源、王选等名人故居参观见学,邀请当地文化名人介绍无锡悠久的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培育自由职业人员爱祖国、爱家乡的朴素情怀,强化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二是开拓培训渠道。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社团、行业协会的合作,采取联合办班方式,提高培训实效。三是开放培训方式。从自由职业人员思想特点出发,在开展红色革命传统教育中,注重现场教学实践,组织赴长沙、湘潭等地参观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纪念馆,重温革命历史,弘扬革命精神,引导他们把理想信念融入职业操守,把追求人生出彩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听党话,跟党走,打下与党“同行”的烙印。

(三)创建基地,把自由职业人员凝聚起来

流动性强、高度分散、难以抓在手上,是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面临的实际困难。工作中,为破解这一难题,无锡市委统战部采取创建实践基地的方法,依托实践基地来吸引人、凝聚人、塑造人。2016年初,市委统战部把“无锡新英汇”定位为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品牌,力求将“无锡新英汇”打造成各路英才、精英人士汇聚之地。为耕耘好这块新阶层人士工作的“实验田”,将统战工作的“同心圆”画好画大,制订下发了实践基地创建方案,力求实现“五有八平台”。“五有”就是要有计划、有场地、有内容、有制度、有台账,“八平台”就是要打造教育培训、聚才引智、联谊交友、创业服务、建言献策、实践锻炼、服务社会、风采展现八个方面的工作平台,让新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切实在自由职业人员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搞好服务,让自由职业人员成长起来

自由职业人员的体制外、单位外的特点,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政治参与方面,会遇到和面临更多、更具体的问题,且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渠道相对

也比较单一。

工作中,无锡市委统战部着眼于自由职业人员的发展,注重在服务和支持上下功夫,发挥联络协调作用,在各级党委政府和自由职业人员之间搭建“连心桥”,增设“回音壁”,开设“直通车”,提供与政府部门直接沟通交流的便捷渠道,及时了解掌握有关扶持、奖励、优惠等创新创业方面的政策,帮助自由职业人员妥善解决职称评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等问题,为其事业发展提供实际帮助。2019年7月,在新成立的无锡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中,还专门设立了自由职业人员专委会,为广大从业人员及时提供服务。为了解决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自由职业人员的学历、职称及工作成果评定问题,市委统战部专门召集市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园区召开专题工作协调会,将影视、文化自由职业人才的扶持纳入市“太湖人才计划”,补齐影视人才成长的“短板”,同时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支持推进文化领域、文化产业人才建设,让高层次人才真正在无锡“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五)开展评价,把创业热情调动起来

自由职业人员队伍比较庞大,其中的代表性人士是统战工作的重点。基于此,为造就一支政治坚定、素质优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的自由职业代表人士队伍,无锡市委统战部进行了综合评价工作的探索与尝试。

2016年5月,市委统战部研究制订了《无锡市新的社会阶层代表人士综合评价细则》,根据不同群体特征,科学设置评价指标,建立起了包括政治思想、履职尽责、工作创新、公益慈善、遵纪守法、社会影响等六大类、20多个项目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将相关内容量化、细化,本着“凡荐必评”“凡进必评”“凡用必评”的原则,以各级党委统战部门为主体,协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自由职业人员代表人士进行全方位评价。市委统战部印制了《综合评价工作手册》,下发县(区)统战部门及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加强对代表人士的选拔培养。在此基础上,市、县(区)两级都

建立了自由职业代表人士人物库,对人物数据进行动态管理,及时维护更新。在开展自由职业人员综合评价工作的同时,市委统战部还与自由职业人员评比表彰结合起来,开展了“优秀新阶层人物”选树活动,运用主流媒体及新媒体,加强对代表人士的推送宣传,扩大社会影响,通过典型引领,形成培养一人、影响一批、带动一片的工作局面。

(六)合理安排,把代表人士使用起来

无锡市委统战部积极畅通自由职业人员政治参与的渠道,坚持将自由职业人员纳入全市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总体规划,积极举荐优秀代表人士加入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联会等党派团体组织,运用综合评价结果,做好代表人士的政治安排、社会安排和荣誉安排,将政治参与热情高、参政议政能力强的自由职业人员推荐提名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2018年市、县(区)人大政协换届中,自由职业人员担任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7名,担任县(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有30余名,另有20多人担任政府行风监督员、特约监督员,为自由职业人员发挥作用提供了平台,创造了条件。

四、关于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几点思考

相对于其他群体的新阶层人士,自由职业人员的行为模式更为松散,思想也更为开放活跃。因此,做好这一群体的思想引导工作,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认真思考和把握。

(一)思想需包容,既要寻求“一致性”,也要看到“多元化”。自由职业人员崇尚“知识就是力量,奋斗成就梦想。”他们工作有朝气,敢试敢闯,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比较强,可塑性也比较大。同时,由于他们平时的工作时间、工作环境、工作模式相对宽松,重视个性发展,加之自身小资情调突显,向往“诗和远方”,富有理想情怀,追求有创意的工作和生活,想法多、变数大,呈现五彩缤纷、多角多元的思想方式。对此,要能够正确看待,以尊重、信任、包容之心,正确理解自由职业人员这种鲜明的“多元化”,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通过课

堂与现场、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的交流融入,循循善诱,帮助他们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认识水平和政治素养,最终形成思想认识的“一致性”。

(二)方法需多样,既要搞好“有形教育”,也要注重“无形感召”。统战工作的核心是搞好思想引领,而思想引领的关键是内心认同,通过有效开展工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能够让自由职业人员内心引起共振、共鸣,产生认同感,进而形成思想共识。一方面,要通过“有形”的教育学习、培训考察,运用适合自由职业人员特点的工作方式方法,开展正面学习教育,进行讨论辨析,求大同,存小异,使他们认识到言论有边界,价值有尺度;另一方面,更要注重“无形”的情感输入,统战干部要不断提升修养,提高文化品味,树立良好的品格和形象,通过工作交往,将真诚、善意、责任、公心等人格要素传递给对方,从而使其通过统战干部认识党的干部、理解党的政策、感受党对新阶层人士的关心,由情感上的认同,升华为思想上的认同、政治上的认同。

(三)手段需更新,既要有“行政化”跟进,也要有“社会化”拓展。当前,我国已经步入一个全新的改革开放时代,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面临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工作中,统战部门要承担起牵头协调职能,联合相关部门、单位、群团组织及地方党委,增强自由职业人员所在行业、楼宇、园区、社区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功能,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新阶层人士联谊会、专业人士联盟等组织的作用,挖掘内部潜力,带动和影响自由职业人员。同时,统战部门也要创新服务理念,在“大统战”格局下,对现有平台载体进行有机

整合,勇于开辟新的工作路径,深入拓展市场化、社会化的工作模式,不断创新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的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和活动方式,协调多方力量,“借力”而为,“借势”发展,提高工作成效。

(四)施策需精准,既要懂得“给什么”,也要知道“要什么”。自由职业人员由于不具有“体制内”的身份,作为“社会人”,向上流动的渠道受限,对自身生存空间、发展空间考虑比较多,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方面的具体问题,譬如,司法制度、劳动保障、发展环境等方面疑虑和困惑比较多,对一些社会现状也会有自身的评判标准。为此,统战机关要充分了解他们的内在需求,在“给”之前先要明白自由职业人员到底缺什么、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提供哪方面的帮助,努力提高工作的精细化、精准度,有话说与知人,有饭施于饥人,切实将资源用在关键处,帮在需要时,提高工作效用。

(五)工作需接地,既要“站位高”,也要“落点实”。做好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客观上要求统战部门树立大局观念,提高政治站位,从党和国家全局出发,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但自由职业人员统战工作是做人的工作,做社会中最自由、最松散、最活跃群体人员的工作,措施必须具体实在,必须“落地”,具有操作性,能看得见、摸得着,工作作风一定要扎实,要一字一板打根基,一步一个脚印抓落实,把实践基地建起来、用起来,活动开展起来,把人头联系起来,尤其群体中的代表人士,一定要选准、选好、选强,确保平时能够联系得上,关键时候能够用得上。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延伸手臂,工作才会有抓手,凝聚起广大自由职业人员的力量智慧,为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

责任编辑:郭晓东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社会化路径探析

喻迎春

摘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是新时代统战工作新兴领域。以社会化方式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是统一战线在传统方式基础上的一大创新,是适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群体特征和时代要求的发展方向,有利于解决单纯依靠行政推动带来的不足。从行政化到社会化是统一战线在追求“一致性”基础上,对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多样性”的大胆尝试,必然带来工作理念、格局、范围、方式等诸多要素的重大转变;针对这种转变,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思维体系、引导体系、组织体系、活动体系,提高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关键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社会化;对策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55-05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统一战线新的工作对象,也是新时代统战工作新的着力点。作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何切实有效地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强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团结引导,是统战工作的重要任务。如何适应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特点,运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易于接受的方式开展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是统战工作面临的新课题。

一、社会化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发展方向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工作方式,把握社会化的方向,抓住网络这个重要途径,多运用讨论的办法、交流的办法、增进情感的办法,更好地把他们组织起来。”^[1]中央出台的关于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

的《意见》和省委办公厅制定的《实施意见》也明确,要按照“社会化工作思路”,“探索创新联谊组织的组织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通过“社会化运作”的模式,实现“从统管包办到服务指导的转变”,防止“行政化、空心化”。从这个意义理解,所谓社会化就是在坚持党的政治引领前提下,依托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采用社会化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来充分调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性和主动性,真正把他们团结起来、发挥作用的实践探索。相对于行政化而言,社会化方式有利于弥补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带来的不足和“短板”。

(一)从领导体制看,社会化方式有利于解决行政力量推进不力的问题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四大群体”,分布在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联系面广,涉及面宽,单纯依靠统战

收稿日期:2019-07-15

作者简介:喻迎春,中共南通市通州区委统战部,侨办副主任。

部门是管不好、也管不了的。《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规定,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建立由统战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参加,社会有关团体参与的联席会议制度,实行部门联动、齐抓共管,凝聚工作合力。这一机制的最大优势,虽然实现了统战工作由统战部门“一家来做”到多个行业主管部门“齐抓共管”转变,但具有明显的行政色彩。一方面,统战部门、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作为工作关系的主体,无论是活动组织、载体建设、机制建立等等,都离不开行政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工作关系的客体,对于党政部门开展的工作往往处于被动参与的地位,工作缺乏积极性、主动性,活动参与率低,很难实现由“要我做”到“我要做”的角色转换。另一方面,从实践层面看,由于思想观念、理念认知和工作方式等方面的因素,各成员单位更多地还是从业务工作角度,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管理和服务对象来看待,对于如何用统战工作理念和方式与本单位职能工作有机融合,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地开展,还需要长时间的检验。实行社会化方式,在坚持统战部门主导推动,加强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部门协作、工作联动的基础上,有利于发掘社会资源,利用社团组织搭建活动平台,使社会力量成为协同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有益补充。

(二)从组织体系看,社会化方式有利于解决行政手段覆盖不广的问题

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相比,他们的思维更加活跃、观念更加多元、人格更加独立,具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和较高的文化层次,而且分布行业众多、从业领域广泛,社会影响不可低估,是真正的“社会人”。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党外知识分子工作时指出,我们党历来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组织起来。这也正是各地统战部门目前采取的主要措施,其通常做法是物色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代表性人士组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选取重点场所设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示范基地或活动阵地,然后通过加强联系、组织培训、开展活动,有重点地加强代表人士教育培养和

政治引领,利用代表人士来做新的社会阶层不同人群的工作。但是,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对象复杂、数量众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往往只能吸纳各行业、各领域的少数重点代表人士参加,很难做到各方面广泛覆盖,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十分有限。这一模式本质上仍然是“少数人”的统战工作模式。实行社会化模式,依托不同专业、不同行业、不同兴趣爱好等要素,结合街道、社区、楼宇等不同区域特征,引导成立社会化组织平台,延伸工作臂膀,提升组织吸附能力,可以实现由“少数代表人士”到“多数普通人士”的转变。同时,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作为“社会人”,出于个人成长和发展空间考虑,也有加入组织的意愿,增强组织归属感。

(三)从载体运用看,社会化方式有利于解决行政方式活力不强的问题

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团结引导工作,根本任务是要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增进他们对党的领导和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引导他们“听党话”“跟党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更好地发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作用。实现这样的目标,关键是要把他们有效“组织起来”,灵活运用各种适合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活动载体,调动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他们的“主人翁”意识,以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促进其个人梦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从而潜移默化地把他们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由于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大都在“体制外”,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他们价值观念多元、思想活跃,专业技能和文化层次较高,单纯依靠行政方式是很难将他们组织起来的。统战部门开展的活动,对他们凝聚力不强,影响力不大,也很难达到预期效果。实行社会化方式,利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社会交往、商务协作、人际交往中自然形成的“工作圈”“朋友圈”“商务圈”“兴趣圈”,可以有效提高他们的组织化程度和活动参与的热情,而且这类社团组织具有明显的“自治性”,通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完善,可以有效解决依靠行政

方式难以解决的活力不强问题,拓宽联谊交友空间,提升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社会化的主要特征

如果说行政化方式是传统统战思维和统战方式所秉持的固有特征,那么社会化方式则是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在传统模式基础上进行的传承、扬弃和发展,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战工作范式的重大演进和时代创新。可以说,这种创新正是在寻求统一战线“一致性”基础上,对方式方法“多样性”的大胆尝试。而且这种尝试正是基于社会阶层变化对新时代统战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其核心要义是“变”与“不变”的时代内涵。不论是行政化,还是社会化,统一战线作为凝心聚力的重要手段,“不变”是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是基于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变”是工作方式、方法手段和实现路径上的载体创新、机制创新、方法创新,是统战工作与时俱进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化方式相比于行政化方式而言,必须带来工作理念、工作格局、工作范围、工作方式等诸多要素的重大转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一,工作格局由“封闭领域”向“开放领域”转变。由于社会化方式打破了传统统战工作以体制内为主、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的限制,依托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拓宽领域、吸纳成员、组织活动和自我运作,将一般性事务交由社会组织,通过社会组织“代理人”和“志愿者”进行管理和服务,使统战工作实现了由政治领域向社会多领域延伸,从政治层面向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社会等多领域扩散,提高了统战工作的社会开放度^[3],扩大了统战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第二,工作对象由“关键少数”向“绝大多数”转变。社会化方式以社团组织、“自组织”为依托,通过行业、兴趣、爱好、职业等组成“工作圈”“生活圈”“朋友圈”,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组织起来,加强团结引导。这样的工作模式打破了以往单纯依

靠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把各行业领域“代表性人士”“专业精英人士”组织起来的做法,转而把一般性社团组织吸纳进来,面向更多行业、更广领域的一般性人士,通过建立核心团队,以共同兴趣爱好、相同价值追求,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公益事业、开展社团活动,凝聚起大量“粉丝”^[3],影响一大批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现统战工作由“重点代表性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向“一般社团组织+一般性人士”的拓展,扩大了统战工作覆盖面。

第三,工作方式由“显性统战”向“隐性统战”转变。统一战线作为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主要手段,关键是政治引领。实行社会化方式,减轻的是行政色彩,弱化的是行政干预,但绝不意味着通过“社团自治”而削弱甚至忽视政治引导。相反,它需要把思想政治引导更加有效地融入到社会组织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去,通过更易于接受的途径和方式,潜移默化地开展,最终取得“绵绵用力”“润物无声”的统战效果。

第四,工作重心由“统管包办”向“服务指导”转变。社会化方式归根结底是统一战线参与社会治理的一项创新性工作,要求统战工作必须打破传统思维,以更加开放的思路转变观念,以更高的政治站位统筹谋划,按照社会化、平等化、市场化、人性化的理念,顺势而为,因势利导,推动统一战线与社会发展相互融合、良性互动。正确处理好统战部门与社团组织的关系,厘清部门职能与社团组织的相互职责,把工作重点放在政治原则、政治立场、政治方向的把握上,加强对社团组织的服务指导。改变以往由统战部门“大包大揽”,把一般性社会事务从部门职能中剥离出来,授权、委托或下放给社会组织或个人,由它们承担对社会活动的组织、谋划、编排和服务等工作,实现社会力量对统战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统战工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4]。

三、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社会化的路径选择

以社会化方式推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

作,关键是要破除传统思维的束缚,大力推进统战工作方式方法创新,增强统战工作的针对性、适应性和有效性,以更加宽阔的思路、更加灵活的方法、更加务实的措施,推动政治引领和服务功能有机融合,汇聚人心,凝聚力量。

(一)突出针对性,构建与社会化方式相适应的思维体系

社会化方式是在传统方式方法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要求统战工作在理念上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广的社会视野和更大的工作格局,推动统战工作思维模式的转换。譬如,宁波市北仑区在大港社区这个纯工业社区开展外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统战工作中,探索以“拼图思维”优化组织设置,把资源整合起来;以“铁军思维”打造高端人才,把力量汇聚起来;以“圆心思维”创新载体平台,把优势作用发挥出来;以“发展思维”拓宽工作领域,把社会形象树立起来,为我们拓宽思路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这种思维模式,归纳起来重点要把握三个方面:一要确立开放性思维。社会化方式由于社会参与程度高,具体的工作手段与传统模式相比具有较大差异,单纯依靠政治学习、理论培训、座谈交流等传统手段是行不通的,必须以开放的思路,吸纳多元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多运用讨论的办法、交流的办法、增进感情的办法,“敞开大门”与他们广交友、深交友,以大团结大联合画好最大同心圆。二要确立系统性思维。打破统战工作“部门化”思维定势,以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联席会议为平台,综合运用各党政部门、各党派团体和各类社会组织资源优势,加强联系协作,推动统战工作在与各部门团体相互融合、齐头并进的同时,逐步走向社会。综合运用党建、宣传、网络、自媒体等各种手段,加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交友,学习教育、人才培养、典型宣传、评选表彰,凝聚工作合力。三要确立群众性思维。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尊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主体地位,尊重他们的创新创造,通过社会化手段和政策扶持、资

金扶助、评比表彰等方式,激发他们投身全面深化改革、致力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在创造美好生活的征程中凝聚起新的社会阶层作为改革开放事业的推动者、参与者、践行者和受益者的精神动力。

(二)把握规律性,构建与社会化方式相适应的引导体系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思想活跃、观念多元,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引导必须把握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个性特点、成长规律和群体特征,多运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易于接受的方式方法,循循善诱,积极引导。一要注重教育方式的灵活性,把思想政治引导融入主题活动。多从有利于促进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事业发展、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以商会、协会、社团为依托,积极倡导开展“建功立业新时代”“同心共筑中国梦”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把思想引导与实现个人梦想有机结合起来,让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在参与主题活动、推进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二要注重教育内容的多样性,把思想政治引导融入培训培养。改变“关起门来搞培训”的传统做法,拓宽思路,引入社会力量,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教育培训。比如,结合培训通过参观红色教育基地、观看有品位有内涵有意义的主题电影、举办主题摄影比赛、文艺演出、开展户外拓展训练、体育健身活动等形式,以情景式教育、体验式教育、感召式教育,把宣传党的理论政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助力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融入其中,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增强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归属感,弘扬社会正能量。三要注重教育风格的趣味性,把思想政治引导融入社会实践。主动研究他们的兴趣爱好、个性特点,设计不同的活动,把职业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植入社会实践,与精准扶贫、公益慈善、环境保护等内容结合起来,融知识性、公益性、趣味性于一体,通过社会实践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履行社会责任。

(三)体现民间性,构建与社会化方式相适应的组织体系

社会化方式关键要以社会组织为依托,依靠社会组织的吸纳功能把他们组织起来。因此,建立健全覆盖完备、功能完善的组织体系至关重要。一要重视群团组织功能建设。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科协、工商联和欧美同学会等群众团体和统战社团的优势,加强与各行业领域商会、协会、社团的联系,延伸工作触角,增强组织活力,广泛吸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参与,扩大组织覆盖面。二要重视新兴社会组织培育。以社团组织改革为契机,大力培育符合市场化要求和深受新的社会阶层人士青睐的行业性、专业性、公益性、联谊性社会组织,比如专业协会、同类公会、基金会、爱心联盟等等。依托这些新兴社会组织,做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吸纳、组织、团结、引导、服务工作。三要重视社会“自组织”的引导。当前,在社会和网络上广泛存在的以职业、兴趣、公益、社交为主体的“自组织”,大量成员来自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他们日常“工作圈”“生活圈”“商务圈”“朋友圈”的主要载体。这些“自组织”面广量大、成员众多、吸附能力强,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给予大力支持和引导。特别是要重点抓好“自组织”核心成员和关键人物的沟通联系、团结服务、教育引导工作,把握“自组织”发展方向。四要重视枢纽型社会组织构建。通过构建具有“母组织”特性的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社会组织代理人,利用服务外包、项目化管理等方式,加强对“子组织”的统筹协调、综合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升组织凝聚力,发挥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四)注重多样性,构建与社会化方式相适应的活动体系

社会组织的活力关键取决于活动载体是否形式多样、活动内容是否丰富多彩,取决于活动凝聚力的程度和影响力的大小。各级统战部门,包括行业主管部门需要把活动组织、策划和实施等一般性事务和公共服务职能^⑤,通过委托授权、项目资

助、购买服务、志愿服务等形式,放手放开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通过社会组织提升活动载体的灵活度、开放度、匹配度和粘合度,以满足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多样化需求。一要搭建联谊交友类活动平台。把握现实与网络两个空间,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主动走访、座谈交流、联谊沙龙等传统手段的基础上,用好活用网络社区、网络社交平台,拓展沟通交流渠道,加强感情联络,诚交友、交诤友。二要搭建政治参与类活动平台。关注利益诉求,扩大政治参与,通过健全情况通报、项目视察、协商交流等机制,推动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知情明政;围绕党和政府中心工作、重点工程、民生项目和社会热点等内容开展专题调研,支持他们反映社情民意,积极参政议政;邀请他们参与部门听证、民主评议、行风监督等活动,开展社会监督。三要搭建创新创业类活动平台。主动挖掘各级党政部门有关政治资源,在政策解读、人才引进、专利申请、表彰激励等方面开展宣传、推广、评选、奖励等活动;着力挖掘社会资源,帮助他们参加国内外专业性、行业性展览展示、技能展示、研讨交流等活动,努力为促进他们事业健康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四要搭建公益兴趣类活动平台。鼓励支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扶危助困、扶残助残、精准扶贫等慈善公益活动和文学、文艺、读书、旅游、益智、健身等兴趣活动,激发他们的参与热情,发挥主观能动性,增强组织凝聚力。

参考文献:

- [1] 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在京召开[EB/OL]. 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2017-02-25.<http://tyzx.people.cn/n1/2017/0225/c372194-29107355.html>.
- [2][4][5] 郭晓东.社会化方式: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优选路径[J].江苏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8(5).
- [3] 中共黄浦区委统战部复旦大学统战理论研究基地.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的三种模式[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8(8).

责任编辑:郭晓东

“知沟”理论视角下做好新媒体代表人士 统战工作的思考

谭翔文

摘要:知沟,也称知识差距,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普遍现象。随着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知沟的新形式“数字鸿沟”应运而生,它所带来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将成为互联网+时代必须应对的难题。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社会进步方面有着独特的作用。本文拟通过应对“知沟”现象对新媒体代表人士的作用发挥进行研究,并对如何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提出对策。

关键词:知沟;新媒体;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D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60-06

2015年5月召开的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要加强和改进对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的工作”,这也是统战工作首次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列为重点团结对象。2017年2月召开的全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会议,提出了“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工作方针,特别是对做好代表人士的工作作出了具体安排。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已深入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从业者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数量可观且发展迅猛的职业群体。因此,做好新媒体代表人士统战工作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重点要从作用发挥、教育引导、工作机制等角度积极探索对新媒体从业人员开展统战工作的途径。

一、“知沟”理论及其在网络时代的新发展

传播学作为一门20世纪以来逐渐兴起的独立学科,主要研究人类一切传播行为和传播过程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传播与人和社会的关系,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信息传播方式研究领域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指导着社会信息传播、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知沟”理论就是其中产生较早、影响最为广泛的理论之一。

20世纪70年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传播学学者蒂奇纳、多诺霍、奥里恩等发表了《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一文,首次提出了“知沟”理论假说,其概念为“通常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能够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传媒传送的信息不断

收稿日期:2019-08-22

作者简介:谭翔文,中共宿迁市委统战部党派处处长。

增多,这两类人群之间的知识差距就会出现扩大而非缩小的趋势。”针对“知沟”现象产生的原因,蒂奇诺等人将其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经济地位的差异、传播技能的参差不齐、知识储备量的不同、信息的选择性接触和大众传媒的特性等。“知沟理论”认为,当上述五个因素中的一个或多个因素起作用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阶层都处在有利的地位,这是造成“知沟”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因此,当大众媒介信息流量持续增加时,传播技能、知识储备、社会交往、态度性选择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知沟”也不断加深。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知沟”理论产生了新的发展,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信息传播手段的升级和更新,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多元、速度加快,“知沟”呈现缩小的趋势;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物质水平的贫富分化,对信息和信息获取手段的占有差距更加明显,信息富裕者和信息匮乏者两极分化的现象更为明显,“知沟”进一步扩大。结合近年来的研究,信息传播实效面临的最主要也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如数字电视、个人PC、智能手机等传播媒介的普及,往往由高收入的富裕阶层开始,无论在普及速度还是普及率上,富裕阶层都远远早于、快于、高于贫困阶层。从网络接触的角度来看,网络传播中“知沟”有扩散的趋势,与传统的传播媒介相比,网络所面临的经济壁垒更高,网络至今对于部分人来说仍然是一种奢侈的消费品,“知沟”差距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的概念应运而生。

有关“数字鸿沟”的定义很多。狭义上讲,数字鸿沟指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间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上的差别。广义上讲,除了互联网外,衡量数字鸿沟的指标还包括许多其他信息传播技术,其中包括电视、传真机、电话、手机等。“数字鸿沟”背景下产生的各种信息落差、知识隔断和贫富分化,是互联网快速发展时代必须要面对的难题。在知识经济时代,“数字鸿沟”的存在可以表现为牵一发动全身,通过信息的不平衡深入影响着国

家、社会、群体发展的方方面面。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使用者和非使用者之间的隔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社会阶层分化的新维度,如何缩小网络传播带来的“数字鸿沟”也成为新时期传播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

有学者研究,网络传播环境下缩小“数字鸿沟”应该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索:一是增加媒介接触机会;二是支持贫困地区的硬件建设;三是选择适合贫困者的传播方式;四是采取教育的倾斜政策;五是激发人们的成就动机,坚定成才意志。从硬件方面,必须面向欠发达地区或低收入者群体制定针对性的扶持政策,例如对一定收入以下的家庭或地区实行价格优惠,以推进硬件在全社会的普及程度。从软件建设方面,加快提高社会成员的“媒介素养”,即使用媒介和应对媒介信息的能力。同时,有观点提出要立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充分激发人们强烈的求知欲望,培养人们的勤奋刻苦、持之以恒的意志和品质。缺少了这些人类的优秀传统和意志品质,仅仅把电脑、电视等新的传媒载体当成娱乐消遣的工具,缩小“知沟”、“信息沟”的目的是难以实现的。

二、运用新媒体手段跨越“数字鸿沟”的实践和探索

关于如何应对“数字鸿沟”带来的两级分化效应,学界普遍认为,应从硬件、软件两个方面进行化解。硬件方面,支持贫困地区的信息设施建设,信息传播尽量选择适合贫困者的传播方式,同时采取教育的倾斜政策;软件方面,不断增加媒介接触机会,提高社会成员的“媒介使用的能力”,还有学者提出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人们的求知欲望和意志品质,让利用新媒体成为一种习惯。为弥补“数字鸿沟”带来的贫富分化、教育不均等问题,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起就先后启动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措施,用于解决“知沟”带来的发展问题,但在面对“数字鸿沟”时,除了加强网络硬件设施建设,仍然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

与此同时,在跨越“数字鸿沟”的过程中,新媒

体从业人员代表人正在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作为直接接触和使用新媒体传播手段的群体,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新媒体平台的经营者,一般可称为新媒体从业人员;一类是新媒体上内容的制造者,也可笼统地称其为网络意见人士。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新媒体从业人员中政治坚定、业绩突出、群众公认的领军人物,是对行业发展和民众都有着重要示范影响作用的优秀人士。由于掌握特殊资源,在跨越“数字鸿沟”的过程中,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做出了大量积极有效的实践和探索,本文选取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领域进行举例研究:

普及“慕课”推进教育均衡化。“慕课”(MOOC),分别是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的英文缩写,也很好地诠释它的概念和意义。作为一种以网络化学习的开放教育为基础的教学方式,“慕课”正在中国掀起一场网络课堂的热潮。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教育不公平的具体表现不再是硬件设施的差距,而主要体现在教育质量的不公平。新媒体通过网络传播,将发达地区的优质教师资源整合起来,通过“慕课”形式输送往欠发达地区,并充分利用网络传播中的互动手段,在课程“精品化”的同时提高“个性化”,努力推动教育均衡化建设。

电子商务促进实体经济腾飞。电子商务是建立在新媒体手段基础上快速发展的商业贸易活动。2017 中国电子商务发展报告显示,全国电子商务交易额高达 29.1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7%,全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5.33 亿,电商就业人员多达 4250 万人,对 GDP 贡献约 0.8 个百分点。我国的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快速增长,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并且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当前随着京东、淘宝等一批知名电商网络向农村基层延伸,推动了更多的实体产品“触电上网”,让曾经一度被网络“遗忘的角落”焕发活力。

网络公益汇聚爱心、扶贫济困。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现实世界对公益的需求与日俱增,除了现实世界的多种公益组织,各种各样的网络公益形

式也随着产生。通过网络,不仅实现了物质互换,更帮助“知识贫瘠”地区的人们获得来自各界的精神食粮。以 2015 年 9 月 9 日腾讯网络发起的“99 公益日”为例,标志着我国首个互联网公益日正式诞生,57 小时 18 分钟内,网友通过腾讯公益捐款破亿元,捐款人次达 137 万。

除此以外,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自发成立的各类网络社区、行业组织等,自觉成为弘扬正能量、唱响主旋律的“网络阵地”,为推动我国弥补“数字鸿沟”带来的信息差异贡献着巨大的正面能量。

三、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特点分析及政治参与价值

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纳入了“新的社会阶层”范畴,并对加强本领域的党外代表人士队伍建设提出具体要求。任何事业,只有通过新生力量的不断加入才能保持旺盛的发展动力,在新媒体不断发展,并逐渐受到人们依赖的时代大潮下,传统媒体正在经历深刻的媒体变局,遇到了新媒体的空前挑战。当前,90 后、00 后的媒体受众更多的选择新兴媒体,新兴媒体从业人员自身素质的高低对媒体受众将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新媒体从业人员可分为出资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采编人员、经营人员等 5 类,他们以党外人士为主,具有高学历、年轻、流动性大、思维活跃等特点。统战部门要顺应时代潮流,努力建立一支优秀的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队伍才能形成各方合力,共同做好新媒体从业人员统战工作。就这一群体而言,他们在社会定位中的“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身份构成看,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具有过硬素质。新媒体作为互联网行业的一部分,诞生时间较晚,由此形成了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年轻化现象。作为新生代群体,新媒体从业人员普遍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经历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是社会上的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从阶层属性看,多数属于党外人士、就职非公企业。由于互联网行业的开放性,新媒体从业人员大多在非公有制领域的新经

济组织就业,其所在的新媒体组织多是市场经济中独立的经营主体,主要通过向手中提供信息产品和服务等获取经济利益。由于就业单位属性的限定,党外人士是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主体。从社会功能看,有效把握议程设置、引导大众舆论。随着新媒体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其从业人员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责任,扮演着“把关人”和议程设置的重要角色,可以有效实现信息过滤、引导舆论等重要功能,特别是其中的部分杰出代表,已经形成一股强大的、具有召唤力的社会化力量。

从以上特点来看,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从业人员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必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按照中央“充分尊重、广泛联系、加强团结、热情帮助、积极引导”的工作方针,积极鼓励和支持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的政治参与,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步与践行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的主题都有重要的政治价值。

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高素质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由于其职业特点,往往处于民意舆情和各类社会信息的集散地,普遍具有较强的政策意识和法律意识,能够自觉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政治参与意愿较强。作为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他们善于利用新媒体的优势,极大范围地影响着社会舆论生态和大众精神生活,协助构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渠道,反映信息、监督行政,有效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容。

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统战工作的工作方针。随着从业人数的不断攀升,新媒体从业人员已经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群体,特别是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媒体与社会的融合度越来越高,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做好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统战工作,发挥行业领军人物的示范效应,有利于传播社会正能量、凝聚发展新共识。

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与传统媒体相比,新媒体依靠信息传播技术,能够更好地发挥反映

舆论、引导舆论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引导行业自律,积极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政治经济建设取得的新成就,正确集中社情民意;一方面通过发挥行业作为信息源第一接触者的优势,仔细甄别、准确阐释,特别在突发事件中有效过滤有害信息,引导大众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四、制约新媒体从业人员作用发挥的因素

新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和从业人员总数的快速增加,为推进信息化社会建设、拉近人与人距离提供了很多的助力和方案,但是与此同时,制约新媒体行业和从业人员健康发展的传统因素也在逐渐放大、新兴问题也不断产生,需要在今后的联系引导工作中加以重视、予以解决。

新媒体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虽然高层次、高学历是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发展方向 and 主流,但是随着新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和进入门槛的降低,许多缺乏专业技能、政治培训的新媒体企业和网络意见人士也鱼龙混杂进入行业领域,经常采取吸引眼球、炒作甚至造假的方式来迅速提高影响力,不利于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从业人员正面形象的确立,导致满足于一时小利,更无法发挥服务社会的职能作用。比如近年来陆续发生的咪蒙公众号、内涵段子网站封停事件和媒体过度娱乐化倾向等,都是不具社会责任的典型。

新媒体行业管理仍疏堵结合、以堵为主。部分领导干部心理准备不足,媒介素养不够,面对新媒体不知是敌是友、不知是爱是恨,应对新媒体又持有排斥、畏惧、轻视和怀旧不当心态。站在新媒体行业主管部门的角度而言,部分地区仍然存在视民办新媒体企业为“洪水猛兽”的传统认知,在针对新媒体行业管理方面仍然坚持管控为主、引导不足。比如在各地的新媒体从业人员的座谈会上,往往强调维护稳定的多、强调服务发展的少,管理思路和服务理念仍需转变。

社会大众媒介使用能力有待增强。一方面,由于从业人员素质的差异,新媒体生产的内容一定程度上存在脱离群众、靠近低级趣味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缺乏对于社会大众媒介

素养的教育重视,社会大众对于新媒体的使用能力和对信息真伪的辨别能力十分有限,特别是在缺少官方权威媒体发声的情况下,容易产生严重的负面传播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普及大众传媒素养,既顺应了学习型社会的总要求,也是引导新媒体行业向正确方向发展的一个实际行动。

五、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的统战对策研究

作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鼓励和支持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政治参与,是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的新着力点,这就要求各级统战部门必须在坚持新的社会阶层统战工作的基本方针和要求的基础上,结合新媒体从业人员的群体特征与行业特点,牢牢把握媒体信息的主动权,不断促进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的作用发挥,具体要把握好三个维度。

一是从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维度出发,加强规范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要从全局出发,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做好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新媒体从业人员作为参与社会主义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这个维度出发,重点要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坚持以正确意识形态把握网络阵地建设主动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新媒体时代网络舆论格局发生剧烈变化,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博弈和碰撞中滋生大量问题。面对国内外各种思潮的涌动,必须主动应对,拓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网络效应,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牢牢掌握互联网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充分利用网络新媒体技术,占领主阵地,弘扬主旋律,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导舆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人心,打赢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动仗,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创新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的管理理念。网络传播最大的特点就是其是一种散布型网状传播结构,在这种传播结构中,任何一个网络都能够生

产、发布信息,所有网络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之中。随着网络时代传播主体多样化,不仅传播者有社会责任,用户、社会企业以及政府都有责任,政府的监管也要与时俱进,传统意义上传播学对于传播的社会责任就是新闻要客观公正,但随着技术进步,社会责任开始呈现为全媒体、全业态的状态,责任的内涵和维度在不断加大。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如何引导新媒体从业人员体现自己的专业性和理性,关键在于加强理论建设、促进理论创新,更好地回应和解决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强化媒介素养教育,提升基层群众对网络信息的甄别力。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培养公众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批评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应用的能力的过程,其最终目的是造就出具有较强批判能力、能独立思考媒介信息的优质公民。在新媒体语境下,在大众媒介持续不懈的宣传攻势下,部分人群会逐渐丧失辨别力,而不再加思索地顺应现状。为了迎合大众的口味,媒介不得不降低艺术品味,久而久之,人们的审美力也日趋退化。强化媒介素养教育,目标就是促进公民个人在心智上能够穿透媒体所构建的迷障,不易被媒体左右,同时能够主动地运用新媒体进行社会参与、表达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形成一种良性互动的宣传氛围。

二是从统战工作大团结大联合维度出发,引导发挥作用。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既有参政能力又有职业追求,既参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又肩负着引导公众舆论和公众参与政治的社会责任,要通过多方合作、搭建平台、畅通渠道,不断发挥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作用。

引领行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代表人士的引领示范作用,确立新媒体行业行为规范,引导行业自律,充分利用其及时、互动、影响广泛的特点,掌握信息主动权,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通过搭建政府网络问政平台,充分利用新媒体准确把握舆情、了解民意,真正推动党委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注重发挥新媒体独特的社会监督作用,协

助政府科学执政、依法执政,不断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拓展参政议政渠道。探索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的制度安排路径,拓展他们的参政议政空间。一方面要加大政治安排力度,在各级人大、政协、工商联、妇联、共青团等组织注重吸收新媒体党外人士的积极参与;一方面拓宽他们政治参与的主渠道,重视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的组织发展,支持各民主党派吸收其中有意愿的代表人士,参与到民主决策和管理的事务中来。支持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建立或参与各类合法的行业协会或社团组织,畅通利益诉求渠道。

积极开展舆论引导。支持新媒体从业人员充分发挥新媒体作为社会安定的舆论“推进器”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减压阀”作用,努力打造公共治理的网络平台。积极引导新媒体从业人员主动设置议题,调动网民互动,使新媒体成为社会不同阶层理性探讨问题和表达社情民意的有序场所,及时把握舆论传播的内容和趋势,进而有效引导社会舆论、推动协调发展。重视发挥新媒体从业人员与广大网民联系广泛的优势,搭建沟通党委政府与公众民意的桥梁,有效调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广泛收集意见建议,消除矛盾隐患,为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和网络环境净化作出贡献。

三是从新媒体代表人士自身建设维度出发,提升整体水平。新媒体行业既有经济属性又兼具文化属性、政治属性,涉及面广、牵涉部门多,但受制于新媒体从业人员的自由性、分散性等特点,长期以来游离于政府的有关监管之外,因此,对新媒体及其从业人员开展管理培养工作,不仅是统战部门的工作,也是相关责任部门的职责所在。

构建线上线下的有效沟通机制。作为统战部门,要以全面加强网络统战工作为抓手,加强新媒体技术的研究学习,主动应用新媒体技术,加强与主流新媒体机构、运营商和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之间合作交流,不断整合提升网络统战力量;增加和改进统战部门网站的交互功能和服务功能,重视运用权威信息发布来引导舆论,掌握信息主导权。与此同时,统战部门可以通过网络为新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各种便捷的服务,通过在线渠道及时了解新媒体从业人员的意见诉求。

从观念和举措上强化同盟者利益。与新媒体从业人员代表人士打交道,必须重视新媒体技术,了解新媒体发展,提高驾驭新媒体的能力和水平。领导干部要顺势而为,深刻了解和把握新媒体的发展规律和前沿动态,善于与新媒体党外代表人士打交道、做朋友。推动有关部门制定和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促进新媒体和谐健康发展,提高行业自身的硬实力和软实力,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全面提升政治素质和专业能力。对于新媒体从业人员而言,政治意识始终是第一位的。规范职业操守,提高政治把握能力,是强化其综合素质的第一步。要加强与新媒体的日常沟通协作,把新媒体从业人员和网络意见人士引导至与党同心的方向上来,切实发挥网络舆论的正能量。通过建立新媒体从业人员的专门组织,建立日常工作机制,规范网络媒体资本的合理趋利行为,探索建立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审查制度,增强党委政府对不同类型网络媒体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控制权和管理权。

责任编辑:郭晓东

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

蒋连华

摘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主要体现在:建立在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和承认差异的政治制度实践上的历史文化基础,建立在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基础上的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现状和民族工作中“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的现实发展要求以及“八个坚持”的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路径原则。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认识和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富内涵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66-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鲜明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写入党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把 56 个民族“和谐”的民族关系特征写入宪法,这是从根本大法的高度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确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重要论述的核心思想,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遵循。当前,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以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一、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文化基础

(一)多元一体的历史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多民族是我国的一大特色。纵观我国 5000 多年文明发展史,曾经有许多民族登上过历史舞台。这些民族经过孕育、分化、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 56 个民族。在长期历史演进中,各民族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广袤疆域,共同创造了悠久的历史、灿烂的中华文化。造就了我国各民族在分布上的交错杂居、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今天,生活在

收稿日期:2019-09-09

作者简介:蒋连华,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教研部主任、教授,城市民族和宗教研究中心主任。

祖国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汉族人口最多,其他55个民族因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习惯称为“少数民族”。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

(二)承认差异的政治制度实践。自秦汉以来统一是中国历史的主流,而这恰恰是与建立在相互依存基础上的承认差异的政治制度实践分不开。传统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占主导地位的同时,册封和府州(土司)“羁縻”制的并存是中国传统政治制度的主要特征。孙中山领导建立中华民国,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我们的共和是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建立在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法理基础上的政治制度,不论是人大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特别行政区制度,还是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都是承认差异的政治制度实践。

二、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发展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对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现状。任何一个共同体建立和发展的前提,都是建立在相互依存、资源互换、利益共享的基础之上。就资源存在的形态看,可分为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从我国资源分布的情况看,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上,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占64%;全国14亿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1.2亿;边疆9省区居住着全国近60%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国土面积64%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是我国矿产资源富集区;占有全国66%的水力资源蕴藏量,是我国乃至亚洲主要江河的水系源头区;占有全国近47%的森林蓄积量和74%的草原面积,是我国的生态屏障区。可见,在三种资源形态中,自然资源是民族地区的优势,但是,要把自然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还需要

社会资源来发挥作用,需要理念、模式、技术、规则、管理、效率等多方面资源因素来共同作用和推动,而这些恰恰是民族地区的短板。

(二)民族工作中“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不断推进,各民族共同因素不断增多的同时,民族差异也将长期存在。进入新时代,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我国民族工作存在“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民族地区经济加快发展势头和发展低水平并存,国家对民族地区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和民族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仍然薄弱并存,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趋势增强和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纠纷上升并存,反对民族分裂、宗教极端、暴力恐怖斗争成效显著和局部地区暴力恐怖活动活跃多发并存。

以上资源分布不均的发展现状说明我国发展是一个需要把握好东西南北中的政策对接和发展协同的进程;民族工作“五个并存”的阶段性特征,说明新时代的民族工作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推进民族工作需要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和关联性的思维。就民族地区发展路径而言,是走传统的对资源依赖、投资依赖、国家政策依赖的路径,还是走资源开发与环境维护良性循环、人的发展与物的发展并重、市场活力机制与国家调控机制结合的路径。对这一问题的决策是一个需要考虑宏观发展与微观发展、全局战略与局部战略、眼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具有整体性、协同性和关联性思维的政策设计,是无法实现国家政策同区域性政策的对接、社会政策同民族政策的对接、发展政策同稳定政策的对接,民族地区的发展和民族关系的和谐的。因而,体现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的治理理念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三、认识和把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原则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落到具体实践中,就是落到民族工作中。要正确看待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道路问题很重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了这条道路的科学内涵,在 2014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首次明确提出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就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维护祖国统一,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坚持依法治国,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八个坚持”的阐述,是对新时代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要求,也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路径的原则要求。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根本保证。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做好民族工作的根本保证。加强党对民族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政治保障。必须坚定不移把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贯穿到民族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确保“两个维护”和政令畅通。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取得的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因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民族工作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增强政治定力。

(三)坚持维护祖国统一,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根本任务。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元民族国家。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已经确立,并将继续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因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是国家最高利益所在,也是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民族工作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维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一切民族分裂活动。

(四)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之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则之一。各民族一律平等是新中国立国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禁止对任何民族的歧视和压迫,禁止破坏民族团结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在维护民族团结的斗争中,要反对大民族主义,主要是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五)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内容和制度保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源头”,是根基,守住这个根基就是守住了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要做到“两个结合”:一是坚持统一和自治相结合。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是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要在确保国家法律和政令实施的基础上,依法保障自治地方行使自治权,给予自治地方特殊支持,解决好自治地方特殊问题。二是坚持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相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既包含了民族因素又包含了区域因素。民族区域自治不是某个民族独享的自治,民族自治地方更不是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这一点必须搞清楚,我国所有民族自治地方都是党领导下的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拥有的地方。

(六)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民族工作的主题,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就是要加强民族团结,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巩固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七)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也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的精神力量。既重视物质力量又重视精神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民族工作要依靠两种力量,一种是物质力量,一种是精神力量。在2019年1月21日召开的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为主题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是把意识形态安全放在了政治安全中重点论述的。可以说,增强各族干部群众辨别大是大非的能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事关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政治安全。坚持打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就是要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全国各族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八)坚持依法治国,是推进民族工作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治化的重要保障。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推进民族工作法治化,首先,是“用法律来保障民族团结”,坚决维护宪法权威和法律尊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其次,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民族问题的能力。以党员干部为重点,把有关民族工作的法制教育列入培训内容,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学会运用法律化解涉及民族因素的有关矛盾纠纷。第三,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坚持在法律范围内、法治轨道上处理有关涉及民族因素的矛盾和问题。要增强各族群众法律意识、懂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不能把涉及少数民族群众的民事和刑事问题归结为民族问题,也不能把发生在民族地区的一般矛盾纠纷简单归结为民族问题,必须以法律为准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处置。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8.
- [2]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 [3]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央统战工作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解答[M].北京:华文出版社,2016.
- [4] 画出最大的同心圆——习近平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讲座[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5.
-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
- [6]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徐晓婷

宗教界人士担任人大代表是否违背政教分离原则

沈春阳 官玉涵

摘要:政教分离主要指政权与宗教组织的相对分离,中国的政教分离主要指宗教不得干预行政、教育、司法等国家职能;国家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宗教界人士以公民身份担任人大代表,参政议政,代表的是人民和选民利益,并非宗教组织的特殊利益,并不违背政教分离原则。但是,实践中确实存在人大代表以宗教身份在人大履职的错位情况,需要纠正。

关键词:宗教界人士;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政教分离

中图分类号:D6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70-04

近年来,宗教界人士活跃在各个政治场合,特别是在一年一度的全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中可以看到宗教界人士的身影,他们有的身穿特定的宗教服饰,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选举各级政权机关领导人,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和司法机关工作报告等。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疑问:宗教界人士作为人大代表参政议政是否有违政教分离原则?

一、政教分离的内涵

要解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清楚什么是政教分离。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源自西方,针对世俗政权与基督教会的关系,政教分离也就是国家权力与教会权力分立。国家权力主要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政教分离,主要是宗教教义教规和组织制度不与国法冲突,宗教组

织不得干预立法、行政和司法,国家不干预宗教团体内部事务。在中世纪的西欧,以罗马教廷为中枢的天主教会和世俗政权之间,彼此为争夺教权和王权,进行了血与火的斗争。

(一)从王权主导教权到教权主导政权。自从公元 380 年,罗马帝国确立基督宗教为罗马国教以后,基督教罗马教会的权力不断延伸,教会组织负责人通过担任政治职务,占有、经营封建地产、控制文化教育等,实现基督宗教对世俗政治的影响。但罗马帝国时代王权控制主教会议、任命主教,王权主导教权。公元 476 年蛮族攻破罗马帝国后,基督宗教承担世俗权力的模式又扩张至整个欧洲。5-15 世纪,世俗君王与罗马教廷争夺权力的斗争,以教权主导王权为主要表现。1073 年,格里高利七

收稿日期:2019-08-20

作者简介:沈春阳(1991-),男,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 2017 级民族政治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民族政治、民族宗教研究。官玉涵(1995-),女,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2018 级统一战线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统战理论、民族宗教研究。

世当选为罗马教皇,1075年罗马教廷发布《教皇赦令》,宣称教权至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德意志国王与教皇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双方签订了《沃尔姆斯宗教协定》,皇帝交出了象征宗教权力的权戒和权杖^[1]。宗教教权逐渐干预、主导直至高于王权之上,到教皇诺森三世时,教廷教权达到鼎盛,教皇干涉世俗政权,多次废立皇帝,组织十字军东征^[2],王权甚至成为教权的附属。

(二)从政权主导教权到政教分离。从十四世纪开始,法国、英国等国家开始向罗马教皇发起挑战,世俗君王不断加强王权,阻挠教皇的干预。1517年后先后出现马丁·路德、加尔文等人在欧洲各地进行的宗教改革,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权。伴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欧洲的世俗主义思潮日益壮大,最终以法国大革命为标志,欧洲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各民族国家逐渐摆脱罗马教会控制,各国政府逐渐摆脱罗马教廷和本国天主教会对本国政治生活的干预,实现了政教分离。

由这段历史可以发现,政教分离主要指世俗政权,也就是国家政权摆脱宗教组织和教职人员的控制、干预和影响。所以政教分离实际上是国家和教会的分离。既包括教会不要干涉国家政权,也包括国家政权不干涉教会,即国家组织和宗教组织分管不同的领域。也就是说,政教分离并不是指宗教和政治的绝对分离,宗教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对公共道德、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会产生影响,这是无法分离的。同时,宗教组织作为社会团体,必须服从国家关于社会团体的相关法律规制,无论是其教义教规、组织制度,还是宗教活动均不得影响公共秩序,这也是今天世界各国的普遍共识。可见,政教分离是相对分离,具体来说,它的内涵应该包括:一是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国家不得设立国教,各宗教平等;二是禁止国家机关及公立机构参与或开展宗教活动,国家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三是宗教不干涉国家政治,不干预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教育和公民的婚姻等,宗教团体或成员不得以其宗教身份获得政治上的特权^[3]。

二、中国的政教分离

中国具有政教分离的历史传统。由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等都与欧洲不同,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与西方完全不同。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宗法性伦理社会,在宗法传统下产生的中国古代宗教,学者称作“宗法性传统宗教”^[4]。中国自秦汉以来就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权力高度集中在帝王手中。国家结构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基础上的,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宗法伦理社会,帝王的合法性来自“天神”,历代皇帝通过“敬天法祖”,完成君权神授。汉武帝确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王朝官方意识形态。儒生们利用儒家的“三纲五常”思想进行社会教化,承担维护王权、建构社会道德秩序的责任,同时承担公共教育事业的职责。

由于“宗法性伦理宗教”的基本活动是“敬天法祖”,因此,古代中国社会没有产生独立的教团,在国家政权系统外,民间宗族组织系统承担部分类似基督宗教教化社会的职能。在中国历史上,祭司队伍也没有形成独立阶层和权力集团。教职人员是皇帝的子民,必须服从君主的统治,教权绝对服从于王权。

当代中国是政教分离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生活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指导,虽然我国历届宪法没有明确书写“政教分离”原则,但是从宪法文本或精神可以引申出政教分离的宪政精神。我国《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必须坚持政教分离,坚持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实施”^[5]。从相关法律法规、领导人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政教分离大体包括以下内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得信仰宗教;国家对待各宗教一律平等,一视同仁,不以行政力

量发展或禁止某个宗教,任何宗教都不能超越其他宗教在法律上享有特殊地位;国家依法对涉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但不干涉宗教内部事务。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的实施。因此,即使宪法文本上,没有直接规定政教分离原则,但坚持政教分离在中国已经是约定俗成的共识。

但中国的政教分离,与西方的政教分离有所不同,中国的政教分离,除了强调宗教不得干预行政、司法、教育等国家职能外,还强调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积极作用。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信教和不信教以及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在信仰上的差异是次要的,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信教群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重要力量,要切实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018年发布的《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白皮书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的原则处理同宗教界的关系,同宗教界的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巩固。目前,中国约有2万名宗教界人士担任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委员,积极参政议政,实施民主监督。”^[6]

我们知道,人民政协是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不是立法机关,也不是权力机关。宗教界人士通过担任各级政协委员,以宗教界别形式,在政协参政议政,反映广大信教群众的利益诉求,不违背政教分离原则。但是,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立法机关,也是权力机关,宗教界人士担任人大代表,是否有违政教分离原则?

三、人大代表到底代表谁

我国各级人大代表都由选举产生,其中县、乡一级的人大代表由直接选举产生,县级以上的人大代表是间接选举产生的,主要按照行政区域进行选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解放军的军人代表大会选出。

宪法学界关于人大代表与选民关系的讨论,

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一是“强制委托制”论^[7],主张人大代表是特定选民或选区的利益和意志的代表,要在选民的监督下行使权力。二是“非强制委托制”论^[8],主张人大代表可以在考虑选民或选区利益的基础上,不受选民强制委托的约束,独立行使代表权。三是“集中代表制”论^[9],认为人大代表不是代表特定的选民或者选区,而是全体人民的委托人^[10]。四是“双重代表制”论^[11],主张人大代表既要代表全国人民的整体利益,又要听取和反映选区选民的意见。

笔者认为,双重代表制更符合中国人大代表的性质。第一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把选民对人大代表的政治委托视为私法上的委托行为,是不恰当的^[12]。如果人大代表仅代表选区选民利益,很容易导致利益碎片化,在实际运行中,代表事事拘泥于选区民意,人民代表大会最终变成相互争执、永无结果的战场,行动困难。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大代表可以不受选民的强制约束,但实际上如果没有选民对代表的约束和监督,就难以保证代表真的会为选民的利益服务,就难以保证国家权力属于人民。所以人大代表必须要在人民的严格监督之下完成自己的工作。第三种观点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我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社会分工、经济水平和地域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群体之间的具体利益是有区别的,若是仅仅强调代表全国人民利益,忽视选区人民的局部利益,这样既不利于民主,也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因此,人大代表在性质上的双重代表制,既可以体现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一元化,又可以反映具体利益的多元化。人大代表只有真正了解选区选民的利益,才能抽象出全体人民的整体利益,而反映全国人民整体利益,最终也会保障各地区人民的具体利益,这两者是辩证统一的。所以,人大代表应该是双重代表制更符合现实。

四、宗教界人士担任人大代表是否违背政教分离原则

参加各级人大的宗教界人士,大多是某一宗教内担任重要教职的人员,也是宗教组织的主要

负责人。这些人首先是中国公民,作为中国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也需要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公民享有管理国家、参政议政的权利。

我国宪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是说,宗教人士只要满足上述条件都拥有被选举权,都可以依法参加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成为人大代表。公民不分“宗教信仰”选举人大代表的规定,其内涵既包括不能因为宗教身份剥夺参选人大代表的资格,同时也包括人大代表不能以宗教身份参政议政。选举法告诉我们,宗教界人士当选人大代表,主要是他们的公民身份而不是宗教身份,他们代表的是全体人民利益以及所在选区选民的具体利益,这些利益包括宗教界和信教群众的特殊权益。正是由于代表选区选民,所以,参加各级人大会议的宗教界人士,分散在各个省、地市、县的人大代表团中,参加以省、地市、县为小组的参政议政活动,而不是以某个宗教组织的代表,以宗教界别形式组团参加各级人大活动,所以他们的参政议政并不是代表宗教组织介入政权活动,因此,与政教分离原则不冲突。例如,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圣辉是湖南团的代表,他代表中国人民以及湖南选区选民的利益,参与全国人大各类大会活动和湖南代表团的小组活动,反映包括信教公民在内的选民权益。这种参与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的政治活动,不仅不违反政教分离,而且有利于推动民主政治发展。政教分离与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关心、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并不矛盾,公民虽然在信仰上有差异,但在政治经济上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宗教界人士作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广泛的人民民主的体现。

因此,无论国家、社会和宗教界,对来自宗教界的各级人大代表的性质和使命,都应准确把握,切不可模糊化。宗教界人士作为人大代表,也需要妥善把握好公民与教职人员、选民与宗教组织的

关系。实践层面,有些宣传报道,突出宗教界人大代表的宗教身份,突出他们作为宗教界代表人士,在宗教组织中担任的主要教职。也有一些来自宗教界的人大代表认为,他们当选人大代表,主要是因为他们是宗教组织的负责人,在信众和社会上有一定的威望和影响,他们在各级人大中,应该反映宗教界的利益诉求,维护宗教界权益。因此,有些宗教界人大代表,在各级人大提交的议案多数内容与宗教相关,反映其他社情民意的议案相对较少。实践中的这些倾向,有必要及时加以纠正,以便各级人大代表,无论来自什么地方,从事什么职业,信仰何种宗教,都能准确把握人民代表的职责,履行好公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利。

参考文献:

- [1] 赵林.简论中世纪西欧封建社会的教俗之争[J].求是学刊,2017(4).
- [2] 梁晨晨.中世纪西欧政教矛盾及对社会关系的影响[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17(18).
- [3] 石亚洲,沈桂萍.论中国的政教分离与宗教界人士参政议政[J].思想战线,2008(3).
- [4] 张践.创建中国特色政教关系理论体系[J].中国宗教,2013(5).
- [5] 习近平.习近平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N].人民日报,2016-4-24(1).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和实践[N].人民日报,2018-4-4(9).
- [7]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82.
- [8]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90-191.
- [9] 邹平学.中国代表制度改革的实证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146.
- [10] 蔡定剑.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58.
- [11] 郝勇伟.人大代表的代表性分析——代表选区利益与代表辖区利益的困惑与解决路径[J].人大研究,2009(11).
- [12] 周志武.选民代表·自主代表·全民代表——代议过程中人大代表的身份转换[J].湖北社会科学,2006(10).

责任编辑:徐晓婷

关于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发展的思考

张健红

摘要:社会主义学院在党外代表人士教育培训工作中发挥着主渠道、主阵地的重要作用。然而,作为社会主义学院三级体系的基座,地市级社院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师资缺乏、科研咨询停滞、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加强新时代地市级社院建设,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一是提高责任意识,理顺管理机制;二是牢记“社院姓社”,深化共识教育;三是打造精品课程,完善现场教学;四是加强智库建设,提升科研水平;五是运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学习平台。

关键词: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瓶颈;路径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74-03

2018年年底,中共中央颁布了《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近年来,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党外干部人才。同时,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在自身建设上也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瓶颈,需要我们进一步认清发展现状,强根固本,提升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和发展水平。

一、我国社会主义学院体系发展现状

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对统一战线工作、社会主义学院建设提出了新标准、新要求、新思路。近年来,党外知识分子、非公经济、新阶层人士队伍不断扩大,国际宗教、民族问题日趋复杂,种种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要求各级社会主义学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统一战线旗帜下,牢记“社院姓社”的方针原则,努力把

社院建设成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合党校、统一战线人才教育培养主阵地。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学院体系主要覆盖中央、省、地级市三级,已建成各级社会主义学院近两百所。在国家、地方层面,中央社院、省级社院经过多年发展,正规化建设已取得长足进步,在硬件投入、师资培养、课程设置、智库建设、科研创新等方面均取得不俗成绩,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提供了智力支持,为民主党派建设学习型参政党输送了骨干力量。

二、当前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瓶颈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关注作为社会主义学院三级体系的基座,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大多由于经费保障、人员编制、师资匮乏、认识不足等问题,面临不小的发展瓶颈。

收稿日期:2018-12-29

作者简介:张健红,农工党苏州市委副主委兼秘书长、苏州市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

(一)三种发展模式并行,建设缺乏通盘考虑

目前中央、各省级社会主义学院大都为独立办学形式,拥有独立场所、师资。而地级市情况较为复杂,常见有三种建设模式,即独立办学、三院合一、依托统战部。

1.独立办学模式,即省会城市独立设置的社会主义学院,为一级财政事业单位,拥有相应职能处室。这一模式能够与上级社院较好对接,更好地开展各项工作,但对经费、人力、后勤资源占用较多,难以在各地级市中普遍推广;同时由于独立办学,对党校、行政学院、统战系统资源整合度较差,容易陷入“各搭台子各唱戏”的局面。

2.“三院合一”模式,即地方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合并,实现资源共享。这一发展模式能够最大程度利用已有场地、师资、后勤行政等资源,能够确保统一战线成员第一时间接受党和政府新精神、新文件的解读。但党外人士教育培训有其特殊性,中共中央《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将中央党校和国家行政学院合并,保留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就是清楚认识到党性教育、行政培训与党外人士政治共识教育之间的差别。地市级“三院合一”模式下,党委、行政教育系统的强势性容易导致统战学科建设边缘化,从而忽视对党外人士的针对性教育。

3.依托统战部,与地方统战部合署办公,也是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一种常见发展模式。该模式下,能够保证社会主义学院服务对象与统一战线成员的高效对接,有利于开展针对性教育,有利于优秀党外代表人士队伍的培养。但该模式下,社会主义学院力量相对薄弱,原有专职人员易被抽调,难以全身心投入社院建设工作,导致社院发展陷入停滞、流于形式。

(二)经费师资缺乏保障,科研咨政陷入停滞

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由于经费、编制问题,难以长期承担一支理论水平高、人数充足的师资队伍。同时,客观上来说,大多数地方高校缺乏统一战线学科专门人才,教师水平难以保证,授课内容缺乏吸引力,影响培训效果,让各地统战部门、社

会主义学院陷入“专兼皆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专业人才、师资队伍之匮乏,更进一步导致智库建设、科研咨政工作开展困难,无法快速实现理论成果转化及应用,难以保证国家最新方针政策对统一战线成员的普及教育,削弱了社会主义学院作为学术机构应有的地位和水平。

(三)课程设置依赖上级,培训自主环节缺失

由于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在师资、场地等方面的限制,授课培训不得不主要委托省级、中央社院进行,课程安排在自主性、地方性特色内容上不足。致使学员代入感不强;部分现场教学缺乏鲜明的目的性、引导性。这些问题导致了政治共识教育难以入脑入心,没有实现巩固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一使命。

(四)管理制度尚未完善,出席情况难以保证

党外人士,尤其是代表性人士,因其身份不同于一般党员、干部,因此客观上造成了统战部门、社会主义学院在沟通时,更多采用协商的方式,对培训对象的出席、考勤、考核缺乏刚性的制度要求,往往花大力气组织的培训教学却参加者寥寥,或是中途脱班、请假情况严重,难以实现教学目标。同时,由于部分用人单位对党外人士培养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社院组织的脱产集中培训常常不重视不放心,引起培训对象的工学矛盾等。

三、新时代加强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建设的具体路径

(一)提高责任意识,理顺管理机制

目前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常见的三种办学模式各有利弊,都需要针对相关薄弱环节加大投入、提高重视水平。从长期规划和顶层设计来看,独立办学、整合各方资源是社会主义学院的发展方向,因此对有条件的地级市应该予以鼓励帮助。对“三校合一”的地市级社院,应当进一步明确办学责任,设置专业处室,加强课程开发、科研建设和专业师资培养,体现统战特色,重视政治共识教育。对地级市统战部与社会主义学院合署办公的,要保证专人专岗,经费单列,强调“两个主导”,即党外干部培训班次安排和干部调训以市委统战部为

主导,教学组织和学员管理以社会主义学院为主导,实现合理分工密切协作。以上三种模式下,都要将党外干部教育培训纳入全市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加强通盘考虑,严格出勤考核,提高用人单位思想认识,妥善解决工学矛盾。在此基础上,完善地市级社院的院务咨询委员会平台机制,整合统战智库资源、教学资源等,实现“联合党校联合办”;重视基层党外人士培训教育,确保“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逐步完成对统战工作对象的培训教育全覆盖。

(二)牢记“社院姓社”,深化共识教育

社会主义学院的中心任务是政治培训,即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培训。党外代表人士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群体,他们观念活跃,视野开阔,善于独立思考,具有批评精神。从调查情况看,党外代表人士大多注重专业领域的研究,对政治理论的学习比较淡薄,难以分辨一些似是而非的重大敏感问题。因此,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教育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艺术性都很强的工作。习近平明确指出,统战工作是党的特殊的群众工作,要有特殊的方式方法。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要秉持求同存异、民主协商、联谊交友、教育引导等基本工作方法,在课程学习中多一些案例分析、少一些自说自话,多一些开放讨论、少一些照本宣科,真正将共识教育入脑入心。

(三)打造精品课程,完善现场教学

社会主义学院作为专业政治学院,教育培训是第一位的中心工作,教学水平、教学质量、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应该成为检验基层社院工作的最重要指标。基于当前地市级社院实际经费、师资、人员等情况,建议课程建设在总体依靠上级社院的基础上,结合本地实情,有针对性开设地方性精品课程,选聘学识高、能力强、业务精的党政领导、专家学者、统一战线代表人士,签订协议聘为兼职教师,鼓励他们开展统战理论研究,“领导干部讲思路,专家学者讲理论,实际工作者讲经验”。

在现场教学方面,要整合本地统战名人故居、史迹点、活动旧址等历史资源,开发特色学习参观路线,综合运用声光电等现代技术手段,加强沉浸式、体验式教学,帮助学员提升培训实效。

(四)加强智库建设,提升科研水平

统一战线具有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知识背景完整的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学院加强科研工作,目的就是打造统一战线智库队伍,锻炼高水平的兼职师资、科研力量,更好地实现“科研促教”和“科研咨政”两大功能。地市级社会主义学院科研建设要坚持突出统战特色,集中优势资源和力量,广泛吸纳民主党派、无党派知识分子、工商联等科研力量,围绕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深入研究,就党外人士关心的社会重大发展问题进行调查讨论,实现理论与实践对接、研究与咨政结合,注重成果的地域性、适用性、可操作性,鼓励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正体现统一战线、社会主义学院的智库和咨政作用。

(五)运用互联网技术,打造学习平台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大规模远程教学、自主在线学习成为可能。当前在全球风靡的“慕课”教学,能够实现课内课外的教与学互动,在师生之间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通过设计微视频、小测验、实时解答、论坛交流等环节,提高学习者参与度,满足学员自主的学习需要,将最新理论知识以简明生动的方式呈现给学员,充分运用碎片化时间,将持续学习嵌入日常生活中。此外,随着智能手机的进化普及,通过手机 APP 在线学习也成为成人教育培训的潮流。当前不少地区人社部门已推出自有学习平台、软件,建议当地社会主义学院与有关部门加强沟通,在已有平台上添加统战学习模块,进行在线推送、测验,以解决培训的普遍性、广泛性、时效性问题。

责任编辑:蒋建忠

博物馆教育的建构转向与交互性展示研究

熊 鹃

摘 要:自现代博物馆诞生以来,物的收藏一直是其功能展开的基础。向公众开放后,博物馆教育越来越成为核心功能。在现代消费社会和后现代意义阐释的双重影响下,博物馆教育的重心从文物的研究和展示转向观众——学习者对于文物意义的建构。随着建构主义语境下博物馆教学模式的提出,博物馆交互性展陈表现在两个方面的实践:一是互联网技术与数字技术的应用;二是沉浸式互动环境的具身构建。传统博物馆学对于真实和意义的讨论在后现代建构主义的语境中被取消。

关键词:博物馆教育;建构主义;交互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G2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9)05-00077-04

博物馆作为收藏、保存、研究和展陈文物的文化机构,其核心职能经历了漫长的变革。本文以博物馆知识“从物到人”的演变出发,通过阐述博物馆教育理念的产生和转向以及展品信息在文物与观众关系中的不同叙述形式,探讨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博物馆交互性展示中现代技术和具身构建的因素博物馆物的塑造。

一、博物馆教育思想的演变

博物馆最早发源于人们对于物的收藏意识。从诞生之日起,物的收藏一直是博物馆的核心要素,也是博物馆功能发生的根据。十六世纪末,博物馆式的收藏与陈列在欧洲已经相当普遍。中世纪西欧国家通过殖民扩张和商品贸易,使得大量物质财富在手中快速积聚。皇室贵族筹设形式多样的“珍宝柜”,将全世界的奇珍异宝置于其中。这

种私人化物品的收藏形式,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博物馆展陈的早期形态。“珍宝柜”作为现代博物馆的原型,强调对物本身的保存和研究,它重视收藏物的真实性和展示意义的阐释。

到十八世纪后期,尤其是法国大革命之后,皇室、贵族阶层珍藏的艺术品和文物被征收。英法等国兴起大量公共博物馆并向全民开放,公众陆续走进博物馆,藏品不再只为王权和私权服务。社会公众的概念开始出现在博物馆的研究领域内。十九世纪博物馆迎来了巨大的发展,场馆内开始配套历史背景的文字叙述和文物讲解员。博物馆教育大众的社会服务功能逐步明确,并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到二十世纪为止,博物馆以教育为主要目标已成为社会和学界的共识。博物馆不再将展品神圣地供奉在一起,而是主动寻求知识的传递,

收稿日期:2019-08-01

作者简介:熊鹃,南京市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

其展陈理念由“以物为主”转型为“以人为本”，并用新的维度审视博物馆与观众、文物的意义与展示之间的关系。

二、博物馆教育模式与建构转向

除了消费主义社会风尚的影响之外，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也促使传统博物馆教育的转变，使博物馆研究处在一种新的境况。二十世纪后半叶，文化研究领域内出现很强的反传统的倾向和超越现状的情绪，后现代思想家否定纯粹客观的知识，如福柯认为不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不会有任何知识，在博物馆意义的探讨中，物的本体论和知识的客观性问题再次成为博物馆研究的主题。

博物馆将实物、绘画、照片和文本展现在一个公共空间之中，通过构造实景或是呈现故事的方式输出大众学习的资源。在这些阐述的过程中，物件取舍、结构设计和意义赋予等环节的核心总结为：对展品传统意义认识论上的解构和重新建构。由此产生关于博物馆知识的建构主义思想，这种构建既是在文物与叙述的关系中，也建构在“主体”的“知识”与“受众”的关系中。建构主义是一种知识与学习的理论。这种观点强调对物的理解是由每个人自己决定的。由于不同的人由于原有经验不同，对同一事物会有不同理解。因此学习是引导学生从原有经验出发，建构而来的新的经验。建构主义思想最早可追溯至皮亚杰在二十世纪中期提出的发生认识论，在经历后现代思潮萌发后，建构主义强调建构的知识不仅需要是真实的，而且是独一无二的。

在建构主义的影响下，博物馆研究的焦点开始从权威知识转向互动探讨，从教育者转向学习者。博物馆教育试图让观众知道而不是被告知，让观众成为知识的主体而不是知识的对象。受众不再被视为单一属性的对象。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主动代入情感和想象，参与到博物馆的场景之中。在新的受众和传统叙事之间，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真正”博物馆知识应该由谁阐述？如何阐释？以及博物馆教育的目的为何？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博物馆学界对博物馆学

习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海恩(Hein)和胡珀-格林希尔(Hooper-Greenhill)等人的理论较有影响力。海恩提出博物馆教育的知识论的连续统结构，刻画博物馆知识意义和教育理论两个维度。在博物馆知识客观性问题上存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实在论主张客观知识独立于人的思维和感知而存在，博物馆展示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正确的描述；反实在论认为不同的叙事背后暗含的是对物的不同态度，不存在柏拉图式的绝对正确的知识，博物馆教育的本质是政治文化中的意识形态修辞。在教育理论方面，从行为主义到建构主义分别代表和教育心理学观点中的两种对立，前者认为知识是通过观察和经验习得的，另一端的建构主义则认为知识与社会文化相牵连。以此对立立场为标准可以我们划分出四类博物馆教育模式，分别是传统说教模式、刺激-反应模式、探索发现模式和交互建构模式。

传统说教模式中，博物馆是知识的权威和立法者，策展人所定义的世界是绝对正确的。采取此教学模式的博物馆无需使用互动式的修辞方式，拒斥批判性或是分析性地解读其知识交流的原则。传统说教模式将学习视为一个简单的交流过程，把参观者在博物馆场馆中的学习等同于学生在教室。对于展示效果的评价来说，通常使用参观者对展览知识的获取程度来评价展陈而不是展陈本身。

刺激-反应模式充分体现了行为主义“控制”条件的思想。其目的是通过强调重复和奖励正确答案来传播知识，通过关联记忆、强化学习等手段获得客观真理的知识。例如，当访问者选择正确的答案、按正确的顺序排列项目或在触摸屏上勾选正确的答案时，系统设计的互动性展示会给予鼓励。

探索发现模式以知识实在论和建构主义为基础。在探索发现的进路中，知识的获取与人和物的沟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人们在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能充分意识到这种双向的交流。探索发现教育模式的特征是：设定固定明确的教育目标，互动展

览提供活动体验。在互动体验设计中,策展人关注观众已有的知识认知,兼顾学习者的不同的知识背景。在评价探索发现模式的教育成效时,参与展览经历的记忆作用是一条重要的检验标准。

交互建构教学模式是贯彻建构主义思想最为彻底的教育理念。这种模式并不给参观者设定具体的目标和任务,用具身互动的形式让参观者感受展览本身,强调学习认知中身体体验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交互建构模式在当今博物馆中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运用,通过结合观众自身的文化背景,使用开放式叙述与观众产生共鸣。在实践中,场馆内将传统的实物展示、触摸屏、视频和讲解机提供一个互动空间,邀请观众通过日常活动将自己融入展览的一部分。在理论研究中,由于博物馆的功能基础仍然是博物馆物,客观存在的物与建构主义反实在论相协调并不容易。

三、交互性展示中的具身建构

博物馆意义的阐释不只体现于对物质性和文化特性的常规叙述中,而且还以视觉化、场景式的方式体现在各种展陈形式上。为了增强交互性,展馆新设让参观者动手参与的环节。较为普遍的方式是展厅设置文物复制品让参观者触摸和近距离观察,以感受这些藏品真实的触感,而不仅仅只是隔着玻璃观看。例如上海博物馆的《古代上海》展厅的文化特展中,不仅有公元前1900年至前1200年马桥文化时期的文化遗存,同时在在陶器的展厅旁,设有“小小陶艺家”的多媒体互动项目,适合儿童亲自动手,增添兴趣,亲近历史。在身体参与的互动构建中,现代技术的发展和具身体验的构建是实现交互展示的重要因素。

在构建主义的框架下,“博物馆+技术”浪潮的推进让策展人用交互形态重新定义人与空间的关系,也允许每个参观人以自己的态度解构传统意义的博物馆。数字技术带来的优势在于给予参观者选择和控制内容的自由。学习不是从博物馆权威向初学者的知识传递,而是一个学习者增强能力的体验过程。参观者在馆内不再是一个被动接收者,他们既是文化消费者,又是知识的主动追求

者,也是文化的二次传播者。

对于高新技术支持下的展览而言,博物馆提供的是交流的路径而不是展览的结果。以多媒体为载体的文物展示不仅仅是简单地将文本叙述照搬到电子屏中。由于每个人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历千差万别,同一个物件和事件的叙述在不同的人之间有着不同的人物关系、起居生活和历史因果等的关联,从而产生多种多样的访问体验。凭借互联网提供的沟通交流构架,观众可以在展览中上传照片文字、分享自己的体会,记录自己的个人经历,并用第一人称叙事在多媒体平台中表达对展品的私人印象,将单个博物馆展览延伸到参展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通过对每一位参观者自身体验的吸引,与他们建立直接联系。互联网+博物馆背景下的交互式展览是开放式的,没有权威的说法来定义展品文物。它允许来访者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态度,鼓励他们为其他人记录这些想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交互性的博物馆展示是每位观众共同构建的结果。

另一个方面,因为博物馆学习总是伴随物理身体和心智活动的参与,如何使博物馆知识与观众的身体心理进行交互成为博物馆教育与展示的新课题。博物馆学习中的具身构建在对身体问题的讨论中呈现出全新的形态。

对身体问题和具身认知的思考主要来源于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人的身体现象学。在现象学的语境中,由于人具有身体化的性质,在博物馆中学习的前提是人向空间“敞开”,人和空间都保持自由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认为,全神贯注投身学习并不像“糖溶解于水中”那样物理性的事件,而是观众“完全被某事物占据”。当一个人完全沉迷于他的主体事物中,他本真地作为自身存在着。“全身心地参与某件事情意味着:我的身体留存于此。但是我身体的此在,我在此处坐在椅子上,已经本质上总是一个在某处的彼在。我在此处意味着:我在彼处看着和听着你。”

在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活动中实际上嵌入了空间的敞开,即观众是透过场馆空间看到文物的。由

于交互性展示中,学习的具身性直接表现为观众的身体性,具身视觉就是观众肉眼的视觉,具身触觉就是观众手上的触觉。在认识过程中,博物馆的场馆环境“抽身离去”,与人融为一体,形成“(观众—交互性展示)→博物馆物”的具身关系。

博物馆教育的具身关系中,展陈不仅保证了观众身体的在场,同时展览本身也是观众身体的延伸。在交互性展陈的具身体验中,博物馆展示连接场馆、身体和心理三个维度,使得参展人对博物馆物有切身的体验。具身展陈的构建,不仅是建筑物件和展陈物品可触摸,身体所在的全景都是沉浸式的互动环境。博物馆的具身构建使用规模庞大的叙事将交互式展览与具身理念相结合。交互性展示充分利用“沉浸”和“体验”的互动的概念。将表现内容脱离出传统的说教框架,通过创造一种体验空间引发参观者的情感反应。通常这类表达是通过高度情景式的审美展示来实现的。例如南京博物院民国馆中,利用全方位的历史设计来营造一个高度沉浸式的体验环境,将民国时期的街道全景式还原在场馆空间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场馆内不仅还原了民国的外观特征,还包括了其社会历史功能,如民国时期邮局和照相馆的互动体验。

沉浸式的情景体验通过增强参观者的在场体验来提高他们的身体参与,由此引发具身的学习行为。同时在场馆的陈列布置方面,具身设计通过外显参观者身体的参与过程,可视化观众的内心活动,从而进一步为交互性展示的升级提供帮助和指导。对于观众而言,具身交互把环境因素从观战的活动中抽离开来,使人获得本真的意义构建。

参考文献:

- [1] Jeffrey Abt. The Privatization of Public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In Sharon Macdonal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85.
- [2] Eilean Hooper-Greenhill. Museums and Education, Purpose, Pedagogy, Perform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1.
- [3] Eilean Hooper-Greenhill. Museums and the shaping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99.
- [4] 吴琼.博物馆中的词与物[J].文艺研究,2013(10).
- [5] 苏海东.博物馆物论[J].中国博物馆 2005(1).
- [6] 刘永孜.博物馆:文化治理、视觉技术与主体性建构[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5).
- [7] 尹凯.博物馆教育的反思——诞生、发展、演变及前景[J].中国博物馆,2015(2).
- [8] 王思怡.何以“具身”——论博物馆中的身体与感官[J].东南文化,2018(5).
- [9] 胡凯云.浅析“后博物馆”的展示诠释[J].东南文化,2017(4).
- [10] 徐玲,赵慧君.真实与重构:博物馆展示本质的思考[J].东南文化,2017(1).
- [11] Tony Bennett: The birth of the Museum: History, Theory,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5.
- [12] 熊飞.海德格尔<措利孔讨论班>和身体问题[J].伦理学,2018(3).
- [13] 郑旭东,王美倩,饶景阳.论具身学习及其设计:基于具身认知的视角[J].电化教育研究,2019(1).
- [14] 李志河,李鹏媛,周娜娜,刘芷秀.具身认知学习环境设计:特征、要素、应用及发展趋势[J].远程教育杂志,2018(5).

责任编辑:王芳